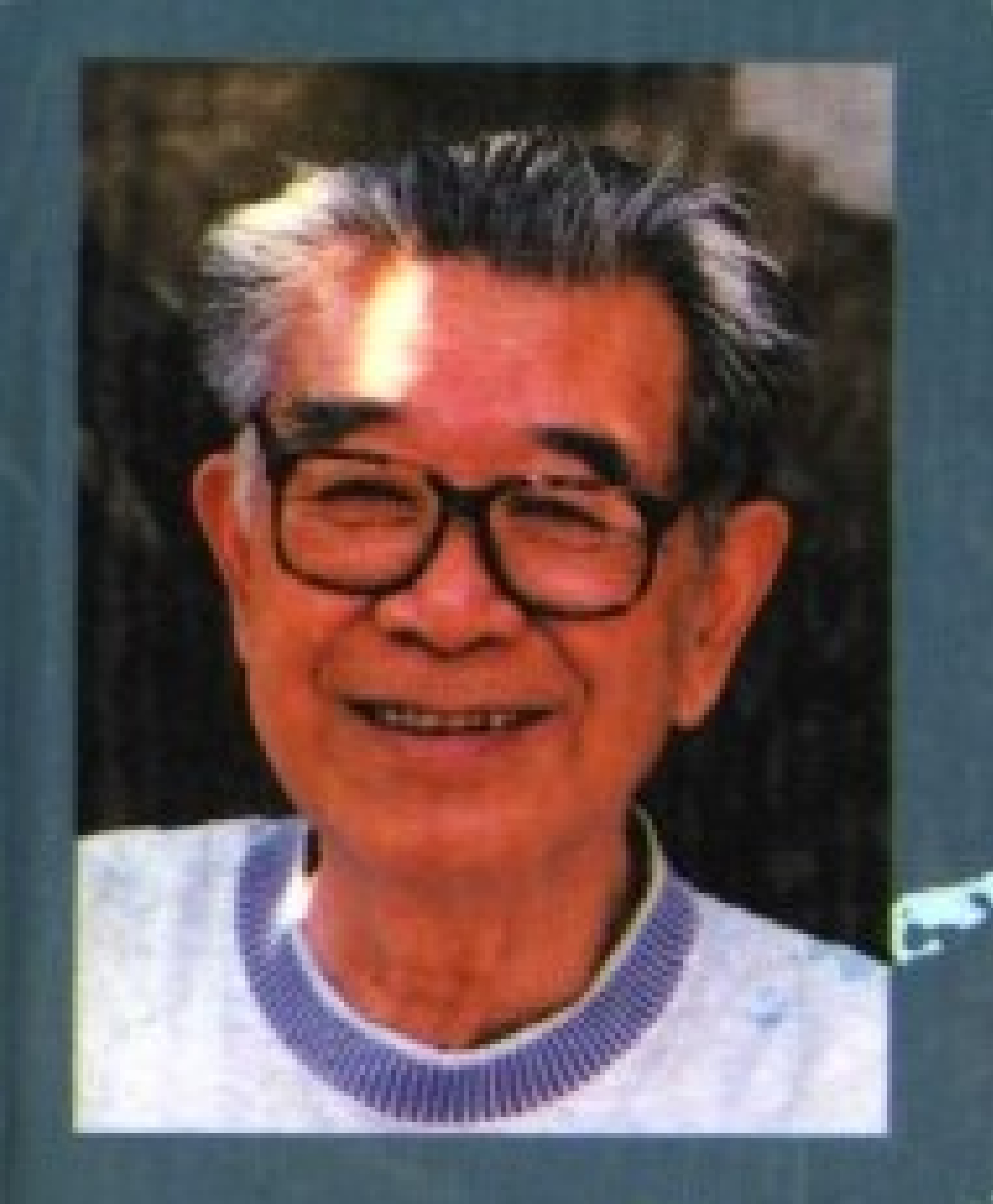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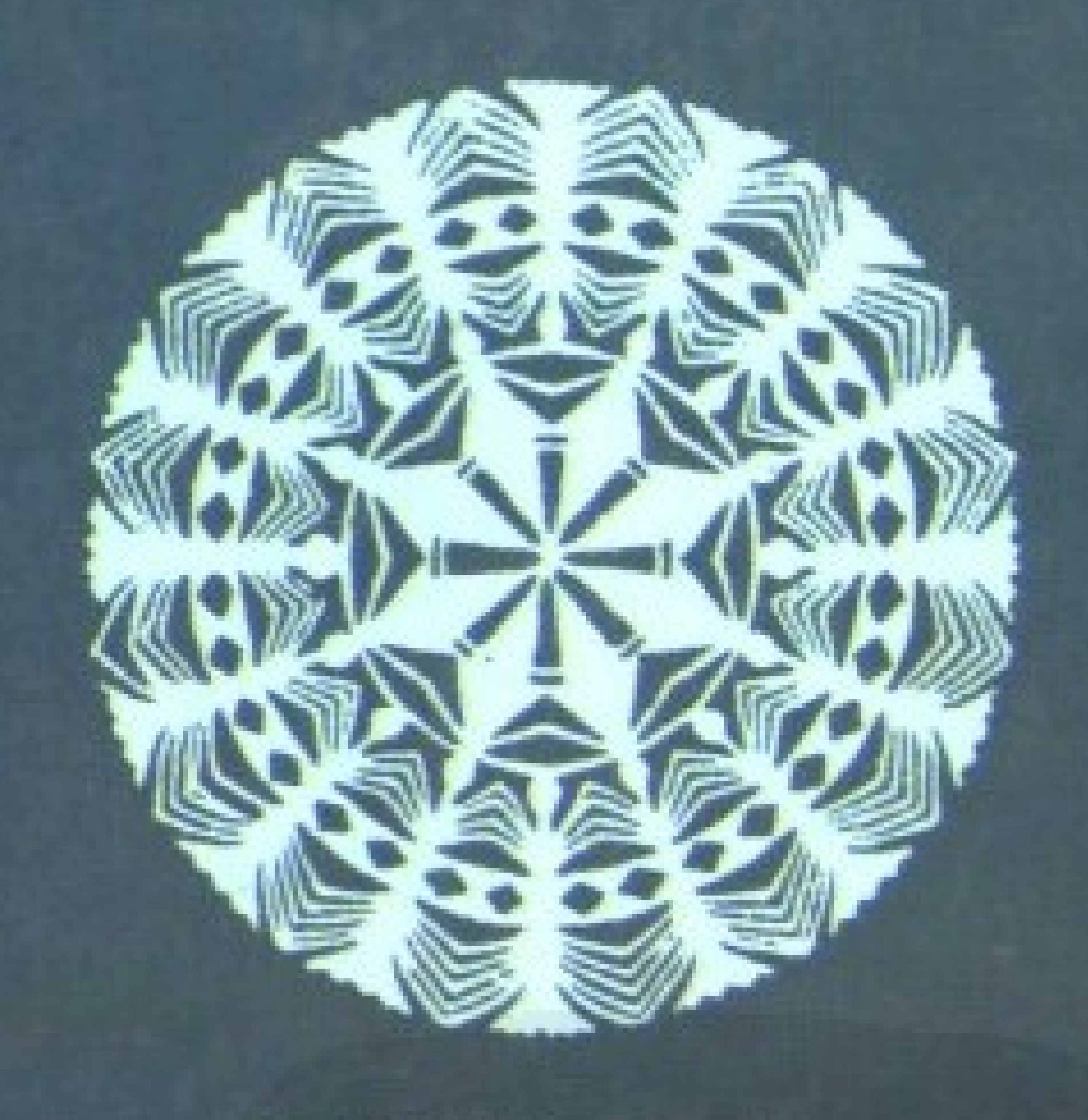
# 我的编年故事

1915—1935

（20岁以前）

于光远 著

河南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余　龂
美术设计　秘金通




ISBN 7-5347-1949-6/I・77
定价　8.20 元




# 我的编年故事

1915—1935(20岁以前)



于光远 著

河南教育出版社




**我的编年故事**

**1915—1935（20岁以前）**

于光远　著

责任编辑　余　峤

---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郑州农业路73号　邮码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38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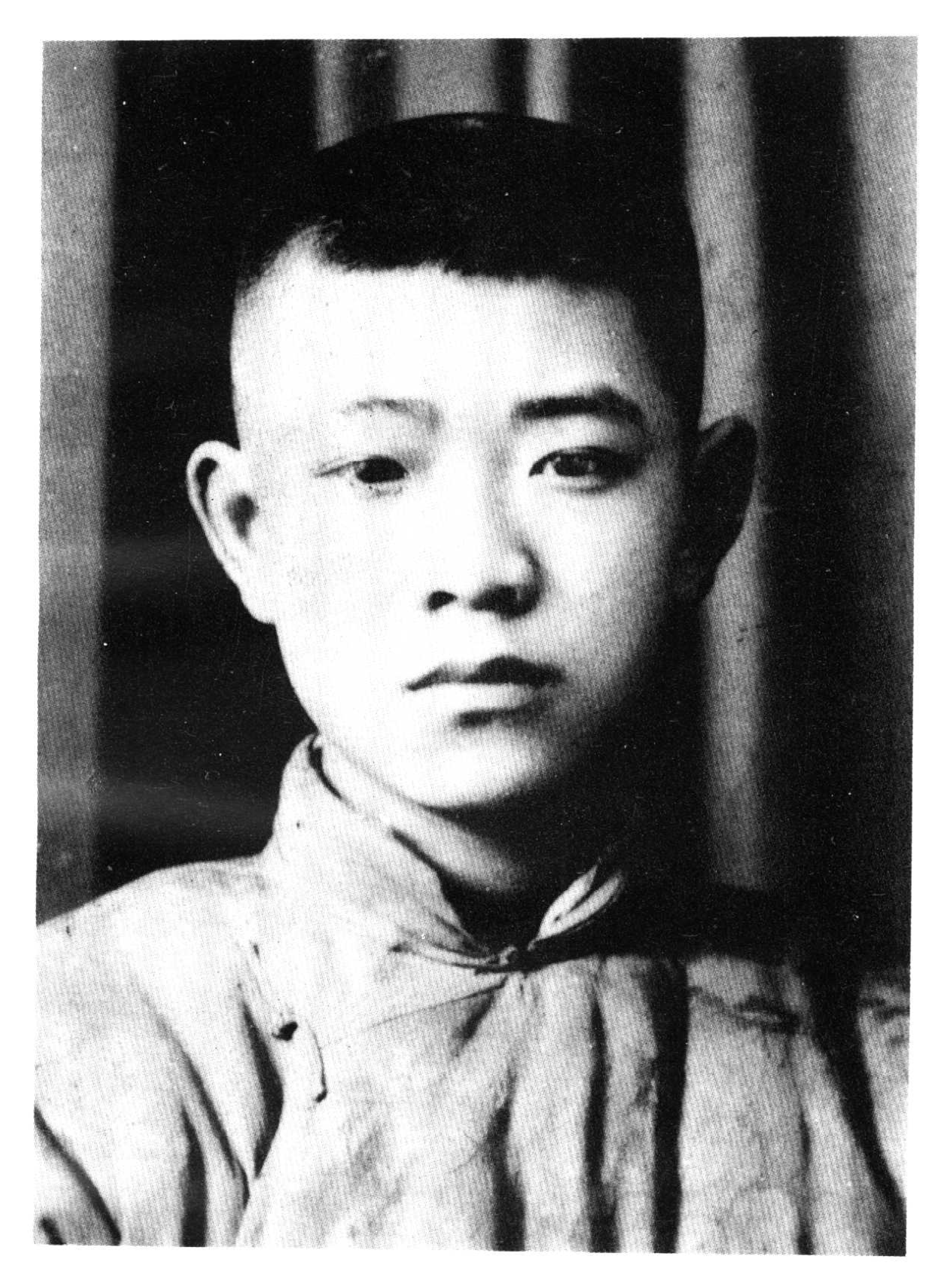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300册

ISBN 7-5347-1949-6/I·77

定价　8.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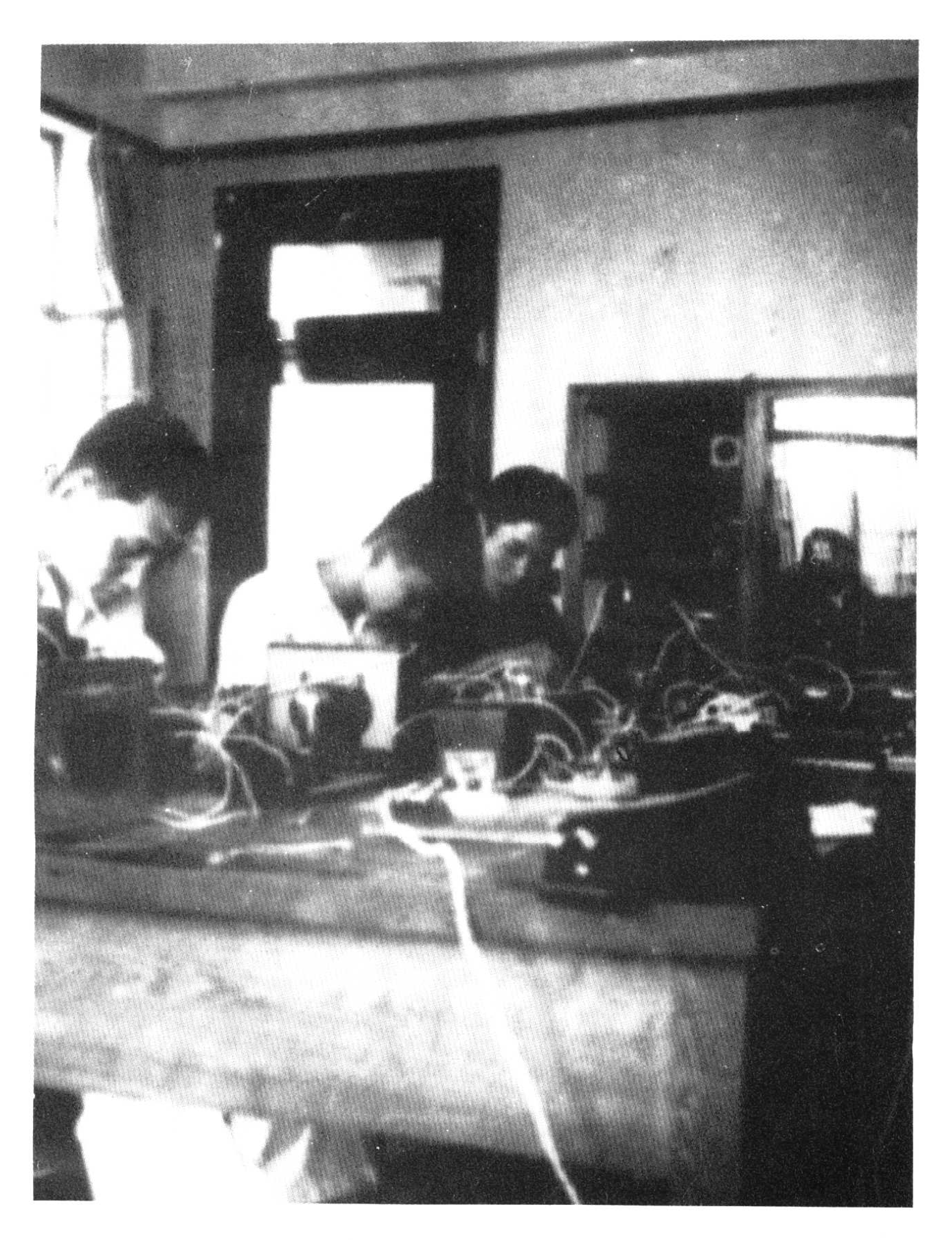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学时代的于光远



父、母



于光远（中）在实验室

# 出版说明

于光远先生的《我的编年故事》，是一套回忆录性质的丛书，但它和一般的回忆录不同，不是事无巨细，有闻必录，而是以连缀一个个有趣的故事，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作者儿童及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我们相信，读者定会从这套丛书中得到启迪和教益。

现分为四册出版：1915—1935（20岁以前）；1935—1938（抗战前在国民党统治区）；1938—1945（抗战八年）；1945—1949（迎接全国解放）。

编　者

1996.6

# 序

这本书究竟送去哪个出版社最合适？对这个问题，我曾考虑过一阵子。我判断有两类出版社的读者会愿意或者喜欢读它。一类是青少年出版社。书中写的是作者本人20岁前的事，即除了幼儿和儿童时代的五六年外，作者本人就是青少年。青少年看写青少年的事情的书可能有一种特殊的兴趣。还有一类出版社便是教育出版社。这是因为，一个老年人对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知识的长进、知识的形成进行系统地回忆，做了许多的研究，并且写成了书的人是不多的。它可以成为关心教育问题、研究教育问题的人的一种特殊的参考资料。一开头我因肝炎在302医院住院，躺在病床上口授这

本书时，唯一的目的是排除无所事事的无聊。我说过这是一种“废时利用”。可是到后来就有了给别人看看，特别是想给搞教育的人看看的想法。所以在口授了这本书这个总的轮廓和20岁前关于本人经历中的几个故事之后，我就来分别地讲我这段时间生活的几个侧面，对本人这段时间的心理现象做一番分析和叙述一下本人20岁前成长和发展的环境。这就带有自己对自己进行研究的意味了。在做了这样一番回忆和分析之后，我对自己这个“个别”似乎也认识得更加清楚了。同时我愿意把这样的材料拿出来供更多的人来研究。对“一般”和“特殊”的认识总要建立在对“个别”研究的基础上。我想，我对自己的这个“个别”提供的资料是会有一定研究价值的。于是在两类出版社之间我就向教育出版社倾斜。于是决定在两个多月前把书稿寄给曾经出了我的那本《我的教育思想》的河南教育出版社。我很高兴地得到这个出版社社长周常林同志的支持。

也是在回忆和分析我20岁前的这个“个别”时，我越来越清楚我的知识的长进和性格的形成有比较多的特点，同别的“个别”很不一样。我的教育思想当然同我本人20岁前受教育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但是我还是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我之外的许许多多的“个

别”上，对他们进行观察和思考。对我自己也认为必须客观地研究，我接受的教育中有哪些证明是成功的，哪些证明是失败的，有哪些只适合于我这个“个别”，哪些带有普遍性。在对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时，自己的亲身体会当然要给以重视，因为在这方面可以直接得到真实和具体的资料。在写《20岁前》这样一本带有回忆性质的书时，写的当然几乎全是我本人的事情。但是我的目的是在教育问题上做出一般性的判断，决不能夸大个人的经验。在这里不妨引用不久前自己写的一篇短文。从这短文中，读者们可以看出我的态度。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读书为了自己长进》。这个题目本身我认为是决不会错的，而且就今天的教育情况来说也是很有针对性的。现在的学生很多时间是在备考或者考试中度过，在读书的目的中取得高分占的比重就太大。而我在这篇文章中讲我在学校读书时有一个占便宜的地方，就是不花很多时间去备考。在这篇文章中我写道：“读书是为了长进自己的知识，培养自己的优良品德，不是为了考分。考试只是检查知识长进的手段。我很庆幸，在中学时代，从来没有为考试发过愁，甚至很少专门为考试做准备。我考分虽然一般不高，但我认为自己知识学得不错。当然我还是经过考试的检查。初中毕业时，我报考当时北京最好的高中

之一国立师范大学附中理科，而且只报考这一个学校。据说很难考进去，可是我还是被录取了。在报考前，我就没有花什么时间去备考，靠的是平时扎扎实实地学习。我越不为考试发愁，就越可以用本来会花在备考上的许多时间来增进新的知识，并在不断增进新知识的同时巩固已经获得的知识。我虽然几乎不准备考试，但考试及格我还是有把握的。”我写了这样一段话之后，认为有必要再写一段声明，怕把我这个“个别”的经验，不适当地当作一般的经验。我知道“读书是为了自己长进”这个原则是带有一般性的，学生对考试所持的态度我无意提倡要照我在学校里的那样去做。因此接着我又写了这样一段：“现时的中学生面对的情况同我少年时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那时就没有全市乃至全国的统考之类的事情。你们千万不要照搬我的经验，而要根据你们面临的实际，自己拿主意，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还告诉那篇文章的读者，“就是当时我的同学中也有学习方法与我很不相同的，他们特别认真听课，也认真备考，考试结果名列前茅，而以后有很大成就的。像我这样的学生当时也并不多。希望你们不要由于照搬了我的做法，学不好、考不好，找我算帐。这样我就担当不起了。”我觉得事先做这样的声明很有必要。不过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还是用这样

一句话来结束:“读书是为了自己长进,不是为了分数。”这个道理,我想在原则上总是正确的。

我想,对那篇短文上所写的那两个方面,既要研究“个别”,重视对“个别”研究中提出的原则问题,又要注意“个别”的经验的适用性总是很有限度的。特别像我这样一个比较特别一些的“个别”。

我这本书希望得到教育界人士的注意和批评指正,也希望青少年朋友们看看,把大家对这本书的看法告诉我。

1995年5月7日

# 目　录

# 1　20 岁前

1915年7月5日我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本姓郁，名鍾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我父亲生于1890年，1909年(宣统元年)19岁时毕业于上海兵工专门学校。毕业时被授予少校军衔并准备很快派往英国深造。他在学校中接受了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满清，拥护共和。1913年他在袁世凯政府陆军部任职。1914年在上海结婚。我的母亲是常州戚墅堰人，1893年生。外祖父曾在天津等地经商。我母亲没有上过学，但识字，能读书、写信，思想也比较开通。上海大小南门内的郁家是个望族。我家有明显的大家庭的残余。但在我出生时大家庭早已瓦解了。我父母结婚后就有了一个小家庭。我家祖上传下来只有上海顾家弄的土地和房屋。我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用不着付房租，而且每月还可以收取10多元的房租。我家

生活靠的是我父亲的薪金。

## 1.1 幼儿五年(1915—1920)

我在上海出生时父亲正在北京。我是在产科医院生出来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的诞生那样“现代化”。以后所有弟妹全都是在家里出生的。我4个月时母亲带我到北京，家住王府井南口霞公府(现名霞光街)。家里雇了一个老妈子姓李。李妈常抱我在长安街皇城前面树下游耍。那片树林在我的记忆中模模糊糊地留下来了。1918年父亲调去河南巩县兵工厂当会计科长。不久，一次他从马上摔下来受惊得了精神病，离职回上海治疗和休养。我母亲就带我回到上海。进家在客厅里我感到很暗，同北京皇城前面那片树林不能相比。妈妈告诉我那时我就用北京话大喊大叫“我不要这个黑屋子!”。我叫喊的事我自己没有记忆，但对客厅里的黑暗却留有印象。

回上海后，1918年母亲把我送进了清心幼儿园。它是教会办的。幼儿园里的那些小桌子、小凳子那就记得更清楚了。孩子们吃饭是各家用提盒送来的。在幼儿园我闯了一次祸：孩子们正吃饭的时候我钻到桌子底下，然后站起来把小朋友们的饭都弄翻在地。我害怕了，躲到楼梯下的储藏室。找不到我大家很着急。我在躲藏的地方听到外面人家都说了那些为我担心的话，感到自己很重要。这件事是我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的第一个回忆。最后被他们找到了，一句责备我的话都没有说，而是安慰了我。

大概还是在1918年，外婆家要从常州搬到苏州去，搬家前妈妈带我到戚墅堰住了几天。在外婆家的院子里透过篱笆可以看到火车。每天看到火车从家旁边跑过很有兴趣。回上海后第二年，外婆搬到了苏州，我又去了外婆的新居。这时候大概到了1919年。我在外婆家住了几个月，外祖父、外祖母看到那儿家中没有小孩子同我玩，就送我进了苏州南壕街一所义务小学（就是不收学费的穷人上的学校）。我算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其实并没有在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我很小，在那里带有玩的性质。在那里除了记得一个同学姓潘之外，别的什么都记不得。

从苏州回上海，随我的一个堂姐进了爱群女子小学。全班都是女生，只有我一个男孩。经常受到同学们——当然是那些女孩子的取笑。在苏州义务小学我还同一个姓潘的同学玩在一起，在爱群就一个朋友都没有了。那些女同学不同我一起玩，我也不喜欢同她们一起玩。

在爱群呆了半年，我怎么也不愿意继续在这个学校了，于是就转到了离家不远的小西门内尚文路江苏省立第二师范（有名的龙门师范）附小，还是一年级学生。

进二师附小后不久我得了一场病。什么病我记不得，只知道相当严重，病的时间不短。病好之后就没法跟班学习了。于是在后门对过姓徐的中医那里进私塾。学的是《孟子》。我生病时就吃这个姓徐的汤药，药很苦。上学时，他成天板着面孔，又打过我的手心。这是我一生中最怕最不喜欢的老师。

1921年暑假，我在二师附小又从头学小学一年级的课。

小学时代，连私塾在内，我进了四个学校。我在三个学校当了两年一年级小学生。1921 年前我没有正正经经地学习。1921 年暑假后，在二师附小重读一年级才真正算得上是小学生。那时我已经满 6 岁了。

## 1.2　小学六年(1921—1927)

1922 年阴历 8 月 26 日(阳历 10 月 15)，我 7 岁多一点，我三舅在苏州结婚(准确的这个日期是建国后特地向我三舅问来的)。为了向三舅祝贺，在他结婚的前两天，我们全家都去了苏州。我也向学校请了假去了。在苏州我们一连住了好几天。没有想到这次苏州之行成了我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事情。

我说的是在那天中发生这样一件事：我父亲不喜欢交际，住在人家家里感到无聊。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有一天就把我叫到外婆家楼上安静的地方念《三国演义》给我听。从“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始，一字不漏地念下去，一连念了几天。我听了以后才知道书上有这么有趣的东西，比课本有趣多了。父亲念了三回就不再念下去了，从第四回起我就接着自己看。三国演义那种半文言半白话的句子，居然也能够看得下去。看了好多回。回到上海，家里也有这部小说，我就接着看完了。从此就不好好学学校的课程，把家里的小说找出来一部一部地看。连几个小学校联合举行体育运动会我都带去了《水浒》，一面看踢足球一面看小说。这样学业成绩当然很差了，勉强及格，一连几年都是那样。家里父亲的藏书很少。小

说看完了就看弹词、曲子,《再生缘》、《珍珠塔》、《琵琶记》、《西厢记》都看。不过西厢记里面的那些曲子太文雅了,看不懂,就只看说白。所有文学作品看完了,就开始看什么《天演论》,梁启超的文集,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写的书籍。这些东西当然很难读,但有时还能看懂几句。这使我很高兴。这样的书也看完了,就开始看我父亲读过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课本,数学方面的有算术、代数、几何、八线(也就是三角),在这些书里ABC等拉丁字母没有用,用的是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有些书连常用的阿拉伯数码都没有用。自然科学方面有格致(物理)、化学、博物(动物、植物、矿物),以外就是父亲学过的一些专业课本了,关于弹道原理、枪炮制造原理和技术。他的书本来就不多,平常就放在柜子里,我想拿出来也摆不满两个不大的书架。我父亲的藏书就是我的第一个图书馆。到1926年下学年那个学期,这些书都胡乱看过一遍了。

我开始读三国演义第四回的时候就是似懂不懂地硬看。看过了一遍,过些时候再看第二遍,原来不懂的地方又懂了不少。学会硬看这个本事对我的自学很有好处。家里书很少,所以每种大体上都读过两三遍。看完了文艺作品,再看其它书籍的时候更是这样。什么书我都当作闲书来看。四书五经也是这样。我父亲的那些自然科学和数学课本,算术是最复杂的,学起来最难,代数、几何、三角都非常简单。自然科学常识也是这样。从读三国演义开始养成的自学习惯,对于我知识的长进和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一个小学生书看得这么多,这么杂,而且是自学,这一点我想是不多的。从1922年8月起养成

的习惯和因为我家有我父亲的那些“藏书”，使我变成这个样子。

除了读书以外，我还有另外一种兴趣，那就是东张西望。从家到学校的路上，大概有十来个手工作坊，生产豆腐的、搞小五金的、修理自行车的等等。每天上学经过那些作坊，我就很有兴趣地看他们操作。看人们怎样在豆浆锅里一张一张地捞豆腐皮，看人家怎样在洋铁皮上冲出“金钱眼”来……我一看往往就半个小时过去了，因此常常迟到。有一次还把书包丢了。丢东西是我从小就有的老毛病，铅笔、橡皮一会儿都丢了，所以母亲常把一支铅笔切成三段，一块橡皮切成两半，用绳子把铅笔和橡皮连在一起，系在我衣服的扣子上。就是这样也还经常丢，连衣服的扣子一起丢。这个毛病一直到老也没有改掉。

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二师附小有工艺课，老师教我们用氢氧化钾和硬脂酸在烧杯里制作肥皂。我做出了一块，加上颜色，是棕色的。可是洗手时出不了泡沫，应该说是失败了，但是很高兴。后来老师又教我们做雪花膏，做出来的从外形到香味都还可以。不知道抹在脸上对皮肤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个效果不好检查，所以说不好是成功还是失败。

说起制造什么东西，我想把我帮我父亲生产蓝黑墨水的事说一说。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我父亲失业在家。那时上海有一种民生牌蓝黑墨水，受到用户欢迎，生产厂家也挺赚钱。于是我父亲就想制造这种墨水取得收入。我父亲制造墨水的牌子叫“民富牌”。他做了不少试验，产品质量还是不错的，写

下来是蓝色，不很久就是黑色的了。把墨水装到瓶里的方法，用的是虹吸原理。可是他却不懂可以先在虹吸管里装满清水，然后一头伸在墨水缸里，一头放在墨水缸外，只要管子一头比缸里墨水的水平线低，清水放完了，再流出来的就是墨水了，而是要我用嘴巴去吸墨水，弄得我的舌头经常是蓝色的。后来父亲又在马王山制糖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懂得了粗糖变成精白糖的工艺过程。父亲还到照相馆买来大量照相底片，从中提炼出银子。他还把人的头发处理成金黄色，做成条带，可以挂表。他还做过一些别的事情。我对这种工艺方面的事情，总是很有兴趣，跟着他干。

讲讲我两次挨打的事情，它也可以表现我的性格。一次是在家里做作业写大字，我父亲在一旁看，不知哪一笔写得不好，他一个拳头猛然打我的手臂，那个正写着的大字就成了一个墨疙瘩，我一生气，第二天还是把本子交给老师。老师指着黑疙瘩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爸爸弄脏了。还有一次是在学校，那时学校已经不实行体罚了。不过教室里还有一块打手心的板子，老师对哪个学生不满意就让学生自己打自己。老师只说要打几下，自己不动手。学生们受到这种体罚按照老师说的次数轻轻地打几下就过去了。有一天老师让我打自己三下，我对老师处罚我这件事很不满意，一生气重重地打了自己三下手心，打完就把板子从临街楼上教室的窗户掷到街上。从此教室里那块板子没有了。

还有一件事不属于挨打，但是性质类似。我们家里有这样一种习惯，每年端午节要小孩喝一大碗黄连水，说是这样一夏

天不会长疖子，别的小孩皱着眉头慢慢地喝，我却大口大口喝下去，表现自己不怕苦。

在小学生活中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就是接受“五卅”运动的洗礼。在二师附小，1925 年给我上课的一个语文教师(非常遗憾我把他的姓忘记了)。在课堂内他详细地讲了鸦片战争中英军打进黄埔江的故事。他叙述当时守西炮台的陈化成如何英勇抗敌，而守东炮台的牛健如何胆怯、不尽职守，结果陈化成英勇牺牲，上海被占领。除了在课堂讲课外，他还领我们去吴淞口的炮台湾参观了西炮台，也领了我们去陈化成的祠堂(不知那祠堂现在还有没有)，一边参观一边详细地讲解。他对清朝如何腐败、中国人民不革命就要做亡国奴这些事讲得很有感情。在上过这堂课后不久，“五卅”惨案发生了，上海工人、学生掀起了规模很大的革命运动。我们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也停课拿了小旗上街向居民介绍惨案真相，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一贯剥削和压迫，鼓动商店拒售英货和日货、居民不买英货和日货。我们还向商店和路人募捐，支持工人罢工。一连上了两天街。这次行动对我是一次教育，而且不仅受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教育，也受到一些阶级教育。我们用两根长竹竿拦截小轿车、宣传募捐，原以为有钱人捐钱会多一点，结果不是那个样子。轿车里的有钱人把我们看成小叫化子，既不爱听我们讲话，又不给钱，或者只给很少一点点。相反的我们向黄包车夫募捐，有的车夫就掀开作为坐垫的那块木板，把坐垫下所有的钱，也就是当天的收入，全部捐给了我们。那次我们的活动就是那个老师带着我们去的。我们把那个小轿车里

的人和黄包车夫的表现说给老师听，他就给我们讲了社会划分阶级的道理。那次活动时间虽然不很长，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后来我听说，二师附小里有共产党员，我猜想那个教员就是。

我对“共产”一直抱有好感。这同家庭生活困难有关。在家里缺钱用的时候，我父亲老讲靠挣钱和花钱过日子的社会真不好，共了产就好了。大概他是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过在1925年和1926年我只知道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林军。高高的个子，长脸。可是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常到我住的顾家弄55号来，接近的是院子里的几个带有流氓习气的为我所看不起的人。因此连对他也看不起了。建国以后我问了中央办公厅交通局长王凯同志(那时他也在上海)，他告诉我的确有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他是我党和国民党的跨党分子，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商人部长。“四·一二”以后消极脱党了，但并没有做什么坏事。

小孩子总是爱玩的。但是我对体育游戏没有多大兴趣，我最爱玩的是打牌之类的游戏。我的邻居们经常打牌，我就在旁边看。看多了我都懂了。麻将、挖花、同其、六十四、纸牌、牌九、扑克等等，可以说无一不通。我自己有时也玩玩，但是从来不赌钱。我在这里说的扑克还不是桥牌和类似桥牌的“百分”之类的游戏。对这些游戏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我说的是一种上海叫做沙蟹(读音是 so ha)的打法，它完全是赌博。我说的“同其”的打法，现在知道的人恐怕很少了，谁有兴趣的话，我现在

还可以传授一番呢。

我父亲从1918到1926年基本上是失业在家的。1926年大姨夫沈家桢当上了京绥铁路局局长，给我父亲在路局安排了一个科员的职务，于是在1926年底全家去了北京。在靠近路局的西四兵马司胡同租了一个独门独院的小院子。我还要学半年才能小学毕业，于是就报考了附近的礼路胡同的铭贤小学。考试的办法是随到随考。我母亲带我去，考我的是个女教师。除了数学语文题外，她还问了我的英语学习的情况。我在上海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程度比铭贤小学要高。题目做完以后给老师看了，母亲问这小孩子能录取吗？回答说，小孩子的数学好极了，录取没有问题。原因是她出的那些像"鸡兔同笼"的四则题，我都用联立方程的办法解了。这样我就在铭贤小学上学。时间很快，几个月过去我就小学毕业了。

## 1.3 初中三年(1927—1930)

1927年小学毕业后我投考第三中学。这个学校的校址离西四兵马司我家比较近，在西四北祖家街。我没有考别的学校。我对考试没有做任何准备。开始我一点不在乎，但接近发榜时心里倒犯了嘀咕，心想如果考不上就不得不在家里闲着，这就很不好了，我还是喜欢上学。到发榜的那一天，我从家顺着沟沿(现在叫赵登禹路，那时马路上有一条明沟)去三中，一路走心里很不踏实。我知道我考得一定不会好，到榜前就从末了看起，在丙等里没有我的名字，就更加发毛，后来却在乙等

找到了我自己的名字。我考上了。

我在第三中学学了三年。小学我进了四个，高中进了两个，大学也进了两个，只有初中从头到尾在这一个学校里学完。不过这个学校在我上学时期改过一次名称。入学时叫“京兆公立第三中学”，后改“北平市立第三中学”。这所中学到现在有 80 多年的历史，现在仍称北京第三中学。校址没有变，校舍有一部分也没有变，学校还是那座大门，门前还是那两棵大槐树。那地方原是明末祖天寿的家祠，现在只在原来校舍旁边盖了一座楼房。这个学校有一个特点，满族的同学比较多。我现在还记得罗世文、赵培玺几位满族同学的名字。这个学校的沿革是以后才知道的。它的前身是雍正时建立的右翼宗学。宗学是清朝皇室子弟的学校，比“觉罗学”还要亲一层，比起八旗子弟来说就更亲了。在光绪末年改为第三中学(称京师第三中学堂，那是 1902 年的事情。1912 年后改成现在的名称，同时建立的左翼宗学也同时改为第三中学)。说起右翼宗学，大大有名，曹雪芹曾在那里当过瑟夫。这是一个怎样的职务，曹学家们说法不一。曹雪芹也可以说是三中校友。至于老舍、罗常培他们是三中毕业生，校史上有记载。

我进三中时学生 100 多人，我的这个年级分甲乙两班，我进的是乙班。教师除本校教员外，不少是外面来兼课的。有些兼课教师还是专家。我在三中学习时是每堂课都去上的，老师讲得吸引我的就听，否则就在课堂做我的“副业”。三中比较自由，对我这种情况老师没有多管。

下面先讲讲我在三中时学数学的情况。学校里的课程对

我来说太浅了。同班同学孙树滋的哥哥孙树本(他是北京师范学生,比我高一年级),数学很好,外号叫算术本。我就拜他为师。他家住在护国寺北一条又窄又脏的巷子里,这条巷子却有一个很雅的名称——"百花深处"。我先跟他学大代数,内容相当多,比如三次和四次方程的普通解、概率论、无穷级数、极限等等都有。学完了大代数,接着就学平面和立体解析几何。就是初等几何和三角我也找到了比较复杂的教材来学。孙树本很会教书,跟他学的不只我一个,后来他考进了北大的预科,然后进了北大的数学系。除了正式课程以外,他还给我介绍了不少数学新学科的常识,像非欧几何、形势几何等等。形势几何现在叫拓扑学。那时北大的教授江泽涵是在中国讲这门学问最早的数学家之一。除了孙树本讲的那些之外,我也找了一些数学书自学。严济慈出了一本《几何证题法》,我就从头到尾演算了一遍。初中快毕业时,我还买到一本《简易实用微积术》,这本书开头怎么写的、举的例题,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总之,初中三年我把高中要学的数学课程都学过了,孙树本是我真正的数学老师。

刚进初中一年级不久,我在西四大街的书摊上买了一本王弼注的老子《道德经》。我从小就不怕读看不懂的书,老子道德经中那些看起来似懂非懂的句子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就开始"钻研"起它来了。孙树本有一个同学雷天觉听说三中有一个小孩在钻老子《道德经》,而雷这个时候正在钻《周易》,于是通过孙树本要与我相识。于是12岁的我和14或13岁的雷天觉两人就见了面,谈得非常投合。从见面之日起,我们交

上了哲学朋友。一见面就大谈哲理。我讲我的“道可道，非常道”，他讲他的“乾，元亨利贞，见龙在天，利见大人”。两人每一两星期就要凑在一起谈那些玄之又玄的东西。后来，我们从中国古代哲学谈到一些近代西方哲学，他比我知识多，我从他那儿学到一些东西。当我三三制初中毕业时，他在四二制的北京师范毕业。我考师大附中，他考北大预科。升学时他说要选一门他最不喜欢的专业来学，免得扰乱他的哲学思维，于是他选了机械工程。后来他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那一批学部委员之一。我也从那个时期起将对哲学的兴趣一直保持下来。

说起文学，我的思想水平是相当低的。除了旧小说外，对上海的鸳鸯蝴蝶派颇感兴趣。当时这一派办了一种叫《红》的杂志，在初中第一个学期，我就和几个同学编了本《白》杂志，这本杂志只出版一份，是手抄的。杂志有彩色的封面，里面有文字也有图画。这些画都是我的表哥蒋仲侯的作品。我在杂志里写了一篇武侠小说《白玉马》，准备连载下去。另外一个同学写一篇长篇言情小说叫《佩碎玉回录》。此外还有些短篇。“出版”后就在班内“发行”。我回家去曾把我的那篇念给妈妈听，她还掉眼泪，对这我非常得意。这杂志出了两期就编不下去了。

在铭贤小学时我就发现西单有条头发胡同，里面有个图书馆(它就是现在首都图书馆的前身)。我就去这个图书馆看小说。初中三年我一直去。开头完全看文学作品，后来也开始读一点清代文人的笔记和别的书籍。我也偶然得到一些翻译

的革命小说，例如辛克莱的《石炭王》，我看了，但没有多大兴趣。当时有些描写北伐战争的小说，我也没有多看。我的文学兴趣的格调是很低的，没有想到有一个同学看了描写北伐的小说后产生了考黄埔军校投笔从戎的思想和行动。初中毕业后他就这么做了。他不知道1930年以后的黄埔军校早就不再是准备北伐时的黄埔军校了。结果他考进这个黄埔军校之后，先是成了一个国民党的军人，后来当了宪兵军官，最后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特务。我这个文艺思想比较落后的人反而没有走入歧途。不过我看武侠小说也到了入迷的程度。初中一年级那个冬天，我想锻炼自己，培养自己的特殊的体质，一冬天都只穿了一条单裤，得了关节炎，膝盖很痛，但是不想认输，不告诉别人。后来走路的样子瞒不住人了。家里强迫我穿上棉裤进行治疗。用大葱头捣烂，拌上生南星，敷在膝盖上，总算把它治好了。那时北京街上还可以买到袖箭、飞标，我就买回家来练。我还练习飞刀，因此损坏了家里的木板门和柱子，受到母亲的训斥。在这段时间里，我差不多把广东一个叫蔡东帆写的中国历代的小说看完了。这是一部有几百册篇幅的小说，我对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历史知识，就是从这套小说中获得的。他把廿四史都用小说的体裁叙述了一遍。建国后有一次毛泽东讲到这套书，要大家找这套书看看，看来毛泽东也看过这套小说。新小说中鲁迅的《呐喊》、《彷徨》我还是很喜欢的。三中初一教语文的老师对鲁迅的作品讲得很好。

关于自然科学各科的常识，三中的物理课讲得很平常，化学实验室与二师附小相比都大大不如。但是常识课程很多，植

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生理学，都有专门的课程，也都非常简单。比如矿物学中讲单科晶系、三斜晶系、矿物硬度表的口诀“滑石方、云磷长、水晶黄、钢金刚”，也就是从软到硬的次序是滑石、方解石、云母、磷灰石、长石、水晶、黄石、钢石、金刚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三中从初二开始还开了一门第二外国语：德语。我学德语也很有兴趣。三中还开了一些特别的课程，有一位方言专家名叫白涤州的，三中请他来讲中国的方言，其中讲到北京的方言时，他说的几句话我现在还记得。这几句话是：“重三倒四曰‘贫’，声势赫赫曰‘红’，反红曰‘黑’，配，犹言不配也。”这些杂七杂八的课程，我倒有些兴趣。

小学时代那种对生产工艺的兴趣，在初中也还保持着。我仍旧喜欢在街上张望，但是看到的景象不一样。比如从家到学校走在西四北大街，有一个铺子就在路边人行道上宰羊、剥羊皮，用一个管子插到羊腿里用嘴使劲吹，就把羊皮和羊肉分开了，然后用刀子拉开，把皮剥下来。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一看二三十分钟就过去了。在街上除了可以看到生产工艺方面的事情外，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街边摆了一块布，用五张扑克牌（其中有一张是有人像的）摆来摆去，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张有人像的牌摆在什么位置，你如果把赌注下在那个位置管保失败无疑。这种魔术这种障眼法，我一直想弄清楚，但我经常看，有时看得时间很长，却始终也没有看出用的是怎样的手法。

1929 年，我家搬到了甘石桥西斜街口，和姨父、表舅住在一个大院里。那个大院是李鸿章侄子的公馆。那时候他们家

只住了一部分，大部分房子是我的两个姨父、一个表舅和我们家四家合住。这时候在一起的表兄弟、表姐妹一大群，有十几个，整天很热闹。我大姨父的儿子，比我大一岁的表哥，从他父亲电话局那里弄了许多废料来，他手很巧，会制作许多东西，买了一些真空管给别人制作收音机。我常跟他在一起做这做那。从他的房间到我的房间相隔几十米，两个房间之间装上了“专用电话”。我和他的房间还装上了对号的电锁，号码对了，线路通了，电磁石有了磁性，把钩子吸上去，门就开了。一次停电有急事却进不了房。我们玩这些东西很起劲。

在北京，家里和邻居都没有人打牌了，我就和我父亲下围棋。我父亲带我到宣武门大街路东一家叫“海丰轩”的点心店的后院，那是一个喝茶下棋的地方，经常有十多盘棋局在下。我父亲还带我到过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看大名鼎鼎的 14 岁的吴清元下棋。

在三中我呆了三年之久，年龄又大了些，同学们的名字当然记得就比较多，其中有甲班的陈自忠，他是《白》杂志的参加者，他与同班的赵培玺关系不好，还同班上姓名带个“玉”字的同学的关系也不好，但比对赵培玺要好一些。他写的那篇长篇言情小说就叫《佩碎玉回录》，“佩”者即赵“培”玺，“佩”、“培”同音，用长篇小说影射他的这两位同学。他在小说中让“佩”碎掉，无可救药，“玉”则挽回了过来。赵是满族，长的模样我还记得。陈比我大两岁，听说“一二·九”时在青岛大学站在同我相反的政治立场上。甲班还有一个陈阅增，毕业后也考进师大附中。后来他也考进清华，而且同我一样，高中也少学了一年。

1934年我转学清华后又与他同了两年学。他是学生物学的，一直任教，在退休前是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甲班还有三位同学的姓名我记得。同班的同学中耿铸、罗世文、杨履升、赵法孔等的名字我都能记得起来。杨履升是全班年龄最大的，初一时他已结婚而且有了一个孩子。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树滋，他就是读了描写北伐战争的小说在1930年进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后的黄埔军校，最后成了特务的那一个，在三中时我同他关系最好。还有一个中途退学的潘学阁，我同他的来往可以写成一篇小说，关于他的故事插在这里讲占的篇幅太多，不那么合适，以后单独写吧。

从小学最后半年到高中上了半年，一共四年我是在北京过的。如果说在小学生时代主要接触的是上海的文化，那么这四年我接触的便是北京的文化。这两个都市的文化背景有相当大的差异。从小环境来说，在上海我和我的伯父们几家生活在一个院子，在北京同我家经常来往的便是我的姨父和舅舅家，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同他们住在一个大院里。我北京的亲戚同上海本家和邻居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观察到不少不同类型的家庭。在上海我在家里只与一个邻居的小孩来往，在北京，除同学外，我就同许多表兄弟、表姐妹们在一起玩。

在1926年到1930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南方的政治生活是非常活跃的。北伐战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武装上井岗山开辟根据地等等。北方就比较沉寂。我只是在街上看到人力车夫砸电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张作

霖绞死李大钊，学校里和邻居竟然没有人谈起。1927 年底，国民党的势力到了北京，把北京改成北平，市党部就设在西单辟才胡同。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市党部还很重视我们三中。在 1928 年初开学之后，市党部书记长姓刘，常常跑到三中来，我们大家都见过他。他给我们学生发了许多宣传品，教我们唱北伐歌曲，还组织学生到中山公园社稷坛演过一次短剧。那时已经是“四・一二”之后了，可是市党部的人似乎还没有彻底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国民党员中也有一些人似乎一时还完全转变不过来，还在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些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了。三中校长名叫许兴凯，是个麻子。一次我在教室里不好好听课，拿了一张纸做他的名片，上面写“京兆公立第三中学校长许麻坑”。我正写着，不知道他轻手轻脚地来到我身边，被他发现了，记了我一个“小过”。又有一次，在教员休息室门外我说话声音大了一些，又记了我一个“小过”。由于我记了他的一些仇，1928 年上半年校内有个“驱许运动”，我也因此积极参加了，这当然是一件带有政治性质的事情，但我并不了解。总之，在北京这段时间内我对政治是不那么关心的。

1930 年暑假，我从三中毕业，结束了三年的初中生活。

## 1.4 高中两年(1930—1932)

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北平最好的中学之一：师大附中。据说师大附中不容易考取，二部(理科)更不容易，但是我还是不留余地地只报考这个学校，没有报考任何别的学校。我还是

考上了。这个学校的确办得很好。在高一我又学了一次平面几何，是师大教授傅鍾荪讲的。他完全按照他自己的体系来讲，不用别人的课本而是发自己写的讲义。他讲得很有趣。我还记得他所编的讲义一开头的几句话："几何者非它，乃一纯乎论理之大盘推释式也，不但放之四海而皆准，即脱离人世界也不得变更者也。"建国后傅曾当过北师大的校长。化学是北师大化学教授王鹤清讲的，讲得也非常之好(王鹤清在1936年到广州去当了勷勤大学校长。他的儿子王良恭是我在师大附中和清华大学的同学)。毕竟是大学教授教中学，水平高，效果很好。他们用的都是自己编写的讲义或教科书。还有一位姓汪的老师教逻辑学，讲得也很好。在师大附中我成了认真听课的好学生。

在师大附中我同班的同学许多是出类拔萃的。在这个好学校里，我的学习方式也就有了些改变。如果我在师大附中三年学下去，以后情况会有所变化的。但是因为我父亲当时在南京土地局做事，没有学完第一个学期，我就拿了一个高中一年级肄业的证明离开北京南下了。

考虑到全家有可能到南京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又听说南京中学也是个很好的学校，所以虽然我母亲到了上海，我却到了南京我父亲那里。后来考虑一个人在南京还是不方便，没有报考南京中学，又回到上海。我在南京住了个把月，拿了一张南京地图，把所有名胜都游览了一遍。我就住在父亲住的状元境。那是在夫子庙旁边，一条像北京琉璃厂那样的街，有许多旧书店，是过去到南京考举人的人住的地方。我也经常留连在

这些书店里。我就是在状元境第一次看到我们大郁家编的那套《宜稼堂丛书》的。

不久，我就回到上海，考进了上海私立大同中学附中。

考大同附中，我本来没有跳班的意思。进了学校才发现，大同附中实行四二制，高中两年毕业，而师大附中实行三三制，高中三年才毕业，这一转学我少上了一年高中。

大同附中也使我比较满意。课程里又有一门平面几何，这是我第三次在学校里学这一门课程，老师是吴在渊，他讲几何也有自己的体系。大同附中学习比较自由，很合我的心意。

到大同附中后，很快我就成了东方图书馆的一个积极读者。第一次去那个图书馆，是因为我伯父的亲家办了一个化学工业社，生产牙膏。他很会做买卖，在天津和东北三省打开了销路，但技术不过关，牙膏放在那里，几个月后就挤不出来了。那时我才 15 岁，但是我伯父知道我有点本事，于是替这个老板提出要我帮他想办法。我找到了东方图书馆，在那里查化工手册，建议在配方中加点甘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跑了几趟之后就熟悉了这个图书馆，从我家到图书馆要步行十来里路，但我还是常去。图书馆对我的学习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大同附中高中这一年半中，我对物理学的兴趣超过了对数学的兴趣。这同我更多注意着有关自然科学中哲学问题的书有关。数学中的哲学问题不如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丰富。我在初中时看过罗素的数学哲学的书，也同雷天觉、孙树本讨论过，我对这也有很大兴趣。在大同附中学习期间，我先是在东方图书馆看了不少有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书，先看中国

人写的或者外国人翻译的。后来我也直接用英文读这方面的书了。这使我眼界有所开阔。当时读到和注意到的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有些至今还是人们在讨论的，比如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的热寂论问题，对引力何以产生的问题，也有一些是由于物理学研究还肤浅时提出的问题，比如大家知道金属球如果有了电荷，所有的电都在金属球表面上，金属表面之下和金属球内部空间都没有电荷和“电力线”。我读过一本书的作者就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推断电也是一种由空间性质而产生的现象。这样的观点当然是昙花一现的东西，我想现在不会有人记得曾经有过这种看法。但是作为高中生的我，当时看到这种见解，还是有兴趣的。我还曾经看过一本怀德海的书，它把“事”event 作为构成宇宙的要素，从运动学 dvnamics 的角度来看，这一个 event 最基本的就是某个粒子在某个时间、某个空间以某种速度在运动。他以时间为横坐标、空间为纵坐标，由于粒子运动的速度都小于光速，所以所有的“事”都在光线这条直线之下的那个区域中。这是用平面来表示的。用立体来表示，那就是所有的“事”都在以横坐标为轴旋转而形成的那个圆锥之内。怀德海的这个看法，后来我才知道它的本质就是用“事”来取消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对立，是不可取的，但是当时我也是有兴趣的。这样的书我读了不少。我对物理学的兴趣是同我对自然哲学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从对自然哲学的兴趣引起的。

在大同附中学习时，我结识了一个低年级的同学沈熙籛。他的家正好在从我家到学校的路上，因此我常到他家去坐坐。

他的父亲我没有见过，我想他国学的底子一定是不错的，因为他家里线装书很多，沈熙钱本人也有国学的基础。我与沈的交往使我增加了国学知识。沈熙钱还教我写毛笔字，送了不少拓下来的碑给我。嘱咐我要照碑来学写字，不要去临帖，说许多帖在刻的时候走了样，练帖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告诉我要从碑中学习一些字之间的结构。我也开始对书法有兴趣。可是一直没有开始练字。如果我那时开始练习书法，我写的字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低的水平。现在常有找我题词的。我觉得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某个观点或者表示对某一件事的支持比较方便。可是老觉得自己的字写得太丑。我就想如果那时知道书法还有这样的用处，我就在那个时候好好练一下字了。但当时我只是听沈对我讲书法的道理，自己没有动手练。沈熙钱高中毕业后，没有去考大学，而是去考无锡国专，被录取了。以后我们就没有来往过。我相信他一定会学得很好，成为一个国学专家，可我始终没有打听到在国学家中有沈这个人。

我上高二后不久，父亲突然从南京回到上海。他说南京正在修建几条大的马路。这与靠近要建马路的住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本来不临马路的土地会因门口有马路而地价一下子上涨许多，而如果因修马路土地被征收了，又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些利害关系，会因马路线路的设计发生变化而变化。所以决定马路线路的人，有可能得到很大的好处。如果有人在这方面做手脚，瞒不过我父亲这个征收股股长。本来局长之所以愿意我父亲去当那个差使，是因为我父亲同他多少有些亲戚关系，可是我父亲坚持按原则办事，不愿意参加到这种不正当

的事情里去，于是乌纱帽一扔就回家了。我妈妈和我都是同情他的。可这么一失业，家里的生活可真难了。那时再找不到可以帮父亲找到职业的人，同时也告借无门，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早就当掉了。家里当票一大叠，没有钱去赎，许多都已当死了。我在私立学校上学学费又贵，半年五六十元，因此许多亲戚都劝妈妈，叫我不要再上学，而去"学生意"，赚点钱贴补家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可是我坚持要上学，于是决定采取半工半读的办法。

我找到的第一个职业是家庭教师。我家有一家姓唐的远亲。唐家是相当阔气的人家。一个名叫唐在礼的人，是袁世凯下面的红人。拥戴袁世凯登基的十三太保中就有唐在礼其人。我父亲到兵工署当科员就是唐在礼帮的忙。唐在礼有个堂弟叫唐在璋，他是淮南中南煤矿的董事长，家里有三个小孩，愿意要我去教初中数学，一星期只花两个晚上，讲这些课又不用准备，报酬每月 30 元，真不算少。我在唐家担任家庭教师的时间不短，收入前后加在一起恐怕有好几百块钱。而且有时我去上课，有特殊的娱乐节目，学生想去我就不讲了，而且他们总是请我一起出去。海京伯马戏团到上海来表演，就是同他们全家去看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看美国歌舞片《第 42 号街》也是这样。这样的娱乐场所，我自己是决不可能去的。这真是一个"美差"。

这时我的伯父受到他亲家办"化学工业社"的启发，见我父亲找不到职业，怂恿我父母把地契拿出来，同他的地契合在一起，出典搞到一笔钱作为资本，也来办一个"化学工业社"，

让我父亲当这个工业社的技师，一月五六十元薪金。我父母正一筹莫展，便同意了。“重心化学工业社”的名称是我父亲起的。这时候我父亲学到的那些东西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这个技师的工作他做不了，要我担任。我因为帮助我伯父的亲家解决牙膏质量问题，我伯父对我倒信得过，于是就从这个工业社的本钱中拿出上千块钱，在我死去的祖母的房间搞了一个化学实验室，我也住在这个房间。我为这个工业社开发的第一个产品是“土耳其红油”。“土耳其红”是一种染料，在毛巾上用这个染料印出红字或图案，可以经久不褪色，但是需要一种媒染剂，那就是“土耳其红油”。当然这种媒染剂不仅对土耳其红这种染料适用，而且使用它染色时，许多染料都可以增加染色效果，降低染料消耗。这种产品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在蓖麻油里加上硫酸，化学反应后再加碳酸钠中和，就成为可溶的土耳其红油了。在这种产品上市后，我又开发了另一种媒染剂，那就更简单了，生产的办法是把结晶硫酸铜脱水之后再加浓硫酸若干进行搅拌。在上海的好几家染房试验，也能做到不褪色。节约染料、使织物染上的颜色鲜艳等效果都很好。于是就开始生产，销路也还可以。这种产品过去没有人生产过，因此起了一个商品名“固色灵”。这个化学工业社只筹备了两三个月，就在龙华镇找到了厂址，雇佣了五六个工人开始批量生产了。那时我还在高二，这两种产品的销路不错，应该可以赚到不少钱的。不过开销很大，我一直怀疑伯父是用办这个工业社来骗取我家地契的。不过后来了解还不完全是这样。我除了在实验室继续搞新产品外，每周还要到那个工厂去一两次，这

也应该算做家庭教师外的第二个职业，不过钱不用我而是用我父亲的名义收。

此外，我在大同附中读高二时在私立上海中学教了一个学期的高三物理。一个高二的学生怎样当上了高中三年级的教师？这也有一个原由。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在那个中学，高三物理的教师不能去教了，有人就推荐我父亲去担任。家里的经济这么困难，这个机会舍不得放弃，可是我父亲不敢去教，就称病要我去当代课教员。那时我将近17周岁，是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的学生，给同一个学期的学生上课，学生中不少人年龄比我大，而且是第一次上课堂，没有经验，我很紧张，做了连着讲两堂课的准备。谁知不到一堂课的时间，准备的内容快讲完了，心里着急得不得了，好容易到下课铃响了，马上在教员休息室备课。干了两三个月总算把这件工作完成了。这个工作每月也只有30元收入，赚这30元可真不容易。

1931年9月18日事件发生时，我在高二读书。消息传来，我们全家都哭了。我父亲说中国人快当亡国奴了。全家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气得不得了。哭过、气过之后没有什么办法。不过这件事对我的思想有很大触动。而且在“九·一八”以后不久，上海又发生了“一二·八”事件。在“一二·八”事件中，上海人不只是兴奋（十九路军终于同日本军队开了仗）、扼腕（中国军队被打败了，闸北汉奸那么多）、气愤（政府投降），而且住在非租界的人还有实际问题，这就是要逃难。

1932年“一二·八”时，有几天住在上海南市的人都往租界去“逃难”。我们全家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一个远房堂兄家里

住了几天。“一二・八”战争中日本军队焚烧了东方图书馆，对这事我也非常愤慨。在逃难的那几天我也没有放弃我的“学习”，我发现在离金神父路不远的亚尔培路，有一个中华学艺社图书馆。这个图书馆虽然不大，藏书不多，但是很合我的需要。地方很安静，借书方便，从家里到那里比去东方图书馆近得多。因此以后我就常去这个图书馆。

我就是这样一边做事赚钱付学费并且贴补家用，一边在学校图书馆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到1932年暑假，我17岁时高中毕业了。

## 1.5 大学前三年(1932—1935)

高中毕业后仍然面临升学还是就业的问题。我已经有了一年半工半读的经验，这个问题不费什么斟酌就解决了。而且我决定就从大同附中直接升入大同大学本科。我赚钱的机会比附中时要多。有时候我在好几个地方“打工”。唐家介绍我去周家当家庭教师。唐家三个学生两个是初中程度，一个是高小，周家的四个学生全是小学程度，工资也是30元一个月，工作很轻松，而且每周也只占用我两个晚上的时间。我还在一个姓汪的人家为一个在持志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补习物理学。她大概比我还要大一点，也是30元一个月。这也占用我每周两个晚上。同时在三姓做家庭教师，每天晚上都去赚钱，90元的收入是很不低的。有一个学年，我在上海民立女中教一班学生初等代数，每周6小时，工资只20元。教课倒用不着准备，

可在批学生卷子这件事情上有一次我却遇到了麻烦事。那次，两个学生各自拿了自己的作业本来找我，把我给的分数捂住，问我她们都应该得多少分。原来这两个女孩答得一模一样，而我给的分数一个高一些，一个低一些。弄得我很被动。经过这一回以后我看卷子就只打个钩不批分数了。在我上大学一二年级时，电木这东西刚开始在我国市场上出现。它是以福尔摩林和石碳酸为原料制作的。上海有一个商人给了我他得到的几份资料，希望我把它们翻译成中文，我也有偿地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样加起来收入多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有一百三四十元钱，少的时候也有六七十元，真不算少。

重心化学工业社的事我一直在干。但是钱是给我父亲的，不是给我的。因此在我每月赚得的钱的总数中包括重心化学工业社给的钱。不过我伯父并不按月给我家钱。他常常说这个月没有赚到什么钱，暂时欠着吧。伯父对我的试验很关心，有时深夜跑到我的实验室来，了解我工作的进展。那时候我对开发产品的工作已经发生了兴趣，给不给钱我都会去做。我想通过试验生产的产品有好几个。一个是碳酸镁，它是制造胶鞋需要的填充料。那时人们还有用牙粉刷牙的，牙粉用的就是碳酸镁，不过这个试验失败了，因为我只能采用湿法，即用盐卤加碳酸钠来制作，结果做出来的碳酸镁密度太大，而不论胶鞋或者牙粉需要的都是体积，很不合算。同时用这种办法生产出来的碳酸镁盐分洗不干净。碳酸镁也不是完全不溶于水，洗多了碳酸镁的产量就减少。这个产品开发研究工作最后失败了。通过这件事使我懂得化学工业不是只靠一般的化学这一学科

的知识所能解决的，还要懂得许多工程知识并且需要一套设备，一套工艺，我实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也根本没有这么多的资本。我还在报上看到黄楚九做的关于“金耳”的广告，说他的金耳比银耳——也就是比白木耳更滋补。这黄楚九是上海有名的人物，是大世界的经营者。在“百龄机”这种药品上，他做的广告花的本钱非常大。在上海，百龄机的广告可以同日本仁丹的广告相比。他有一句当时上海几乎家喻户晓的话：“百龄机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就是这个黄楚九现在推出了他的“金耳”。我弄到样品一看，认为那不过是用黑木耳漂白没有变成白色的东西。于是我就用二氧化氢去漂黑木耳，制造出来的东西与黄楚九的金木耳真差不多。不过一想在广告上无法同黄楚九竞争，这个产品放弃了，不过后来黄楚九似乎也放弃了这个产品。

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我也考虑了一个学工科还是学理科的问题。当时我考虑工业大权掌握在外国资本家和国民党政府手里，学了工科就会替他们服务。我不想这么干。为本国的资本家服务我也不愿意。而学理科研究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是满足我的一种愿望，为自己服务。

我既然已经走出了半工半读的路子，我又可以安心学我想学的东西了。在大同大学学习的两年中，我浏览了大量的书，除了亚尔培路那个中华学艺社图书馆外，后来我发现大同大学学校图书馆也不错。在大同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是一个比我高四个年级的女同学，她的名字叫忻爱华，工作非常耐心。我也成为这个图书馆的经常的读者。

一方面我作为一家经济支出的重要负担者尽可能多地赚钱，一方面又非常紧张地学习，这样的生活，培养了我不怕苦不怕累的性格，也养成了一天工作很多小时的习惯。

那时我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有一天早上我一睁眼，房子在旋转，想起床竟然起不来，最后我挣扎起了床，房子还在转。可是我还是到学校去了，在路上怕跌倒，常常扶着墙和电线杆子。我得了这样的一个病，可以说一小时也没有休息。可是，就是从那天起我一直耳鸣，60 年来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一直到现在。

自从“九·一八”事件后，我对国民党政府很不满意。在上海，帝国主义者横行霸道的事又特别多，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看到一次生气一次。一次我和父亲走在街上，有一个外国人用上海话骂了我父亲一句“赤佬”，我气极了，一下把他抓住要同他打架。那时已经很晚，街上没有别的行人，这个外国人看见他只有一个，而我们是两个人，以为打不过，求了饶，我才放过了他。那时上海街上常常可以看见我们党组织用黑漆刷的大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政府”、“中华苏维埃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参加红军去”、“苏联万岁”。这些标语使我很兴奋。在大同大学的阅览室，我也看到过两次革命传单，一开头两句我还记得：“青天白日满地红，刽子手匪陆皓东。”下面全是骂国民党蒋介石的话。传单这样写，后来看当然不好，很幼稚，可是当时觉得写得很大胆，给人印象很深。

我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经历。1928 年在北京第三中学初

中学习的一个同学潘学阁，后来当了国民党的一个小兵。他在江西同我们红军打仗，受伤后当了我们红军的俘虏。在被俘后，他受到红军俘虏政策的优待，在苏区养了一个时期伤，跑到上海与我在街上偶然相遇。他客观地向我介绍了红军和苏区的情况。讲的全是好话。这更使我想参加革命，但是我一点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九·一八”后，上海大同大学也有人到南京参加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的活动。同班同学中有一个女同学柳无垢（柳亚子的女儿），还有一个叫杨镇邦的（后来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又是同班同学）都参加了，但是事先我不知道。他们回来之后，我埋怨他们不约我去。我有参加革命的要求，但一直没有遇到过一个革命的引路人，没有人来找。如果有一个引路人我现在就又是一种经历。

进大学后我交了一个好朋友程淡志。他从上海育才中学初中毕业后直接考大同大学，因成绩优异被录取了。我同他很谈得来。自然科学问题、社会政治问题谈得都很投合。他住在药局弄，也是 55 号，是个独门独院，环境很单纯，而我住的顾家弄 55 号这个大杂院，院内人口有七八十，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非常复杂。他对顾家弄 55 号这个小社会很有兴趣。我一个人一个人地向他介绍。这些人是我经常接触到的邻居，不过以前未曾有意识地去认识他们。同他一讨论，对我认识这个小社会——它是上海这个大社会的一个角落——也有好处。后来我同程淡志还一起在上海做过社会调查。有一天，我们吃饱了午饭就早早地去了上海有名的游乐场“大世界”做调查。带了笔记本和笔，准备把看到的事情做记录。晚饭就在“大世

界”吃带去的“干粮”，一直到深夜才回来。那天也了解到不少情况，看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比如我们亲眼看到一个穿着和尚衣服、光头烧有香洞的小和尚被几个“野鸡”拉走了。被拉时这个和尚的脸上还笑嘻嘻的。还看见一个女人，长得很高，脸上涂的粉太多太白了，在一张大嘴上另外画出一张小嘴，猛然见到吓了我一跳。当时我就奇怪关于美丑的看法的差别会这么大，那张吓人的脸至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大同大学一二年级时我倒有了做社会调整的意识，可不知道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

上高中二年级时我的主要问题是继续学习还是去“学生意”，到高中毕业上大学之后，这个问题不存在了。那时候继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还是去革命的矛盾还没有产生。我已经有了革命的要求，但并不认为要离开学校。当时我在革命方面得不到领导和帮助，也没有想得到领导和帮助的想法。我只知道个人奋斗，路见不平就想挺身而出。在 1932 年大同大学 20 周年校庆时，骆驼话剧团到学校的操场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剧中演到那艺徒挨打时，我不知道是在做戏，差半分钟就进场打抱不平了。

不过总的说来，在那个时候想研究学问使自己成为一个学者的思想还是占着上风，1934 年我决定转学清华就是这种思想状况的表现。我听说清华设有研究院，大学毕业后可以继续深造，而大同大学没有这个条件，当时我还知道清华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也比较多。但是如果我进了清华，家里的收入就要减少许多，甚至完全没有，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不能

不考虑，可是经过一番内心的矛盾和斗争，我还是决定去报考清华，要求转入这个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前年我翻阅我自己的档案，发现 1933 年我曾要求大同大学开了封参加清华大学转学考试的证明信，可是我把这件事完全遗忘了。看来我只是开了这封证明信并没有去报名应试，因此印象很浅。在 1934 年大概也开过这样的介绍信，可是在我自己的档案中却没有。这一定是在报名时把它交走了。这封 1933 年的介绍信，证明我那年暑假也发生过有转学清华的念头，大概因为考虑家庭问题没有去进行。

后来知道转学物理系三年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清华物理系一年级新生人数在 20 人左右，可是二年级时只能容纳 10 人左右，比我高一年级物理系的学生只有 6 人。招插班生是想从别的学校吸收个别优秀学生的意思。但在我之前和之后没有招进过三年级插班生。如果我知道这个情况也就不去报考了。没想到我竟然考上了。

在应考的那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几乎使我耽误了考试。这件事也可以表现出我有上面说的反对帝国主义、路见不平就不顾一切挺身而出的那种性格。当时清华的考场设在大厦大学，从我家到考场要坐公共汽车到梵王渡。我坐的那辆公共汽车到达梵王渡站时，有一辆黄包车停在站上，车夫不在。见到汽车来了，车夫赶快跑回车站去把黄包车拉走，这时同我坐在一辆公共汽车里的英籍职员，就下车去追赶黄包车夫，用手中的手杖去打车夫。那手杖大概是金属的，一打车夫头上马上出血了。我就下午去动员在那儿的黄包车夫们去对抗这个英国

人。这时中方警察局来人了，把几个车夫和这个英国人都带走了。我对警察说，我是英国人打黄包车夫的目击者，愿意作证，留下我的住址。整个事件经过半个多小时，如果再长一点，或者把我也带走，那么转学清华的事就不会有了，当时我把考试这件事完全忘了。事后，我赶到考场，刚刚开始考试，倒没有误事。

被清华录取之后，我还不知道从经济上考虑自己能否上得了学。这时在报上看到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王伯元设有一笔奖学金的广告。大概靠清华大学的牌子，我去申请倒没有费什么口舌就给了，一年 400 元大洋，我自己花销一百几十元就够了，留下 200 多元给家里用。这点钱比我打工要少许多，可是也不无小补，我母亲对我转学清华是很支持的，于是我进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了定局。

到 1934 年暑假我很想在“革命”方面有所行动。我就一个人到浦东陆家嘴工人住宅区——那个地方有一些帝国主义办的工厂——去了两次。通常是我提前吃晚饭，到工人那里他们正在吃晚饭，或者晚饭后正在街上乘凉，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不容易被人辨清自己的容貌。去了随便找个地方一坐，就给工人讲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讲一会儿就走。然后就去唐家做我家庭教师的工作。我教唐家的孩子一直到我离开上海去清华之前，为的是多给家里留点钱。去唐家，夏天我通常穿一件湖色纺绸长衫。到工人那儿去，那样一身不合适，所以去时把那件长衫放在包袱里改穿一身短衫，讲完之后再穿上长衫到唐家去。我考虑到给工人讲话要学一

些工人的语言，于是就学了一些平时从来不说的粗话包括那些脏话，带点“国骂”的字眼。这也弄得我很紧张，提心吊胆，怕在唐家一不小心去把学来的粗话、脏话讲出来，那就会使他们大吃一惊。我的这种工作方法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

1934 年到清华，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住进学校的宿舍。住在清华新斋，两个人一间房子，比起现在的大学生来舒服得多了。不过头一年同住的一个同学我很不喜欢，生活不习惯。清华物理系的教师是第一流的，讲得很好，同学也都学得很好。在那里，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以前的习惯，在课堂里不做什么“副业”好好地听课。但是并没有彻底改，我还是常到学校图书馆借各式各样的书看，特别是同自然哲学有关的书。对考试前做准备这样的事，我还是不做，也不会做。考试的成绩虽然大部分还是“金钉钯”(E. Excellent 优等)、“银麻花”(S. Superior 上等)，但全年下来还是有一门课是“三节鞭”(N. Normal 中等)。在学校总的说来我还是一个老老实实读书的学生。

在 1934、1935 年两个暑假之间的那一段时间中，我和程淡志频繁地通信。我们俩的信越写越长，有时信太长了，一个信封装不完就装两个信封同时寄，信中讨论的都是社会政治问题。这时候大家都看些进步书刊，对书刊上的东西常有所议论，但更多地写一些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其中讲得最多的就是上面讲过的在大同大学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在学校学习外语的那个忻爱华之死。她是在我去了清华之后半年左右自杀的。程淡志和我通信中详细分析了忻爱华自杀的原因。程淡志在

忻爱华自杀后做过调查，她的家很封建，不给她恋爱的自由，要强迫她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她本人患有肺结核（我在图书馆就听她咳得很厉害），得不到好的营养和治疗，学校只知道使用她，把她视作廉价劳动力，并不关心她。就是这样的一些原因，使她自杀身亡。因为我们都很熟悉她，因此虽然这种情况说来也很普通，但是我和程淡志还是特别重视的。我们从她自杀这件事的调查中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确是一种罪恶的制度。

那一年在清华我除了本系、尤其是本班的同学外，没有同别的班的同学接触，我不了解学校里都有哪些已经参加革命的人，他们也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想参加革命的人。

1935 年的暑假到了。我回到上海见到程淡志之后，开始按照我们信上谈到的那些想法活动。程淡志利用他们母校育才中学校友会的名义办起了一个小刊物《育友》。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在这个刊物上写一些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我本来同育才中学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要我写，我也就为这个刊物撰稿。参加《育友》活动的都是程淡志的朋友，有王义道、程祖钧、周天行、鲍正廷、张静生等，我这个非育才的校友也同他们搞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已经懂得干革命一定要靠工人和农民，我们就想用办识字学校的办法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于是就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弄堂房子的厢房，利用暑假学校停课的条件，从一所学校借来了桌子和凳子，布置起一个教室，由我们自己出钱买了本子和铅笔，自编识字课本，在街上贴出招生广告，就把这个识字班办了起来。说起来也真可笑，我们想，既

然办的是工人识字夜校，就要讲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道理。我的识字课本按照《资本论》第一卷的体系来编：一开头就学与商品、价值、剩余价值有关的字眼。这个识字班一开始报名有四五十人，房间里坐得满满的。几天后就稀稀拉拉办不下去了，不少人领了铅笔本子便不再来了。结果第二次招生，每个学生收几十个铜板的押金，中途退学的押金不退，这才把学生基本上稳定了下来。第二次招生讲了几次之后，我们发现“学生”中有两三个人可疑。这几个文化程度相当高，特别是其中有一个自称是邮局的工人，他们不是识字教育的对象，但是每次都来，表现得很积极。我们越看越怀疑他们之中有警察局派来的特务。不过这个工人夜校倒没有出什么问题，最后把它办完了。延安审干时讲到我的这段经历，审查我的人对我讲的情况表示怀疑。他们说 1935 年党中央机关在上海被破坏，白色恐怖很厉害，你们那么革命，难道工部局会不注意吗？为什么能让你们安全地办完那一期识字夜校而没有把你们抓起来？他们是怀疑我们在搞什么与工部局有默契的鬼。我回答说正因为我们没有党的领导，不知道党中央机关设在上海，更不知道这个机关在 1935 年被破坏，真正党领导的组织都已经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不会采用我们那种方式活动。我们当时就认为警方是已经注意到我们，也许他们对我们的行动注意观察，看来看去，不像是共产党做的事，同时我们办识字班的时间又短，所以没有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一起活动的就是上面说的程淡志在育才中学念过书的几个校友，不过参加识字班的，我记得的只有王义道、程祖

钧、周锦钧等几个人。静安寺的学校还没有完，我们觉得办这么一个班不需要这么多人，于是就动了分几个人到农村去办识字学校、在农民中做工作的念头。因为程淡志的姐夫在杭州一家旅馆当帐房，我们就决定去杭州附近的农村。我们的计划是利用假期还剩下的二三十天，与农民接触一下，最好能够挑选到农民觉悟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农村，以后经常联系作为我们的一个点。决定了就马上行动，带上笔和纸，来不及编农民教材，准备到农村临时编，很快就出发去了杭州。我们沿着杭州到桐庐、南京、上海、萧山的公路一连跑了一个多星期，每天来回至少走二三十公里路，总共200公里左右。那时我和程边走边聊，走得很快，早七点前就出发，下午五六点才回来。中间除了与当地农民接触外，一直在走路。有一天下大雨，真是雷电交加，我们走的是去萧山的那条路，我们还是“照走不误”。跑的结果是当地农村办事的人不让我们办这种识字学校，他们对我们不放心。我们越是表现不怕吃苦，他们就越害怕，于是白天去农村活动，晚上回新新旅馆睡觉成了那些天我们做农村工作的方式。这次杭州之行，对于我们来说，增加了不少农村知识，也知道深入农村之不易。

1935年暑假的活动，是我们最早的革命活动，但是没有党的领导，直接的间接的都没有，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那时，一是我有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理想；二是我懂得只有工农大众自觉起来革命才能改变这个罪恶的社会制度，因此一定要唤醒群众；三是自己有献身精神。我拥护中

国共产党、拥护红军、拥护中华苏维埃、拥护苏联，但不知道要去找党，相反的自己觉得仿佛已经是共产主义的战士了。后来我学了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觉得当时我们的觉悟和活动方式同俄国的民粹派有点相近。

我的20岁生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

## 1.6 写在后面的话

亲友们建议我别的工作放一放，先写自己的回忆录，我认为应该考虑这个建议。写回忆录这种事情是我这样"上了岁数的人"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我虽然没有担任过什么党政要职，但几十年中毕竟有一些自己接触到的有意义的重要的事情应该记下来，给今天和明天想了解这些情况的人看看。不写，这些也许只有我和少数人知道或者只有我和少数人注意到的事情，就永远没有人知道了。我应该把这些事写下来，我认为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就应该对历史负一点责任。

但是我这个人的兴趣主要在现在和将来。我老是在发起做这件事或那件事。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写回忆录这样的工作始终没有真正开始，只有些回忆片断。我认为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老年人向前看是应该得到特别肯定的，我的青年时代的老战友李昌，他比我还长一岁，离开领导工作岗位"退居二线"之后，一直积极为各地区的建设事业奔波，最近他说自己正在"创业"，有人觉得快80岁的人说"创业"这样

的话有些怪，我却很欣赏他的这种精神。不过写回忆录这样的事情，我还是应该做的，我应该安排出一个时间，把别的工作放一放，先写出一个稿子来，然后再补充和把事实核对得更准确。

现在我讲自己的20岁前不是写回忆录。写自传性的东西和写回忆录毕竟不是一回事。回忆录是近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为历史学家提供研究资料的著作方式，有的回忆录甚至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历史学的著作。回忆录的特点是，作者是对提供某些重要史实有资格的人，即他确实知道某些事实，掌握第一手材料，同时又是一个有严肃科学态度的有责任心的人，是一个人们对他可以信得过的人。他写回忆录就是用他的这种资格和信誉保证所写的真实性，有些写回忆录的本人就是历史人物。而自传只是由本人来写本人的经历。当然自传和写回忆录有某些相同的地方，甚至有某些相同的内容。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某些经历，而在自传中可以看出人们想从回忆录中看到的某些史实。我认为自己是有写回忆录资格、可以写回忆录的人，不过所能写的东西并不多，也不是最重要的。

对于自传我也考虑过，似乎也应该写，不过现在我写的《20岁前》(包括在我20岁前有关的一些故事)还算不了自传，只是一些自传材料。

我想了一下，如果我去写自传可以分作三个时期来写。

第一时期便是20岁以前。从1915年到1935年。这是我的幼儿、儿童、少年和青年时期的一部分。这20年是我长身

体、长知识，性格初步形成的时期，也是政治思想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末了，便是我快成长为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者的时间。不过我在满 20 岁的时候还没有参加“一二·九”运动，我从事的革命活动是在党的影响下但还不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如果要划阶段的话，也许还要向后推四五个月。在这 2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儿童、少年和青年。当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经历，每个人在这个时期获得的知识和形成的性格都不会一样。

第二个时期是从 20 岁到 60 岁，1935 年到 1975 年。在这 40 年中，我一直勤勤恳恳地为人民的事业奋斗，实心实意地工作，在工作中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在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知识，在某些领域也许可以说有了些专门的知识。在这 40 年中，我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但只有两年。接着参加了八年抗战，其中两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党的青年工作和组织工作，六年在延安做青年工作、文化工作、研究工作、干部学校教育工作。日本投降后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做报纸工作和党的宣传工作，并且专门做了一年多的土改工作。在建国前，我 20 岁后一共工作了 14 年。建国时我 34 岁多，这 40 年中还有 25 年多是在建国后度过的。这期间主要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还兼做国务院部门的工作，主要是理论研究、教育与自然科学技术的管理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到退居二线前，一直做这些实际事，没有专门在学术机关里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只是在做这些工作的同

时，从事研究和写作，逐渐成为学者。在这40年中，我还多次成为政治运动的“对象”或“准对象”，像延安的“抢救运动”、反右派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些虽使我耽误了许多时间，不过我也因此得到了锻炼。这40年总的来说，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和在政治上是不够成熟的，我只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党的政治原则并坚持这种原则，但是对中国现实政治生活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党内斗争可以说没有入门。

第三个时期，60岁以后，也就是1975年之后，这个时期至今没有结束。1975年7月我正式恢复了“文革”中被停止的工作，并被分配到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力量和四人帮之间的尖锐斗争，而且积极参加了这个斗争。在1975年四季度开始的那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个单位被四人帮诬为“邓记谣言公司”，它是那场政治运动的重点。我又一次成为斗争对象。这场斗争过去之后，我积极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列席了这次全会。在会上我做了我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从1978年到现在14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14年中。我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同时又经历了不少曲折，有资格写回忆录和应该写回忆录的主要是这一个时期。

现在第三个时期的回忆录怎么写还没有想好。关于第二个时期的这本《我的编年故事》。是想从1935年到1975年每年找几件事回忆一下。其中有以我为主体的故事，也有以别人

为主体的故事。写完了这编年故事就有了不少材料。现在我用这个形式提供20岁前的自传材料。20岁前是三个部分中最没有价值的，一个普普通通青年的经历不可能引起人的什么兴趣。回忆20岁前的事情，对我来说是病中一种“废时利用”的性质，既然开始写了，就把它写完了吧。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起了延安整风运动初期的情景，那时党组织要求每个人写自传。那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回顾自己的过去。当时党组织要求每个人通过对自己过去的分析，认识自己在参加革命前本人的阶级属性，自己的思想状况和参加革命后自己的转变，以及直到写那个自传时自己的觉悟程度。当时我觉得做这样一件工作自己得益不少。那时我不满27岁，尽管组织上要求自传的重点放在参加革命后的那6年，但是从时间上来说，这20年占的比重很大，占到那时年龄的2/3以上。而现在我已经77岁，20岁只占我年龄的1/4略强。现在我讲的20岁前，当然不是整风时写自传的目的，也没有那样的意义。现在我考虑的是，要么不去写那个时期的我，要写，也会有一种意义，那就是20岁前的我毕竟是后50多年的我的一个基础。不论从知识上或者性格上都是这样。20岁前我自己有些特点，至今还保存着。写自己的20岁前可以加深对自己的认识。

附一

# 读书为了自己长进

越老就越觉得年轻人可爱，越喜欢给只有自己年龄 1/4(20 岁)左右，1/5(16 岁)左右，1/6(13 岁)左右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平常接触到这样的年轻人很少，有时就在心里给他们说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少年时代。当我随父母从北京到上海从而不得不转学时，一个四二制的中学，糊里糊涂把我这个原来在三三制高一的学生，收作它高一的学生。这样，中学我只学了五年。由于我的生日正好在暑假里，我的中学生时代便是从 12 足岁学到 17 足岁。我常常把那时的我同现时的中学生比较，在我心里，也常以那时的我同现时的中学生对话。

60 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不同时代的少年，过的是很不相同的生活。然而同是少年人，就面临许多相同的地方。因此我还是有资格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某些“成功的经验”。

比如我可以对他们讲，读书是为了长进自己的知识、培养自己优良的品德，不是为了考分。考试只是检查知识长进的手段。我很庆幸，在中学时代，从来没有为考试发过愁，甚至很少专门为考试做准备。我考分虽一般不高，但我认为自己知识学得不错。当然我还是经过了考试的检查的。初中毕业时我报考当时北京最好的高中之一师大附中理科，而且只报考这一所，据说很难考进去，可是我还是被录取了。我也没有花什么

时间备考，而是靠平时扎扎实实地学习。我越不为考试发愁，我就越可以用本来会花在备考上的许多时间来增进新的知识，并在不断增进新知识的同时巩固已经获得的知识。我虽然几乎不准备考试，但是考试及格我还是有把握的。

我想讲几句不那么谦虚的话。在高中的时候，在邻居和亲戚的小圈圈里，我被公认为“是有点学问和本事的”。所以那时会有工厂专门找我解决他们生产出来的牙膏放久了干得挤不出来的技术问题；有一个工厂请我去当他们的技师；也会有那么一个大人，要我代他到另一个中学教高三物理，而那时我自己还在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学习哩。

我有必要声明一句：现时的中学生面对的情况同我少年时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那时就没有全市乃至全国的统考之类的事情。你们千万不要照搬我的经验，而要根据你们面临的实际情况，自己拿主意，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必须告诉你们，就是当时我的同学中也有学习方法与我很不相同的，他们特别认真听课，也认真备考，考试结果年年名列前茅，而且以后有了很大成就。像我这样的学生就在当时也并不多。希望你们不要由于照搬了我的做法，学不好、考不好找我算帐。这样我就担当不起了。但是“读书是为了自己长进，不是为了分数”这个道理，我想在原则上总是正确的。

附二

# 怀念大同二三事

我在上海大同上了三年半：一年半高中，两年大学。在我上过的大学和中学中，大同是时间最长的一个。

一个学校留给不同的学生的印象是不会相同的。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有这样几条。

从开设的课程来看，学校注意某个老师对某一门课程特别有研究就请他去开课。结果这样的课程听起来特别有趣。

在这里我想先讲一下在高中所听的平面几何。这门课以前我已经读过两次。第一次是初中一年级，在北京三中。那次所用的教科书是“三 S”几何学，即名字是由三个“S”打头的美国人写的教科书，那书编得不错，但很简单。第二次是高中一年级，在北京师大附中听师大数学教授傅仲荪讲这门课。傅用的是他自己写的讲义。这门课我学得很有兴趣。大同大学的吴在渊教授对平面几何有他自己独到的研究。在附中开课教我们时，用的是他自己写的书。一听他讲课，觉得果然不凡。我虽然已经第三次学这门课，但还是兴趣盎然。

还可以举在大学里学的《说文解字》。这门课是朱香晚老师教的。他讲得非常生动，许多说法在书上不容易找到。比如他举了许多例子来讲篆字的变化发展，有一些我至今都还记得。他讲“西”这个篆字，形象是鸟站在鸟巢上，本义就是现在的栖。可是因为作为方向的“西”字比“栖”用得多，而鸟还巢的

时间又正好是在太阳西下的时刻，因此这个字的意义就变成了西，同时又另外造了一个“栖”字……因为朱香晚老师对《说文解字》的确有研究，而且很会讲课，这门课的教学效果就很好。

也许会有人说这种做法有些“因人设课”的味道。我认为的确有这么一点。又也许会有人说这是因为大同的教授不那么多，不得已才这么做。我想可能也符合当时大同的实际。但是我认为“因人设课”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死板地开课程，让对这些课程并没有什么研究的人讲课，结果老师讲不出多大学问，也很难使学生产生兴趣。

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得很清楚。那就是胡敦复——他是大同的创始人之一——一个自然科学家，我听了他的一门逻辑学。他用的教材不是一般的逻辑教科书，而是穆勤的英文原著。胡敦复虽不是逻辑学家，但是他把逻辑学讲得很清楚。同时因为用的课本是穆勤用英文写的书，他一边讲书中的许多逻辑学原理，一边又教书中的英语。我在大同还学习了世界通史，也是胡敦复教授教的，用的也是一本写得很好的英文教科书，同样也是一边学世界史一边学英语。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办法。

在大同（包括附中），实行学分制，而且提倡选课。我在高中学理科。在大学本科由于没有分数理化各个系，我进的也是理科。但是我还选了不少文科的课程。看起来选修像说文解字、逻辑学这样的课程，似乎会妨碍本人专业知识的学习，不过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并非如此，反而使我得益不少。

总的说来，我认为大同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让学生在学习中有较多的自由，功课考试也不很紧，不会将学生压得喘不过气。因而学生可以比较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我感受如此，也许同我在学校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有关。不过我还是要说，自己从中的确得到了好处。

**附三**

## 20 岁前我的学历

在一个人的经历中有一项是学历。

什么是学历，查了一下辞书，从两部辞书中查到的都是“求学的经历，指曾在哪些学校肄业或毕业”的意思。

在自己填表和看到别人填的表上，学历一项填的都是“在哪些学校肄业或毕业”。这是约定俗成了的事情。但是再一推敲，辞书中这么解释有欠准确的地方。因为“求学的经历”可以超出在学校念书的范围，不说古人，就是我这样年纪的人，也曾在私塾中学了几个月。私塾不是学校，这几个月的经历是否属于学历的范围，从辞书中就很难有准确的答案，因为它的释文有矛盾的地方。而且就是在当代，也还有不是在学校里学习的，这种现象在技术和艺术方面比较多。我建议辞书对“学历”这个词目干脆说它有二义，一是“求学的经历”，二是“在哪些学校肄业或毕业”，这第一义也就是“学习的经历”的意思。

不过这“求学的经历”或“学习的经历”很泛。在我的教育

思想中，是不同意“学前教育”这个说法的。我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开始了受教育的过程（对胎教我还有保留）。我主张把现在人们讲的“学前教育”改为“校前教育”，因此第一义的“学历”的下限可以把婴儿和幼儿教育包括在内。可是第二义的学历的下限就是从小学开始，它的上限就是离开学校，结束学生生活。第一义的“学历”的上限可以一直讲自己学历的那个时间，活到老，学到老，一直到老都是学习的过程。所以讲第一义的学历，就要确定所说上下限的时间。

我已初步完成了我的自传的第一部分（20 岁前），文稿已送去出版社，在这方面只剩在付排前作一个补充了。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形成这样的看法，我的学历不应该只包括我都上过什么学校。通常讲的“学历”就只有这个内容。可是对我 20 岁前的情况来说，似乎就不合适了。在我 20 岁前的学历中，除在什么学校肄业或毕业外，还应该加进其他的几个方面：

（1）应该包括我去过的一些图书馆。由于我开始自学的时间早，许多知识我是作为图书馆的读者得到的，我对我去得多的每一个图书馆都有深刻的印象，对在每一个图书馆我都读过哪一类的书也还记得比较清楚，因此我认为上图书馆也应该成为我的学历的一部分。

（2）由于我从十六七岁起就半工半读，这半个“工”不仅维持我自己学习的费用，也对处在学生时代的我起着补助学习的作用。不但我的一些工作能力是在这半个“工”中得到提高的，就是不少知识也是在这半个“工”中取得的。比方我在十六

七岁后在一个小的化学工业社当技师，那个工业社给我装备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要我在这个实验室中开发产品。我的许多实用化学知识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做试验获得的。后来又懂得了一些做社会调查的意义和与朋友在一起做了些观察和调查。这“半工”这“调查”也应该看作自己的学历。

(3)最近我写《漫谈竞赛论》这本书时，发现我10岁左右在上海自己生活的那个院子——顾家弄55号里看人家下棋、打牌，也应该算做我的学历。没有这段学历，我就写不出《漫谈竞赛论》一书中的某些内容。

# 2 九个故事

## 2.1 铃铃闯了祸

妈妈走了，铃铃没有哭。妈妈说下午就接他回家。男孩子是不作兴哭的。妈妈常说，铃铃记得。

再说这个地方真新鲜。家里哪有这么多的小椅子？只有一把也没有这儿的好看。这儿还有家里根本没有的小桌子。房间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五颜六色的玩具。这里还有好些同铃铃差不多大的孩子。那个方才跟妈妈说了一会儿话的老师，把铃铃带进了这间挺大的屋子，对那些孩子说："今天你们多了一个小朋友，"然后又指着他说，"他叫铃铃，大家鼓掌！"几个小孩子一起鼓掌。铃铃很高兴。

过一会儿"老师"教大家唱歌。那些小朋友都会唱，铃铃不会，学着唱，唱几遍，也就会了。家里妈妈也教过，铃铃想。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唱呀唱的，唱的嗓门也大了起来。

吃饭时候到了。铃铃的肚子也饿了。"咦，

怎么妈妈又来了!”妈妈手里提着一件他没有见过的东西！原来是好几个扁的碗叠在一起。把这东西打开,一只碗里是饭,一只碗里是菜,还有一只碗盛的是汤。妈妈真好,知道铃铃饿了,吃的东西就送来了,都是铃铃喜欢吃的。

这时候别的小朋友家里也送来了饭菜,用的都是妈妈带来的那种东西。铃铃问妈妈,这东西叫什么,妈妈告诉说这叫“饭盒”。以后每天吃的东西都是装在饭盒里带来的。

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铃铃在这个叫做清心幼稚园的地方,呆得很自在。每天下午妈妈接他回家,第二天早晨送来。时间长了,铃铃也越来越不拘束,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做许许多多游戏。铃铃家里只有一个妹妹,比铃铃小两岁,才两岁多,铃铃嫌她小,同这儿的孩子就能玩得在一起,特别有几个男孩,同铃铃很要好。铃铃想玩什么就玩什么,玩得真起劲。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到了,大家都在桌子旁边等饭盒,而且有两个小朋友家里送来的饭盒已经放在桌上了。铃铃爬到小桌子底下,忽然站了起来,心想让大家高兴一下。没有想到桌子翻了,那几个饭盒全掀到地上,饭菜撒了一地……铃铃一看,慌了,知道闯了大祸。小朋友没有饭吃,老师会生气,怎么办呢？铃铃害怕了。

房间外边就是上楼的梯子。楼梯底下用木板一隔就成了一间储藏室。储藏室还有一扇门。铃铃进去把门关上。他躲起来了。

房间是黑黑的,只有微弱的光从楼梯和门的缝里透进来。

铃铃在里面只听见老师在着急:“铃铃到哪儿去了？到处找都不见他!”还有别的声音都在为找不到铃铃而着急。“这不是妈妈的声音吗?”原来妈妈也送饭盒来了。妈妈说的也是着急的话。找铃铃的人这么多,都这么着急,铃铃有些得意起来,觉得自己挺重要,人们少不了自己。怕责罚的心理,被这种自豪的心理代替了。

过了一会儿铃铃听见有一个人说:“这间房子还没有找过,进去看一看,说不定这孩子就躲在这里头。”铃铃一听,知道躲不下去了,走了出来,说:“我就在这里!”“铃铃找到了!”大家都很高兴。

铃铃没有因为闯了那个祸而受责备,被铃铃弄得没有东西吃的小朋友,也没有来责问铃铃。老师、妈妈还有别人反而安慰铃铃:“你不要怕,没有什么要紧的,只要以后注意点就是了。”经过这件事,铃铃觉得老师和小朋友对自己更好了。大家对他越好,铃铃就越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自己逃跑、躲起来,实在不应该。他对自己说,男孩子闯了祸就应该自己担当,逃跑不是勇敢的行为。从害怕到得意,后又不好意思,铃铃的情感在变化着。这件事,铃铃一直记着。

这铃铃不是别人,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本人。那时铃铃 4 岁,现在他已经 80 岁了。可是这件事他还记在心上。现在他想试着讲讲幼年时的故事,不知道能否写得好?不知道小朋友们是否喜欢看他写的这篇东西?

## 2.2 在外婆家

一天，妈妈对铃铃说，外婆来信了，说她和外公都想你，让你去他们那儿玩些日子，你想不想去？铃铃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声说："去！去！"

铃铃去过外婆家，那是他"小时候"的事情，还不到 4 岁，现在铃铃长大了，5 岁都过了。

铃铃记得，外婆家在乡下，没有楼，可是房子很宽敞，而且房子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菜园。在菜园里玩，从篱笆望出去，常常看到火车一趟一趟地来回跑。这次妈妈问铃铃愿不愿意到外婆家住些天，铃铃当然回答愿意去。铃铃想的是上次没有看清楚火车到底什么样子，这次去一定要外婆把自己带到火车跟前，看个仔细。

妈妈似乎看出铃铃心里想的是什么，对铃铃说："现在外婆搬家了，上次去的地方是一个叫做常州的乡下，现在搬到了苏州城里。"铃铃着急地问："那儿还能看到火车吗？"妈妈说："我们去外婆家就要坐火车，但是在外婆家同在我们这里一样是看不到火车的。"铃铃有些失望。不过妈妈马上说，苏州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铃铃一想，反正外婆家一定比自己家里好玩，就高高兴兴地嚷着要快走。

到了火车站，铃铃还没有看清楚火车的样子，妈妈就抱着他进了车厢。那个地方像是一个又长又窄的房子，大家只能坐着，但是窗子很多。火车开了，可以从那许多的窗子望出去，望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铃铃在学校学国文课，一开头就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可不知“田”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妈妈指着火车外那一大片一大片的东西说那就是“田”。铃铃要妈妈指出哪个是山，妈妈说快到昆山了，那时再告诉你。走不很久，昆山到了，妈妈指着远处告诉铃铃：“那就是山，在上海城里见不到的山。”上次去常州时没有注意，这次看到了。很快，苏州到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去外婆的新家，走出火车站，叫了一辆黄包车，很快地到了外婆家。

外婆在苏州的家，同上海自己的家还是很不一样。新的外婆家虽然也是二层楼房，大门虽然也是开在一条不宽的街上，可是房后就是一条小河。妈妈带铃铃去看。河里有许许多多的船停在那里，有些不动，有些慢慢在动。出外婆家的后门，下20来个台阶，就到河边。铃铃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觉得很新鲜。铃铃想上船，可是不敢。

在苏州的外婆家，房后也有很大的院子。院子里也种了菜，还有不少野草野花。院子里还有一只乌龟，外公带着铃铃到这个院子里，一下子就把它找到了。外公告诉铃铃，这种乌龟叫“磕头乌龟”，上面同别的乌龟一样有硬壳，肚子底下也有硬壳，走起路来好像不断在磕头。外公还告诉铃铃，这东西的岁数比自己还大。外公是我见到过的很老很老的人了，这小小的东西比外公岁数都大，铃铃不那么相信。公外用脚轻轻踢了这乌龟一脚，它就把头缩回去了。像块石头一动也不动。过了一段时间，它觉得没有什么事了，再伸出头来，慢慢地爬。这东西不好看，可是在上海是看不到的。

妈妈回上海去了，铃铃留在苏州。外婆家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跟铃铃差不多大的男孩子。外婆家有比铃铃大 4 岁和 2 岁的两个表姐和一个跟铃铃同岁的表妹，她们都不和铃铃一起玩，铃铃也不喜欢跟女孩子们玩。铃铃高兴的是外婆家有个表哥，虽然比铃铃大 6 岁，可是老喜欢跟铃铃玩，而不喜欢跟他的几个妹妹玩。表哥的本事真大，后院有一种叫起来很响的虫子，表哥把它的名字叫蟋蟀。它一跳老高，铃铃不敢捉，也捉不到。表哥可有办法，他想捉哪一只，哪一只就跑不了。表哥把它们放在瓦罐里，一只瓦罐里只放一只。表哥说，这种东西爱打架，如果放在一起，它们互相打架，有的就会被打死打伤，还说它们打起架来可真好看。说着铃铃到后院拔起几株名字叫狗尾巴草的草，弄出一些毛须来。表哥说用这些毛须去碰蟋蟀的头，蟋蟀就会生气，做出要打架的样子。表哥有时把两只蟋蟀都用毛须逗得生气了，放在一起，它们就真的拼死拼活地打起架来。打败的就逃跑，或者被咬伤躺在瓦罐里，打胜的就得意地大叫一通，好像高喊“我胜利了，我胜利了”。表哥还给我玩了许多别的好玩的东西。

表哥该上学了。外公外婆看出表哥走了，铃铃会冷清，就把铃铃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铃铃高兴起来：铃铃进学堂了，铃铃是一年级小学生了。

听大家说，这所学校叫义务小学，进学校不花钱。外公讲，这是穷孩子上的学校。“义务”这两个字听的次数多了，铃铃也就记住了。在这所义务小学里没有小椅子、小桌子，没有玩具，摇铃上课后小朋友们都坐在教室里。头一天上午，老师讲，你

们已经长大了，是小学生了，不能只玩，要好好学习。在教室里要听老师讲课。铃铃是好孩子，在教室里很安静。上些什么课？识字。铃铃在幼稚园就识了不少字，家里妈妈又教，现在老师教的，铃铃大都早已会念、会写。在课堂里还教算术，先学1、2、3、4……这些数码，铃铃也学过。老师还教心算。这也不难。学校还有唱歌课、体育课。体育不在教室里上，而是在一个很小的操场上。铃铃想，小学原来跟幼稚园也差不了许多。

学校有一个姓潘的同学，就住在外婆家隔壁，他的爸爸妈妈就在外婆家门对过开了个小杂货店。上学的时候，他来外婆家找铃铃一起上学，放学后又一同回家。他还到外婆家和铃铃一起玩。铃铃在外婆家过得很习惯，觉得这里比上海好，就是常常想妈妈。铃铃很想妈妈的时候，妈妈就从上海来了，又住了几天，把铃铃带回上海。妈妈想起铃铃要看清楚火车的要求，特别早地到了火车站，带着铃铃从火车头走到火车最后一个车厢，一边看一边讲：这是火车，它的气力可大哩，这许许多多的车厢它一拉就跑……妈妈还说，火车头一叫，它就要走了。等到火车头真的叫一长声，火车果然咔嚓咔嚓开走了。妈妈还让铃铃看铁轨，说火车轮子就在这铁轨上，所以走得那么快。

铃铃回上海后，跟着他的一个姐姐进了一个女学校。在那个学校，铃铃过得一点也不舒服。全班都是女孩子，只有铃铃一个男孩子，尽受女同学的欺侮。铃铃老想着在苏州义务小学里的日子，吵着要回那个义务小学。第二学期，铃铃怎么说也不肯上那个女学校了，但是也没有去苏州，而是又进了一个男

孩子、女孩子都有的学校。

又过了一年。铃铃7岁。铃铃的三舅结婚，正好是暑假，爸爸妈妈带了铃铃和他的妹妹去外婆家。在外婆家，除了大舅和大舅妈一直跟外公外婆一起过之外，二舅和二舅妈也来到苏州。三舅结婚当然也来了。外婆家一下子多了许多人。他们都夸铃铃聪明，铃铃很高兴。铃铃没有忘了那个姓潘的同学，一问，搬家了。外婆家做喜事，表哥事很多，没能跟铃铃一起玩。铃铃的朋友就剩下那只磕头乌龟了。铃铃拉着爸爸妈妈去看。那只乌龟还在菜园的老地方，一找就找到了。一年多，样子一点也没有变。铃铃想，也许它真比外公的年纪大。

铃铃这次在外婆家最大的事情，是爸爸不知从哪里找到一部《三国演义》，在很少有人去的楼上给铃铃读了一两回。铃铃听得入神，心想这书真有意思，比学校里学的课本有趣多了。铃铃还想听下去，让爸爸多念几回，可是爸爸不念了。铃铃就自己看。这时铃铃已认识了不少字，可还有许多字不认识。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没有把铃铃拦住。书里的人说的话同铃铃平常听到的不一样，不过铃铃还是看懂了，这也没有难倒铃铃。铃铃躲在楼上，把第三回、第四回都读完了。越读越有趣。时间过得很快，爸爸妈妈说要回上海。铃铃对外公说，想把《三国演义》带回去。爸爸说家里有这部书。铃铃回到上海，闹着要爸爸马上找出来。书就在下面的一个柜子里。这个柜子从来不上锁，里面的书多极了，可是铃铃从来没有打开过。爸爸把那部《三国演义》找了出来。铃铃一看，这本《三国演义》比外婆家的那一本新，而且里面有许多人的画像。铃铃

看它明明是画的，不知道为什么书上印的是“肖像”。从此铃铃就不肯好好上课，一心一意去看小说。一部《三国》可不短，铃铃拿起就不想放下，几个星期之后看完了。铃铃看完《三国演义》看《说唐》，看完《七侠五义》看《水浒》……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一年、二年、三年……铃铃成了一个书迷。

读过《铃铃闯了祸》的人都知道，铃铃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谁都没有想到，铃铃这第三次去外婆家，成了他一生中一个带有关键性的事情。他把爸爸书柜里的小说看完了，就看弹词、戏曲。书柜里的闲书看完之后，把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醒狮》杂志，一个叫何海鸣写的书，还有严复的《天演论》都拿来翻。铃铃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看不懂也看，如果有一句两句、一段两段看出一点意思，铃铃就很高兴。后来读《五柳先生传》，看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时，有一种特别的体会。这样的书也看完了，只剩下爸爸上学时的课本，算术、代数、几何、八线(现在叫三角)……这些书铃铃居然也看明白了。铃铃小学最后一个学期是在北京读完的。爸爸在北京做事，妈妈要去北京跟爸爸一起过日子，小孩子当然要跟着去。当时铃铃距小学毕业还差一个学期，就得找一个小学上学。离家不远有一个私立小学，愿意收插班生，入学考试采取“随到随考”的办法。一个女老师问了铃铃一些问题，并出了题目要铃铃当场做。做完了当场判卷。从头到尾，妈妈在一边等着。完了，妈妈问老师：“这小孩学校收不收?”回答说：“收，小孩子的数学好极了!”原来老师出了一些鸡兔共笼那样的四则题，铃铃用他在爸爸的“代数”书中学会的二元一次联立方

程式解答了。铃铃就是从在外婆家听爸爸读《三国演义》后学会自修，并在以后的学习中形成自己的特点的。小小的一件事有时会对一个人的一生起很大的影响。

十几年前，本文作者有次去苏州，在金门外南濠街找到了那座楼。里面住的是铃铃那表哥的一个儿子。进楼一看，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景象，不过 60 多年的时间已使这座楼显得非常陈旧，而且后面的院子也早就盖上了房子，那磕头乌龟当然也不会在那里了。后门外的那条小河也填成了马路。几年前又一次去苏州，再去找，连房子也没有找到。也许这房子已经拆掉了。

## 2.3 在一位老师的指引下受到“五卅”运动的洗礼

1925 年，我 20 岁前的岁月过了一半。

就在那一年的 5 月 15 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还打伤了十几个工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于是就在 5 月 30 日那天，上海学生在英租界内进行宣传声援工人，高呼收回租界的口号，被英租界当局逮捕了 100 多人。随后有一万多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英租界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屠杀，当场打死 10 多人，伤者无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卅运动”。

南京路惨案后，上海举行总罢工、总罢课。这时候我还在

小学三年级最后一个半月。我们这个小学从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也不上课。我们班的同学由一位老师带领着走上了街头：为支援罢工募捐；进行抵制英货、抵制日货的宣传等等。我们打着小旗，背着贴上了封条的募捐的竹筒，一连上街两三天。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革命的洗礼。

在街上，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受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教育，也受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教育。我们在街上向黄包车夫募捐时，就有好几次出现这样动人的场面：车夫把放在坐垫下面的箱子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放到我们背着的竹筒里。但也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来了一辆小轿车，知道里面坐着的是有钱人，就用手上拿着的竹竿把车拦住，向车里的人进行宣传，要求他们捐款，但大多数是车里的人一脸的不耐烦，嫌我们妨碍了他们的急事，只拿出很少的一些钱，像打发小叫化子那样地打发我们走。有的干脆不听也不给。这种情景同我们遇到的黄包车夫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向带我们上街的那位老师讲了这种现象，不明白为什么有钱人反而不愿捐钱。这位老师给我们讲，社会是分阶级的，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利益等道理。老师的话提高了我们的觉悟。

这位老师早在“五卅”运动前，在讲语文课时就对我们学生讲了鸦片战争在上海吴淞口炮战的历史。他给我们讲陈化成守西炮台、牛健守东炮台，陈英勇作战，帝国主义者奈何他不得。可是牛健怕死逃跑，于是东炮台首先沦陷。英国人就上了东炮台，用东炮台的炮打西炮台。陈化成受海上和落在敌军手里的东炮台两方面的炮轰，光荣殉难。老师把这段故事讲得

非常生动，也带有很强烈的感情。他不但口讲，而且带我们到吴淞口西岸的炮台湾瞻仰曾经用于作战的大炮和陈化成死难的地点。他还带我们到上海南郊的“陈忠闵公祠”(陈化成死后谥号“陈忠闵公”)去参观，又一次向我们介绍陈化成的事迹，对我们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腐败政府的教育。所以我们在“五卅”以后上街的时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是有相当清楚的指导思想的。

这个老师是男的，年龄那时也只有20多一点。他姓甚名谁，我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对这样一个给了我很大帮助的老师，连姓名都不记，的确很不应该，但事已如此，难以补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当时就认为他是共产党员。

## 2.4 吉星高照

每当我吃甜粥或甜汤，特别是带有几颗大红枣的时候，常常回想起小时候妈妈给我吃红枣煮年糕的事情。

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情了。大年初一(那时候还不用“春节”这个词儿)，妈妈清早做了一锅红枣煮年糕，我们几个小孩子起床后，一人一碗。那东西真好吃。不过妈妈做这种早点不只为了让我们解馋，还想讨个口彩。她在把碗递到我跟前时说：“今年全家高(糕)高(糕)兴兴，吉星高(糕)照(枣)。”我心里明白，父亲失业在家，好几年了，过了年还不是跟年前一样困苦，就接着说：“今年还是糟(枣)糕。”妈妈一听急了，大年初一又不作兴生气，不过她成竹在胸，好像早就预料我会说出那

样的话，变戏法般的一张擦屁股的草纸就在她的手中，敏捷地在我嘴上一抹，把我的话化为屁屎，不再生效。而我对自己的恶作剧颇为得意。那时我就已经没有半点迷信，也不喜欢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证明，我的嘴虽然被草纸擦过，通过这嘴说出的话却仍然有效。那一年家里的情况不但糟糕而且更加困苦。“吉星”并没有照耀到我们的家庭。

我从小反对迷信，在一生中没有发生半点动摇。后来我学的专业是自然科学，又读了许许多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反对迷信也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实证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不过回想起我对妈妈进行恶作剧的故事，觉得的确是小孩子的幼稚行为。而且仅仅说几句吉利话也算不上什么迷信，因此在人家讲吉利话时，我就不再说使他们扫兴或者生气的话了。特别是这几年人们比以前更喜欢说吉利话、听吉利话，如果我说相反的话，他们又不能像我妈妈那样在我这样一个上了岁数又有点社会地位的人的嘴上采取措施，心里就会很不高兴，如果这一年对他不利，那就会更把我恨死了。几十年我没有白活，越来越“老于世故”了。现在我能做到在听到吉利话时，面部很自然地呈现出一副善颂善祷的笑容。不过儿时的脾性似乎还没有除尽，还是一定要在自己认为吉星按照它的轨道运行的结果会照耀到这里时，“吉星高照”这四个字才会从我嘴里出来。真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 2.5 孔夫子不许吃茶泡饭

大概在我10岁左右，图个快，爱吃茶泡饭。父亲见了，常常干涉我。他的本意是不经咀嚼就把饭粒吞到肚中不易消化。可是他不对我讲这个卫生道理，却抬出孔夫子来压我，说“孔夫子不许吃茶泡饭”。

他还给我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孔子的弟子子路正吃茶泡饭，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碗茶泡一碗米饭还是一碗。于是就向孔子提出这个疑问，要求孔子回答。孔子回答不出来，勃然大怒，命令子路把碗筷放下，大声地说了三个字：“不许吃。”父亲说，孔子是圣人，圣人说不许吃的东西，你也不要吃。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孔夫子这个圣人原来是个一无知、二霸道的人。一碗茶泡一碗饭为什么还是一碗这个问题有何难于回答？回答不出来也就罢了，却不许别人吃！

这个故事还使我有这样一种认识：人人都说圣人如何高超，而圣人孔子却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人物，对他真树立不起无条件崇敬的观念。再进一步，我对人们大树特树的权威，也带上个问号。我的“独立思考”的性格的形成，同我父亲讲的这个故事也有某种联系。

后来我读了一些孔夫子的书，也听人讲了不少孔夫子讲的道理，知道孔夫子的确是个圣人。直到今天我头脑中受到儒家影响的东西很多。但是这个我明明知道是编造出来的故事，

在我的脑子里却一直记得很牢。

在这漫长的生活的道路上，我见到的一是无知、二是霸道的人不算少。每次遇到这样的人和事时，我就会想起我父亲编造出来的这个故事。

## 2.6 只年长我两岁的数学老师

1927—1930年，我在北京第三中学上初中。我写的这位老师并不是这所中学的教员，而是距离三中校址只有500米左右的“北京师范”的学生，而且他只比我高一个年级，年龄也只比我大两三岁。

我怎么会有这样一位老师呢?那是因为到小学毕业时，我已经学过了代数、几何、三角，因此进初中时，我对学校里讲的那些数学课就没有什么兴趣。这时候，同班同学孙树滋告诉我，他的哥哥数学很好，许多学生找他补课。他说，他的哥哥名叫孙树本，外号就叫“算术本”。他说我可以找他哥哥帮助。孙树本那时家住西四北护国寺旁边一条胡同里。那条胡同又窄又脏，却有一个很雅致的名称：“百花深处”。很快，孙树滋就带我去他家看他哥哥。

不但胡同狭窄，他们的家也很狭窄。不过孙树本似乎还独占了一间很小的房间。室内除床铺外只有一个书架和靠窗户放的一张方桌。第一次我去的时候，正有两个学生听他讲课。我就一边同他弟弟玩，一边等。不久那两个学生走了，他就跟我谈话，在问了我学校学习的经历和自己的打算之后，便要我

学“大代数”。他当时就借给我一本“范氏大代数”。这本书是美国的教科书，是FINE写的。“范”就是FINE的译音。它有中译本。他要我回去看，例题自己做。每周去他那里一次，有难处他帮助。回去后我就开始读。这本书不浅，不过我读起来不算困难。

遇到问题我就去问他。我每周都去他家。一去就讲数学。FINE大代数中有一元三次方程和一元四次方程的普遍解。解起来相当复杂。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找到这个普遍解的，而找到之后，学起来倒并不难懂。当我学懂了一元三次、四次方程的普遍解之后，我就问孙树本，五次、六次的普遍解怎么去找。他告诉我，一元四次方程式是能够找到普遍解的最高的一元方程式，再高就找不到了。我有点不相信，问他是不是他不知道所以这么回答，他说不是的。我还是不那么相信，他就告诉我，解答一个问题是受到数学工具限制的，用圆规和直尺就不可能三等分一个角，而二等分一个角是大家都学过的。他给我讲了一点高等代数、高等几何的道理，使我知道数学这门学问很深很大。不过他对我讲的，我还是听得不那么懂。问他，他回答了，但我还是不那么懂，也许那时他就没有法子给我讲懂。

过了半年多，大代数学完了，他就要我学解析几何，借给我一本教科书。学了一阵子，觉得解析几何很死板，也比较容易，没有多大味道。我还是对平面几何有兴趣。几何证题千变万化，每道题都要用脑子。做每道题对自己的思维都是一个锻炼。有一本严济慈写的《几何证题法》，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其中每一道题我都做了。前年有一次我遇见严济慈，我还提到这本书。孙树本看到我对解析几何不肯下功夫学，就告诉我，这门数学非常重要，是很大的数学家笛卡儿创立的。并且说，还有一门数学叫微积分，就是以解析几何为基础的。后来，我读微积分的书之后，觉得他讲得很对。

这样又花了半年多，把这门数学也学过去了，我就开始自学立体几何、球面三角等等。这些课在学校里一般是不讲的，是我自己决定学的，花的时间也不多，他也给了我一些帮助。

他教我学数学，不单是学这一门的教科书，还经常讲些书本外的东西。他讲，我们在学校学的是欧几里德几何，在欧氏几何中与一条直线平行的只有一条直线，可是还有非欧几何，在那里，与一条直线平行的或者有许多条直线，或者一条也没有。这些我当然不会真懂。他懂不懂我也不知道。他还告诉我，在几何学中还有一门“形势几何”，并且以四色问题、七桥问题为例来讲形势几何，这门学问同我们学过的几何不一样。他告诉我，北大的江泽涵教授就讲这门课。这“形势几何”后来就被称为拓扑学。这门学问基本的内容和方法他没有给我讲，但他举的关于形势几何的这些例子谁都可以明白，我真不知道这些问题要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使我对数学的兴趣更大了。

一般的教师，大都比学生长一辈，即学问上要高一截。但是我的这位老师只比我高一个年级。他对我来说便是“带头羊”。他走前一步或者两步，并要我跟着他走。跟这样的教师学习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性”。

他的弟弟对数学没有兴趣，到他那里补课的那些学生也都满足于补习学校里听不懂或者没有学扎实的那些东西。而我是个要求不断增进知识并且很性急的人，又喜欢提问题。这一点使他比较喜欢我，因此他同我的关系也就不同于别人。

他也是一个学生，每天要去北京师范上课。课外，他非常勤勉地找许多数学书来看。他也不靠什么老师，因为北京师范的老师帮助不了他。在家里他是长子，除了那个与我同班的弟弟外，还有个妹妹。我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在我印象中，他似乎是一家之主。他时间抓得很紧，不过他很爱帮助别人，显不出有舍不得花时间的想法。他总是很耐心，对我总是笑嘻嘻的。那时他的面容至今还给我留下印象。

初中毕业后，我考进师大附中，他考进北大预科，我们之间就不大来往了。后来我去了上海，没有同他通信。我进清华后，两人又都在一个城市。第一年我进城看过他，在他的家里。几年不见，他还是老样子。第二年我忙着做救亡工作，就没有空找他。以后，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党的青年工作，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呆了 6 年，抗战胜利后，又在各地奔波，同他完全没有了联系。全国解放后，我在北京遇见他，知道他一直在国内，没有出国留学，还在大学任教，还是教他的数学。后来听说他在北京工业学院当教授。

## 2.7 潘学阁的故事

1928 年初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始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个

插班生叫潘学阁。那时我不到13岁，他已经快15岁了。他家住在辟才胡同国民党市党部附近。建国后有一次我经过那时他住的这所房子门口，望了一下，他家大门口的样子还没有变，这时已是师大女附中的宿舍。我记得这是个很深的院子。他住在后院的小房子里头。他告诉我，这个院子是他伯父的财产，他的伯父是一个四川的军人，是个团长。开头我和他交情还很不错，后来不记得为什么两个人的关系搞坏了，他说要在路上打我，吓得我不敢走小胡同回家，上下学都绕圈走大马路。半年时间过去了，暑假过后开学的那一天，同学都到了，就是不见潘学阁这个人。我就问，“潘学阁怎么没来呢？”班上有一个同学名字叫杨履升的，他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大的，在初中一年级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我提出这个问题后，他反问我：“难道你没看报，不知道潘学阁的事情吗？”我说：“我没看报，真的不知道，你告诉我吧！”于是杨履升就告诉我，在暑假的时候有一天，潘学阁去找他，对他说：“有一个人跟孙殿英一起去挖东陵，发了大财，这是不义之财，他能要，为什么我们不能向他要一点呢？”杨履升说：“你凭什么去向人家要钱？”潘学阁就从左边裤兜里掏出一把手枪，右边裤兜里又掏出一把手枪，两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放，说：“凭这个难道不行吗？”杨履升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我不干。”据说以后潘学阁再没去找他。可是过些日子杨履升说他看到报上登出一条消息，说潘学阁有一天到德胜门内一个姓谈的人家里，对谈讲：“我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的，你犯有10条罪状，每条都够枪毙，我可以想办法不问你的罪，只要你给我钱。”这个姓谈的人一方面

同他谈话敷衍他，不让他走，一方面派人报告警察局，警察局就来把潘学阁抓走了。经过审讯，法院判决潘犯了诈骗罪，处罚是三年徒刑，因为潘还不满15岁，缓期3年执行。这个过程杨说已经在报上登出了。杨讲的这一段，真使我吓了一跳。第二天，杨履升把报纸给我看，报上果然是这么写的。我心想潘学阁真够野的，以前还没有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初二开始因为潘学阁不在了，我不怕他在路上打我，上下学就放心大胆地走小胡同回家。走小胡同回家路要近得多。以后，我就把他忘记了。

1932年上半年，有一天，我去龙华重心化学工业社的工厂上班。我当时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上学(由于家境困难，我是半工半读的学生)，校址就在上海南火车站旁边。龙华是从南火车站到杭州的第一个小站。我每次去龙华，都沿着火车路旁边的小道走。不过从学校出发走这条道，要过一条架在铁路线上的天桥。那天我上天桥的时候，在天桥楼梯台阶上坐着一个穿破军衣的人。我看他脸熟，他也望着我，两个人几乎同时叫出来："潘学阁！""郁鍾正！"(我原来的姓名，加入共产党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我急着上班，就让他和我沿着火车道一起去龙华。在路上，他告诉我们那次分手后四年当中他的情况。

关于作案和判刑这一段，他自己讲的同杨履升告诉我的差不多。接着他讲法院判决后，因为是缓期执行，就把他送回辟才胡同他伯父家里。他伯父非常生气，把他锁在房间里，对他说："国法宽容了你，家法容不得你，等着我来收拾你吧！"潘

在路上对我说:“我的伯父很野蛮,动手把我打死都有可能。”于是就在当天晚上乘房间窗户还没有上锁,就跳出了窗户又跳出围墙,跑到沈阳,进了张学良办的东北讲武堂。

几个月后他毕了业,正好奉军为了中东路的问题同苏联开战,潘就当了一名排长到前线和苏军作战。接着他就描写这次作战的情况,说苏军如何英勇,穿的衣服、手套也比奉军好,人也不怕冷,奉军根本不是苏联军队的对手,上去几下子就被打垮了。

打垮以后他就进了关,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了一名普通的小兵。军队开到江西打共产党,他也去了。在一次作战中他被红军战士的刺刀插进大腿。他说自己的血至少流了一脸盆还多。他躺在地上等死。那一仗红军打胜了。在打扫战场时,发现潘学阁还活着,就把他抬到村里,帮他包扎起来,上药,慢慢地养着。潘就这样成了红军的一名俘虏。他说自己在国民党军队里的时候,听军官讲红军如何残酷,要士兵们宁肯在战场被打死,千万不要被活捉,活捉后红军会慢慢把你弄死,会非常痛苦。对这个话,他是相信的。因此当他被红军抬走时,他很害怕。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红军医疗条件很差,但对红军受伤战士的护理和对俘虏的护理几乎没有区别。潘说养了一段时间,慢慢地自己的身体好起来了。

有一天一个红军来看他,穿着和普通红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从谈话内容看,是一个军官。那个红军军官问他:“你愿不愿意留在红军当战士?如果愿意留,我们欢迎。如果你要离开,我们也不勉强,由你自己决定。”潘学阁说红军真好,苏区

的老百姓也真好。官兵关系、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都比国民党好得不知哪里去。他几乎想留在那里了。可是他想来想去觉得如果留在红军那里，这一辈子就不能和家人见面了。他觉得红军这里是另一个世界。他还舍不得红军外面这个世界。所以过了一些日子，那个红军军官再来看他、问他做出怎样决定时，他表示还是愿意回去。

于是红军给他开了路条，告诉他拿了这张路条，在苏区可以通行无阻，而且可以在老百姓家里吃饭，还给了他 20 块大洋。他感动得不得了，拿了路条和钱向苏区外走。刚走出苏区，就被国民党军队截住了。查出了路条，不依不饶地说他是红军探子，要把他送到军事法庭。他说了许多好话才被放了。那 20 块钱才花了 2 块多，其余 17 块多都被收走了。他跑到南昌去找一个熟人。这个熟人却到了南京，他就坐船去南京。到南京码头想上岸，但这时蒋介石正在搞“新生活运动”，像整顿南京市容，像他那样一身褴褛的人，不许下船。他就只得跟着船来到上海。他还准备坐火车上南京，可是走错了路，不是到南京的上海北火车站，却来到了去杭州的上海南火车站。

这就是去龙华的路上他对我讲的从 1928 年初分手后自己的经历。

我对共产从小就有好感。“九・一八”后，我更对国民党政府和社会不满。那些年，白区党组织在立三路线指引下，有一种工作方法，就是用腊和锅灰做成的粗黑笔在墙上写革命标语。因此走在上海的街上，“共产党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国红军万岁、苏区万岁、苏联万岁、打倒国民政府、打倒蒋介

石”这样的标语经常可以看到。看了我觉得很痛快。可是红军、苏区究竟是什么样子，一点也不知道，没有想到能从潘学阁那样的人那里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我们红军的俘虏政策会对像我这样的人也能产生影响，恐怕也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俩一路走一路谈，他把自己的经历讲完，我们也差不多走到龙华了。我对他的遭遇很惋惜，同时我觉得他比四年前成熟多了，他 19 岁，我 17 岁，大家都受到一些磨练。不过我对他这样的人还是不放心。我既不愿意把家里地址告诉他，也没有把龙华工厂的地址告诉他，而是带他到龙华街上一家饭馆里好好吃了一顿。分手时我问他准备怎么样，他说还是要到南京去找他那个熟人。我一摸口袋里还有七八块钱，就全部交给他，让他在路上用。没想到他一个钱都不接受。他说这钱对他没有用，他上火车向来都不买票就混上去了。如果有查票的要他补票就说“没有钱，不信你搜”。一搜果然一个钱都没有，就只有等下一站把他轰下去。在下一站来了火车就再混上去。这样一站一站向前，他也就到了目的地。身上如果有钱一下子就被搜走了。我要他一定收下，他死活都不要。出龙华饭馆我们就分手了。我觉得他真有北方人那股豪爽的劲头。不过我也不明白一个人身边一个钱都没有，怎么能有饭吃？

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隔了一年我居然在街上又遇见了他。地点在上海老西门附近。上回相见时他虽然衣衫褴褛，而且是在受伤之后，但人还是健康的，这回完全是一副病人的样子。一问，这一年他的经历是：我们在龙华分手后，他到了南京，可是他的那个朋友还是没有找到，于是他又跑到了南昌。

他不愿意再去打仗卖命，就去修公路。那些年国民党为了打红军，大修公路，需要不少苦力。后来病了，体力不够，搞了一个炉子烤烧饼出卖。结果把本钱赔完了，而病越来越重。他心想自己活不长了，决定回到河北沧州南皮县老家去，要死就死在自己的老家。七坐八坐火车，最后又到了上海。

这回我看他的身体实在不行，不能丢开他不管了，就把他送进澡堂，让他把自己的脏衣服都丢在澡堂里，给了他一身我自己的衣服，带到我家，住在我家里，让他去医院治病。在我家里，我妈妈对他很照顾，弟妹也陪着他玩。他在我家住了几天，又给我们讲了他自己家里的情况。他说他家是南皮的地主，父亲在家乡看管产业，伯父在外面东奔西闯，混得不错。他说他伯父在四川当过团长，在他到三中上学的前两年来到北京，想在京城里得到更高的地位，也在北京置下了辟才胡同那个院子。他的父亲要他伯父把潘学阁带出山，就让潘学阁到北京跟伯父过，在北京上学。他告诉我他伯父的名字叫潘毓桂，号燕生。他又给我描绘了他伯父的野蛮性格，说他也不喜欢自己的父亲，一个人离家出走后也不想念他，但是很想念母亲。对他这样一个家庭，我很不喜欢，我觉得为了回去见亲人而不留在苏区真不值得。

其实他并没有了不起的病，而是得了痢疾，一直得不到治疗罢了。他是个北方人，坐不惯上海我家里的马桶，因此一天总要跑几次公共厕所。有一天我们以为他上公共厕所去了，结果到吃饭时还没有回来，发现他留了一张条子在家里。条子上写，我们全家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对他都非常好，

而他知道自己的病是好不了的，不愿意死在我家里连累我们，要我们原谅他不辞而别。我们很着急，我父亲母亲，我和妹妹马上分头到上海的几个火车站和轮船码头想把他截回来，结果没有截到。上海这么大，要找到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

我怕他离开我们得不到照顾和治疗会死掉，没有想到过了几个月，邮局送来一个包裹，是他从南皮寄来的。打开一看是一包去了核的脆枣，还有一封信，信上说他回到家了，病也治好了，是一封表示感谢的信。

以后他还经常给我来信，我也给他写信。1934 年我考上了清华三年级，离开上海的时候收到他一封信，信上说他进了连城的扶轮中学，上初中二年级。本来他是应该 1928 年在北平市立三中进初二的，那时已经到了 1934 年，中间耽误了六年。我到了北平以后也经常寄一点自己看过的进步书刊给他。我希望他提高抗日救亡的觉悟，我觉得他对红军苏区的那种感恩思想对于他政治上进步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只是他是地主家庭出身，从他不愿留在红军那里来看，他的家庭观念还是很浓厚的，这又是他政治上进步不利的因素。在那个年份，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育人、帮助人的机会，因此我是很热情地给他写信。从他的回信来看，觉悟还在提高中。

抗战爆发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这个人后半生是怎么过的，我一直没有了解到。我认为他的后半生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都存在，我很想知道他的情况。有一年过节，我有点空闲的时间，就决定把潘的故事写成小说，争取发表。小说里就用潘的真名字。目的之一就是希望知道潘的经历的人看到这小说

之后把情况告诉我。可是写到一半给我小女儿看，她说："爸爸你写的不是小说而是交代材料。"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打击。她说得对，我的确不是写小说的料，就把这篇小说放下来了。不过我想，潘家是南皮的大地主，潘毓桂是南皮有名的人物，到南皮县政府问一下一定可以查到他的下落，我真想写一封信到南皮县试试看。

后来我了解到，他的伯父潘毓桂就是镇压"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市的警察局长。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后，他接着就做伪北平警察局长，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

最后附带讲一件事。1936 年上半年，忽然有一个人来看我，一看就是一个土地主的模样。他自我介绍是潘学阁的父亲。他向我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之后，竟向我提出请求，希望我替他在北京谋个差使。我讨厌这个家伙，没有给他好脸色看，把他打发走了。我想不会是潘学阁要他来的，我还有些奇怪为什么他不找他的哥哥潘毓桂。

（注）最近我看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时担任 29 军、39 师旅长的何基沣的回忆录，其中记载 1937 年 7 月 28 日宋哲元偕同冯治安等离开北平去保定，派了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张自忠 7 月 29 日就职，并用冀察委员会的名义派包括潘毓桂（潘学阁的伯父）在内的 9 人为委员，并任命潘兼北平公安局长。可是日军直接指使潘毓桂等办事，对张自忠不予理睬，张自忠也就在东交民巷隐匿下来，随即化装逃出北平。而潘则在日军占领北平期间任警察局长，是个地地道道罪恶累累的大汉奸。

最后我下了个决心，写信去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委，希望他们帮我了解一下潘学阁的情况，并把这篇《潘学阁的故事》也寄给他们。我认为了解潘学阁这个人比了解一个老百姓要容易，因为他的伯父潘毓桂这个大汉奸在当时许多人都知道。不过毕竟快60年过去了，满足我的要求对于南皮县的同志也许有困难。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一直犹豫是否给他们去信。直到最近我才下了决心把信发出了。如果有了回信，我想把他的下半生补充进去。

## 2.8 “学警冲突”

1933年有一天我从龙华骑自行车回大同，在学校附近的车站路，不小心车身碰到了一个人的衣服，我急忙下车，向他道歉。没想到自己这种讲礼貌的做法，反而惹出了麻烦。那个人脸胖胖的，穿了一件绸大褂，外表并不像是流氓，却对我要起流氓来。他不放我走，一定要我跟他一块去“喝茶”。“喝茶”就是“喝讲茶”，意思是要到茶馆去同我谈判对他赔偿。我哪里有时间同他纠缠，就和他讲理，我说：“有什么好再谈的呢？如果我碰伤了你，我就要赔偿你的医药费用。如果我弄坏了你的衣服，我就要赔偿你衣服的损失。可是你既没有受伤，衣服也没有损坏，连一点也没有弄脏，我已经向你道歉了，没有必要再去喝茶。”这时来了一个警察，他同那个流氓一定熟识，走到我跟前，一句话不说，上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讲理！”我这个人从来是不能受人侮辱的，

没有被人打过耳光。我一生气也给他一个耳光。他没有准备我会有这一手，被我结实地打了一下。这样他更生气了，就举起警棍来打我。没有想到我把警棍抓住，一夺就夺了过来。这下他急了，一吹警笛，来了两三个警察。于是手拿夺得的警棍的我，和三四个警察乱打起来。我骑的那辆自行车倒在地上。这时候我父亲的一个同学刘先生正路过看到，就急急忙忙地跑到我家里向我父母报信，说："不得了啦，你的孩子在车站路跟警察打架。手里拿着从自行车上拆下来的大梁，和几个警察打成一团。"他没有看清我手里是警棍，也没有想想自行车的大梁怎么可以随便拆得下来。我父母就急急忙忙地往车站路跑。

我同警察正在对打的时候，大同大学的同班同学葛曾济（现改名葛一虹，那时他在学校学的是理科，现在是有名的戏剧专家）看到了，他马上到学校里（打架的地方离学校非常近）告诉了同学，说我们的同学郁鍾正正在挨警察的殴打。我在学校里是有名的"有点学问"的学生，同学们一听说我挨打了，一下有上百个同学赶到打架地点，把就设在车站路上的警察分局围住了。这时，围观的人不知有多少。车站路是通有轨电车的，这么一挤就有几十辆电车停在那里。警察局一看形势不妙，怕惹出大乱子，就想下台。同学们向警察分局提出三个条件：第一要对我赔礼道歉；第二要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第三要马上送我进医院治疗，由警察局负担全部费用。警察局被迫都接受了。

于是我进了附近一所医院。这时我的父母也赶到了，他们

陪我进医院后，脱下衣服一看，满身都是伤痕，心疼得不得了。我说那几个警察也被我打得不会轻的。医院里给我涂了满身黄色的油膏。许多同学来慰问我。大同大学的校长曹惠群也带口信给我："反正警察局出钱，你安心多住几天好了。"不知道药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不到两天完全好了。在医院里呆不住，我就跑出去。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

在医院里，第二天有人送来《时报》。时报上把这件事情作为它的头版头条新闻，用套红的标题，题目是"学警冲突"，描写了我和警察打架，学生包围警察局，交通堵塞以及警察局承认错误的情况。那时上海有个刊物，名字叫《论语》，是林语堂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一个"小记者"的名义，发表了一通议论，大意是'当时我们的国家不是什么法治国家，而是衣治'，某大学生(指的是我)穿的太差，看不出是个大学生，所以挨了打。我穿的的确很差，一件很旧的长衫，脚上穿的是一双晴雨鞋——一种最廉价的鞋子，布面，橡胶底，在鞋面和鞋底之间是用胶粘结的，下小雨不会湿脚。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样子是道听途说的，对当时的情形和我的形象都描绘得很不对。比如把我描写成秃顶，可是当时我虽然留的是平头，但一点秃的地方都没有。《论语》上这篇小文章前几年有人从图书馆给我找到了。打架后第二天出的《时报》还没有找出来。我想是一定可以找到的。而且我想我的记忆不会错。

这件事不带政治意义，仅仅是流氓和警察欺侮了我，我抵抗而已。但是也可以看出我的性格。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侮辱，

但是我不敢说对每一件侮辱我的事都进行了抵抗。那不是20岁以前而是50多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我也挨过一个女造反派的耳光，而我没有、也不想立刻回她一个耳光，如果那样我是会大吃苦头的。

## 2.9 几乎成了《放下你的鞭子》里的第四个演员

1932年，大同大学创办20周年时，学校举行了一个庆祝会。大会请了校董马相伯，他没有到，但还是请来不少来宾，其中有一个张志让，他也是校董，而且发表了演讲。这点我记得很清楚。庆祝会开得很隆重，但很短，仪式后在校园内还有游艺活动。由于大同大学的大门就开在很热闹的车站路(就是在上海南火车站旁边的一条路)上，又没有校警把门，在纪念仪式后，不但本校师生停留在校园继续参加庆祝活动，而且附近许多居民也进去看热闹。

游艺活动主要在操场上进行。有各种形式的节目。在校师生、返校校友，加上看热闹的人，操场上熙熙攘攘，人真不少。我看到在操场的一个角落有两个卖艺的人——一个老头、一个姑娘正在玩刀玩枪。我以为卖艺人趁大同校庆这个机会来赚几个钱。这两个卖艺人玩得也不十分紧凑，大概是在等有更多的观众来观看后才表演精彩节目。不过还是一直在表演，一个接一个。他们表演一阵子就向观众要“赏钱”。这完全是卖艺人的那一套。这样的表演，我在北京天桥看过几次。看了

一会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想离开那个地方。这时候已经围上了许多观众，那个老头儿，就正儿八经地讲了一通话，看样子好节目就要开场了，我也就留了下来。就在这时，那个姑娘在表演中失手，观众中发出了嘘声。老头儿非常生气，拿出鞭子就去打那个姑娘，姑娘哭了起来……这个情节凡是看过《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的人，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那是一出街头剧，剧情是那个老头，给观众的印象是个卖艺人，那个姑娘是他的艺徒，实际上是父亲和女儿。而在他生气打他女儿的时候，第三个演员——一个工人就从场外跳进场内一声怒喊："放下你的鞭子！"他斥责那个卖艺人不该虐待他的艺徒。逼得那父亲把他们父女如何流落到街头卖艺、如何生活没有着落等情节向工人、同时也向观众诉说。可是我直到老头儿打姑娘时，仍以为是真的在卖艺而不知道在做戏，于是我就想抱打这个不平，进场去制止卖艺人虐待艺徒。只是因为犹豫了一下，迟了几秒钟，这出戏中原先的第三个演员的动作比我快了一些，我还没有进场，他已经先进了场子。如果我进了场成为这出戏的第四个演员，这出戏就不知如何演下去了。如果真是那样，今天回想起来会更有趣味。

由于我没有进场，我就自始至终只是观众。看到后来，我也看明白，这是在做戏。我那天看到的这出戏的情节是父女两人在苏北农村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逃到上海来的。父亲找不到工作，女儿只好进了外国资本家开的工厂。在工厂她又受不了那种同样残酷的剥削和迫害，父女两人只得上街卖艺。这出戏是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资本家的，是宣传阶级斗争的。

那个进场的工人就是革命的宣传员。情节是那个样子，而他的语言很有鼓动性。这次演出是很成功的，是很感动人的。

不久以后，我打听到那次演出者是“骆驼演剧队”，是葛一虹请来的。那时葛一虹是我在上海大同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本来名叫葛曾济。当时我只知道他同我一样是学理科的学生，根本不知道他同戏剧界有什么联系。好几年后，我似乎已经到了延安，看到《中苏文化》这个刊物上有他翻译的苏联剧本《带枪的人》之后，才知道他也是戏剧界人。

北平“一二·九”运动后，我又看了崔嵬、张瑞芳演的《放下你的鞭子》。一看，就知道它是在大同大学20周年校庆会上我看过的那出戏的改编。但我还有一个清楚的回忆，1932年演出时那出戏的名字是《一条鞭子》，后来才改成《放下你的鞭子》。这样把名字一改就更好了。“放下你的鞭子！”是工人进场后的第一句话。而后来，崔嵬、张瑞芳演的戏的内容改成了宣传抗日救亡。剧中那父女俩不是从苏北农村而是从东北沦陷区来的。流落的地方也不是上海而是华北。剧中那第三个演员不是工人而是学生。在第二次看这出戏时，我当然没有再做第四个演员的可能了。

附带讲一下，后来我对这出戏的历史做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出戏在1932年我第一次看之前不久，陈鲤庭在上海浦东南汇写的，演了一阵子。后来江西南昌民教馆一个国民党反动家伙把这出戏改成反共戏。他们把父女俩描写成我们苏区出来的，那第三个演员是个什么身份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这种反共戏发生不了什么影响。影响大的还是在“一二·九”后在各

地演了很久的宣传抗日救亡的《放下你的鞭子》。

## 2.10 沾上了血渍的纺绸大褂

在我19岁那一年，有一天，我亲眼看见外国人打我们的一位同胞，血从这位同胞的头上流出。为此我在人群中奔走呼号，我身上穿的那身纺绸大褂因此沾上了这位同胞的鲜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4年暑假，我接受转学清华的考试。清华的上海考场设在大厦大学。我从家里去，经过一次换车之后要搭公共汽车公司的车，到梵王渡终点站下车，然后步行不多远就到了考场。这次考试要用两天的时间，第一天是这样地去考场，看到外国人打中国人的那天早上也是这样地去考场。

当我坐的那辆公共汽车快到站时，有一辆黄包车停在站上。车主不在车旁。他见到汽车开过来，就急急忙忙回来拉了车快跑。可是黄包车停在车站这件事已经激怒了与我同坐在一辆车中的英商公共汽车公司的职员。那是一个高鼻子的白人，我认为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就下车去追，车夫拉着车走得慢，他跑得快，没几步就追上了。他抓住黄包车，使劲地向一边歪，就把车弄翻了，接着就举起随身的那根手杖朝黄包车夫的头上打去，血马上从车夫的头上流下来。原来那手杖是金属的。

梵王渡停公共汽车的那条马路是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越界筑路是帝国主义侵略华界的一种手段。租界的帝国

主义统治者，把属于租界的马路延长，在本来不属于租界的华界的土地上强行修筑马路。马路修成了之后，就把这条路算做他们的租界。上海的老百姓以及报界坚决反对，可是国民党政府容忍这种侵权行为。结果是在越界筑路地段，马路便成租界，而旁边的弄堂还是“华界”。华界的警察局对那个越界筑路的路上的事也可以去管管。当这个外国人打那个车夫时，许多黄包车停在大路旁。我就跑到那群车夫那里，鼓动他们惩罚这个外国人：“你们不也亲眼看到外国帝国主义打我们的同胞吗？难道你们可以呆在一边袖手旁观吗？工人同胞要团结起来给那家伙点颜色看看！”他们本来就很愤怒，经我这样一鼓动就行动起来了。黄包车夫们把车拉到完全属于华界的弄堂里(这是他们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因为到了华界英国人就不好去了)之后，有的人拿起木制的坐垫，有的捡起砖块，向公共汽车站跑了过来。那个洋人一看不妙，就躲到车上，把门关起来。车夫们就把车子上门窗的玻璃砸碎了，想把外国人拉出来。事情闹大了，华界的警察开了一辆警车来，把那个挨打的黄包车夫和那个打人的洋人拉走了。这时候我就对警察局的人说，我是一个目击外国人如何打黄包车夫的人，责任全在这个洋人，车夫们完全是正义行为。而且我告诉了他们我自己的身份和住址，愿意作证。警车开走了，打架的现场平静下来之后，我想起了转学考试的事，一看表，似乎还来得及赶去考场。这件外国人打中国人的事发生后，我在梵王渡鼓动工人去惩罚外国人的那一阵子，早就把要去考试的事忘得精光了。于是我急急忙忙向考场跑去，到大厦考试刚刚开始，没有误了那场

考试。如果这个过程再长一点，就一定会误了那一场考试，我也就上不了清华。如果那样，在这之后我的经历也就要另外写了。

当我在人群中跑来跑去时，身上穿的那件纺绸大褂沾上了那个被打的黄包车夫头上流下的不少血渍。回家后我让妈妈先别把它洗掉，我想它还可以起物证的作用。结果警察局一直没有来找我。保存了一段时间后，妈妈就把纺绸大褂上那车夫的血渍洗掉了。那次冲突结局如何，我完全不知道。也许吃亏的还是那个黄包车夫?!

## 2.11　空欢喜：错把东阳当东洋

1935 年暑假，我在上海和三四个朋友一起从事的活动，是 20 岁前后的事情。它也正好使我的经历划分为两个阶段。我把它看作是自己从事革命工作的开始。因为这些活动表明我不再只是思想上接受、而且在行动上实践在中国必须依靠工人、农民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道理。虽然那时我没有得到党的领导，也说不上收到什么成效，但是这一个开始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既然要依靠工人，就要做唤起工人的事。我们这些青年人什么也不懂，不知道受到什么启发，就采用办工人识字夜校的办法来接近工人，对工人进行宣传。当我们在静安寺附近把这个夜校办起来之后，觉得人力有富余，于是留了两个人在上海办这所夜校，我和程淡志两人就决定去杭州，打算在杭州郊区

农村呆上二三十天，希望能找到一个农民觉悟程度高的农村，经常保持联系。我们不知道用什么别的工作方式去“唤起农民”，还是想办识字班。于是带上了本子和铅笔立即出发。原先为工人办夜校编的按照《资本论》第一卷逻辑体系识字的课本，我们自己知道不合农民的需要，就没有带，也没有另外去编，准备到时候临时编写。为什么挑选杭州郊区呢？没别的原因，只是因为留在上海不容易专心，而程淡志的姐夫那时正在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做帐房，我们到杭州有一个落脚点。我们也仅仅把那个地方看作落脚点，因为准备一到那里，马上就下农村。

上海到杭州火车要不了几个小时。当天下午，我和程就住到“新新旅馆”去了。这个旅馆现在还在，而且名称也没有改。前几年到杭州看到连我们住过的那座楼都还在，只是在它旁边盖了一座新楼。一到杭州我们就去买了一张杭州附近的地图，决定第二天一清早沿着去富阳、桐庐方向的公路找到一个农村住下。

我们走的那条公路是绕过宝俶塔，然后向西南方向前进的，不是现在从杭州到桐庐常走的那条公路。我们一清早 7 点在新新吃了早点（程的姐夫把我们招待得很好，面包、红茶和煎鸡蛋）就出发，走了 30 华里，还不到中午，来到一个叫做关帝庙的村庄。我们觉得不必走得太远，就决定在这个村庙住下来，打算当天下午就开始工作。我们把事情想得很简单，在上海的静安寺，我们出钱就租到了办夜校的房子，在农村中难道就租不到一间房？一到村我们就进了一户农民的家，表明想租

房的来意。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农民不敢跟我们商量，只说这样的事要找村长。我们就要那个农民带我们去找村长。他倒没有推辞，陪我们去了。在村里我们找到了那个以为可以解决我们问题的人。没有想到在听完我们说明来意后，村长就说这个村庄没有空房。我们再三说明我们对住房的要求不高，房租一定照付，而且可以先付之后，这位村长才勉强把我们带到使这个村得名的关帝庙。这是一个很小的庙，只有一间。关帝爷的塑像早已败坏了。塑像背后是一片瓦砾，还有好几堆人粪。他以为我们看到这样的地方一定会知难而退，没有想到我们一去就连声说“好，好，这里很好”，立即准备打扫。可那个村长又说这个地方不能让我们住，但是他什么理由也说不出来，因为是他领我们去看的。反正说来说去就是不让我们住。我们弄明白了农民和村长都怕事，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路数，我们越是表现不怕苦不怕脏，他们越对我们产生怀疑。

关帝庙住不成了，只好放弃。这时时间过了中午，不敢再往前走，就走回头路。在回头路上又进过两个村庄，都不能留我们住在那里，只好回新新旅馆。第一天就这样失败了。我们终于明白，在上海我们去为工人夜校租房子的时候并没有告诉要在那里办工人夜校，房东以为是一般的房客。在这里我们打着教农民识字的旗号，所以他们就不敢留我们，我们也就租不到房子了。

第二天清早，改走去吴兴、长兴那条公路。也是走出二三十华里光景，试着提出要住下来，也被婉言拒绝了。住在农村做这种事真不容易。一连几天到了这个或者那个村子，向当地

管事的人一提要住在那里办识字班，他们就推说没有地方。几天换了许多地方，都失败了。

在我们买到的地图上，一共有六条从杭州出发的公路。我们每天走一条。有一天早晨下雨，而且乌云密布，估计要下大雨，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出发了。那次前进的方向是过钱塘江桥去萧山。还没有走到六和塔，雨就下得很大。我和程两个人都是头上戴着大草帽（不下雨我们也戴着草帽防晒），上身穿一件衬衣一件背心，下身都是一条短裤和一条裤衩。雨大了衣服太湿了，我们就把衬衣和短裤脱了，挤干了顶在头上（草帽下面），光穿背心和裤衩走路，背心和裤衩太湿了，两人就找个地方，把它们脱下来，换上略为干了一点的衬衣和短裤，同时把背心和裤衩脱了，挤干，仍旧顶在头上。过了一段时候去替换衬衣和短裤。那天我们就在这样的下雨天也走了二三十华里。这一天还有一个故事：快到萧山，走过一座小学，我们就进去，那是一座两层楼房，楼下似乎是教员休息室，室内一个人都没有。我们看到墙上贴了一张这个小学经费支出的示意图。图中学校电费支出占70%左右，其他支出都比较小。我们出于好奇就在楼上找到学校的负责人，询问为什么电费这么高。没想到这个人怀疑我们是上面下来检查学校工作的，对我们毕恭毕敬地回答问题。离开学校我们大笑了一阵。那天我们借口避雨在一个农户家呆了很久，谈得时间比较长，那次谈话比较自然，使我们了解到不少情况。

后来我们知道在农村住不下去，就改变原来的打算，住在新新旅馆，早出晚归，每天下农村找农民谈话。我们发现同农

民一起踏水车还能受到农民欢迎，就在一个农村一连三天去踏水车，这样也只能做到随便谈话，但是谈得很浅，说不上有什么成绩。

有一天我们走到靠近苑桥附近的一个村庄，向农民宣传日本人（当地叫东洋人）如何欺侮中国人时，这个村子的农民与别地大不相同，对我们讲话的反应非常强烈。我们只是抽象地讲一点，他们补充了许多具体事实，而且情绪激昂、慷慨，我们真高兴极了："没想到这儿农民的觉悟真高。"于是我们就想把这个村变成我们原先希望建立与之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谈来谈去，谈了很久，越谈越觉得不对头：日本人怎么会住到这个村子里来呢？又怎么会在这个村子做这么多让农民反对的事呢？我们就从高兴转到想弄清事实，最后才弄明白，原来这个村子里住有从浙南东阳县迁来的几户人家。他们口中强烈不满的是东阳人，我们错听成东洋人，空欢喜了一场。

杭州郊区之行，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了解到不但农村中那些管事人害怕革命（他们已看出我们的目的不是教农民认字），而且农民的觉悟程度也实在不高。回上海后，我们了解到静安寺那个识字班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但我还是把这次活动作为自己参加革命的起点。

那时我们的思想纯洁得不得了，住在西湖边，可是西湖任何一个风景点，包括就在新新旅社旁边的岳王坟也没有去望一眼。那时觉得如果去做"革命"以外的事情，自己就不那么纯洁了。有几天从乡下回到杭州的时间比较早，太阳还没有下山，就在湖边望望金色的晚霞，领略大自然和西子湖结合在一

起的美。还有去杭州时我只带了一本闲书——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德文原著，有时也在湖边高声朗读歌词很美的句子。这些，也许正是因为是“革命”以外的情感与自己的那种“纯洁”得不得了的思想存在着一种反差，在我的脑海留下很深刻的回忆。还有住在新新旅馆，每天早上吃牛奶、红茶、面包，一边吃一边心里不踏实，觉得不像一个革命者的生活方式。那时自己的思想情感就是那样的幼稚天真。

# 3　生活的几个侧面

## 3.1 上过各式各样的学校

我在21岁时大学毕业。这本书只讲我20岁以前的故事，我的学生时代只比这个时间段多一年。

我接受了学校教育的全过程：由小学到初中、高中，然后进大学，直到大学毕业。我拿到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张文凭，不过一张也没有保存下来。大学毕业时还被授予理学士的学位，曾戴了方帽子照过相，这张照片倒在一本纪念册中可以找到。在上小学之前，我还进过幼稚园。本世纪10年代末，即便在上海，幼稚园也很不发达。我家生活并不富裕，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现代化”，进了相当规范的也是外国教会办的幼稚园。以后我所有的弟弟妹妹都没有这个福分。对她（他）们进不进幼稚园的事，家中连议论都没有过。我还进过穷人上的义务小学，上过私塾，学过《孟子见梁惠王》。我还上过女子

学校。

我在这个“全过程”中，不算幼稚园，从 5 岁学到 21 岁，一共 16 年。不过这 16 年并不是标准的小学 6 年、中学 6 年、大学 4 年。我在小学学了 7 年。小学一年级进了三个学校，上了两年。而在高中却糊里糊涂少学了一年。

我进过的学校，它的隶属关系可以说应有尽有。

我进过公立学校。在我进过的公立学校中，有国立的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国立清华大学；有省立的江苏第二师范附小，也有市立的北平第三中学。比较特别的是还有“京兆公立”的。我刚进第三中学时，北京还是张作霖的势力范围，那时候北京还叫北京，不过更正式的名称是“京兆”。北京改为北平是蒋介石的势力伸张到华北以后的事情。所以我刚进三中时，这个学校还不叫北平市立第三中学，而叫做京兆公立第三小学。在公立学校中，我只是没有进过县立的、乡立的学校。我不知道在苏州上的那个义务小学校是不是公立的，如果是，我也不知道又是哪一级政府办的公立学校。

我也进过私立学校。爱群女子学校是私立的。大同大学附中和本科也是私立的。我还进过教会学校。清心幼稚园和北京铭贤小学都是教会办的。再加上私塾，我进过的学校几乎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我进过各式各样的学校，也就对这各式各样的学校有所了解、有所感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在中国，国立的学校水平还是属于最好的。师大附中就是办得很好的一个中学。我的同班同学中，今天成名成家的人就很多。后来研究天体物理学

取得很大成就，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林家翘，就是同班同学中的一个，他后来也进了清华物理系。因为我在高中跳了一级，在清华他比我低一个年级，听说他在清华一年级入学考试时考分最高，是个“状元”。同班同学中还有曾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段学复，他也跳了一班，而且也考进了清华，所以又是我在清华时同一个年级的同学。师大附中还有一个同班同学刘曾复，附中毕业后学生理、学医，他也跳了一班，是我在清华同一年级的同学，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教授。不过他最大的名气倒不在医学方面，而是在京剧界，他是研究京剧的权威，一提起刘曾复京剧界的人无人不晓，在余叔岩派方面他的名声更大。国立清华大学是个名牌大学就更不用说了，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中的生物、化学等系不说，单讲我所在物理系的名教授，就有叶企荪、吴有训、周培源、赵宣尧、任之恭等许多位。学生中也人才辈出，如我的同班同学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惠，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物理学家。

我上过的那个江苏省立的二师附小，用今天的话也够得上重点学校的水平。它的前身“龙门师范”是颇为有名的。小学同学中有一位数学教授，名字一时叫不上来了，他有较高水平，聂荣臻同志主持科委工作时讨论发展规划，他是被特别邀请参加的。还有一位姓严的同班同学，出版界老人也许会知道他，是他第一个把大量外文教科书影印在中国出版，许多在大学学习过的都读过他影印的教科书。他虽然与我同年级，但是年龄要比我大得多。

我上的北京市立第三中学，历史悠久，它的前身是清朝雍

正登基后对皇族宗室子弟教育进行“改革”后成立的两个“宗室子弟学校”之一。依北京城的中轴线把北京城分做两半，在东城成立的是“左翼宗室子弟学校”。这个学校后来改成第二中学。在西城成立的是“右翼宗室子弟学校”，我的母校“京兆公立第三中学”就是它的后身。“右翼宗室子弟学校”的校址在西城绒线胡同附近的一条胡同。很荣幸，《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曾经在那里当过“瑟夫”，因此我就有这样一位伟人“校友”。从“右翼宗室子弟学校”算起，第三中学在 1994 年庆祝它的 270 周年校庆。在 80 年前改为第三中学多年后，这个学校中满族同学还是比较多的。作家老舍、语言学家罗常培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927 年我在三中时，虽然汉族学生已占多数，但也还有不少满族同学。那时这个学校没有“名中学”的声誉，但是这个学校的教学中开的一些课程如第二外国语“德文”、“国语概论”、“矿物学”等，是别的中学所没有的。我倒很喜欢这些课程。

总的说来，我进的那几个公立学校都使我喜欢。

说完公立学校，再说私立学校。私立学校中除了那个女子小学外，我只进过一个“大同”。但是在我所进的学校中，在这个学校学习的时间最长，有三年半之久：一年半高中，二年大学。这所大学是江苏籍的几个学者发起建立的。我记得起来的有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曹冠群、吴在渊、平观澜、朱香晚……办学的人也是这个学校教学的骨干力量，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也很会教课。这个学校有比较自由的学术空气。它的校园、设备虽然无法与国立大学相比，教师也少，只能分出文

理科，在理科中也分不出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等，但有一个好处，基础课学得比较扎实。

我上过的教会学校，一是时间短，二是都在小学和小学以前，因此说不出什么来。只记得那两所学校的老师（都是女老师）对我特别亲切和善。这同基督教的教义也许有关。

我进过的义务学校使我对贫穷家庭里的同学有一些印象。

我对爱群女子小学的主要印象是女同学们老是欺侮我。女孩子很多，男孩子只有我一个，她们常取笑我。她们玩，她们说笑，老排斥我。我在女子小学的那个学期的感觉，真还不如后来进过的私塾。私塾我也不喜欢，特别是在那里跟老师学的学生只有我一个。一天到晚，老是看着老师那张从来没有笑容的脸。老师并且是给我看病的医生，我不喜欢他开方子煮的中药，但是在我当了他的学生之后，我倒老是盼着有人找他看病。他给人看病时不论出诊或是门诊，我都可以自由一些。可是请他看病的人实在太少了。

我上过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学校，使我对各式各样的学校都不那么陌生，后来考虑起学校教育问题有比较多的亲身经验可以起支撑我的观点的作用，我觉得不同的学校各有其优点和作用，我也觉得对不同的学校不能也不应该千篇一律地要求。

根据自己的体会，我很能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自己的母校怀有这么浓厚的感情。

## 3.2 学历的一部分——上图书馆

填写履历表时，人们通常要填写自己进过什么学校。每当我填这种表的时候，我就想填一下我曾经是哪些图书馆的读者。因为图书馆对我学业长进的作用似乎不低于学校，因此似乎上图书馆也应该视做自己学历的一部分。

在上小学时，我还不知道利用图书馆。那时我不知道图书馆是怎样的一个东西。我想今天的小学生恐怕也还有不少同我当小学生时一样缺乏图书馆的概念。那些年，家中我父亲的那一点可怜的藏书事实上就是我的“图书馆”。

### 一、北京头发胡同图书馆

我开始跑图书馆是1927年我将要进北京京兆公立第三中学的那个暑假。我小学最后一个学期是在北平西四北礼路胡同铭贤小学学习的。到了北平，上海我家中的那个“图书馆”对我来说不存在了，而且那个“图书馆”里的书有的我已经看过两遍三遍，不愿意再看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在西单南路西头发胡同发现了一个公共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就是现在设在国子监里的那个首都图书馆的前身。进去一看，那么多的书！什么书都有！那个地方离我家住的那条胡同——西四南兵马司不太远。小孩子不怕走路，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发现这个图书馆的时候，快到小学最后一学期的终了，忙于毕业考试、初中升学考试，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得及再去。升学考试完

毕，在暑假期间没有什么事，就常常跑这个图书馆。在那里一坐就是二三个小时。以后初中三年，我一直是那个图书馆的读者。

在那个图书馆，一开头我还是借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而且主要是白话小说。接着就看起文言文的笔记小说，如《聊斋》、《子不语》那样的东西。再进一步就开始看《阅微草堂笔记》、《随园诗话》之类的笔记随笔。偶然也借两本先秦哲学的书望望。在那三年没有借什么自然科学书籍。

1930年初中毕业，考进师大附中，学校的功课很忙，教师教得也好，对课内课程的学习兴趣有所提高，就不跑头发胡同图书馆了。师大附中有比较好的图书馆，有时我也进去随便借阅一些书，但是没有成为这个图书馆的经常读者。第一个学期还没有学完，我就离开了北平。

离开师大附中后，我来到了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那时我有一个报考南京中学的计划，不过当时还没有到报名的时间，因此我在南京很闲，于是我就做两件事：一是拿了一张南京地图跑遍一切名胜古迹；二是到书店读书。我父亲住的地方是状元境，是过去到南京来考举人的那些考生住的地方。状元境像北京琉璃厂那样有许多书店。我既然住在这条巷子里，就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一有空便去书店，这些书店卖的书主要是古籍类的线装书，我也就站着看了不少线装书。有时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我们家出的那套《宜稼堂丛书》也就是在状元境的一个书店里看的。去书店根本没有买书的意思，口袋里也根本没有钱，完全是把书店当作图书馆。但是它们毕竟不

是图书馆，我不打算写进我的学历里去。

## 二、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

在我"学历"中的第二个图书馆，要数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馆址在闸北宝山路。我家住在上海城南大南门里，相距很远。但是这个距离没有妨碍我成为这个图书馆的经常的读者。我不怕步行，而且步行的速度很快，有在拥挤的人群中钻来钻去迅速前进的本事。

我何以会成为这个图书馆的读者，也有一段故事可以讲一讲。我在南京呆了两个来月之后，改变了在南京上中学的计划，决定不和当时在南京工作的父亲一起，而是回上海老家和母亲弟妹们在一起，在上海继续学高中。

一到上海，我的伯父就找我，说是他的亲家办了一个"化学工业社"生产牙膏。他姓马，牙膏也就用马头做商标。这个姓马的人很会经商，产品销往天津、东北各地。就是产品质量不过关，放一些时候就干了挤不出来。我在亲戚这个圈子里是一个"有学问的小孩"。我伯父就代表他的亲家来要我帮助。我当然没有现成的办法，但我知道利用图书馆。我打听了一下了解到商务印书馆有一个东方图书馆。于是就跑到那里查阅资料，从几本英文的化工手册中查到了若干牙膏配方，我研究一下决定建议他们加一些甘油。他们听了我的建议，试了一下，说是问题解决了。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简单，这么顺利。

这是我第一次利用图书馆解决实际问题。我去东方图书馆最初的目的是解决"马头牌牙膏"的质量问题，可是我走了

几趟之后，发现上海有这样一个藏书丰富、借书方便的图书馆，于是我就经常去。我在那里看的书侧重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原来商务印书馆办这个图书馆的目的之一是为作者的写作提供便利条件，同时对外开放。因此它的藏书特别适合我广泛吸收知识的需要。真可惜这个图书馆在上海“一·二八”战火中被烧光了。

商务印书馆还有一个图书馆“涵芬楼”，是藏古籍的（涵芬楼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两个图书馆不在一处）。从1930年秋天第一次去东方图书馆到1932年1月28日，十几个月的时间我去过多少次就无法记清了。

## 三、中华学艺社图书馆

“一·二八”战火，首先在沪北杨树浦和闸北一带燃起，“东方图书馆”很快就毁于战火。就是它不被烧掉我也去不了了。“一·二八”事件发生后，上海南市的居民纷纷进租界避难。我有一个堂兄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我母亲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也去过那里。在去金神父路的途中，我发现法租界亚尔培路有一个“中华学艺社图书馆”，中华学艺社是一个由科学家们组织起来的学术团体。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兄弟，任鸿隽……等知名的科学家是这个社的发起人（其中不少人也是大同大学的创办人）。这个图书馆的规模与东方图书馆不能比，小得多了，但是藏书的种类很合乎我的需要。那个时候我到图书馆看的大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主要是物理学、天文学、数学方面。我的兴趣主要在自然哲学。这个图书馆这方面

的藏书不少，而且开架的书比较多，借书也很方便。这个图书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虽然是公开开放的，但到那里看书的人很少，非常安静，同时它距离我南市的住所也比东方图书馆近多了。此时东方图书馆已经毁于战火，我就转而经常到这个图书馆。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到这个图书馆读书的时间很多，得益也很多。

## 四、大同大学图书馆

后来我发现就是我所在的学校——大同大学的图书馆对我也很有用处。开头我有点看不起它，开架的书很少，要看书都要开借书条，而我喜欢翻书，翻一本换一本。后来我发现这个图书馆也很不错。特别是有一个图书馆员的服务态度特别好。这个图书馆员是个女的，名字叫忻爱华。她也是大同大学学生，比我高三四班，学外国文学。她也是半工半读，一边读书，一边当图书馆员。我同她之间除了借书还书外，没有讲过话，但是我对她印象非常之好。我是一个不好对付的读者，常常在图书馆查一些书目卡片，觉得有许多书都想翻一翻，就开了许多借书单，要她从书库里把一大摞书抱到阅览室来，对这些书我往往只是翻一下，也许只留下一两本，让她把一大摞书抱回书库，过一会儿我又开了许多借书单要她从书库里再抱一大摞出来。对我这种要求，她从来没有表示出一点不耐烦，很耐心地出出进进。她总是面带笑容。特别是听说她患有肺结核，在阅览室也常听她咳得很厉害，有时我觉得这么去麻烦她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我改变不了自己的脾气，一进图书

馆总是去麻烦她。1934年我转学清华后不久，这位忻爱华同学，因为婚姻不能自主，本人又有肺结核等多种原因自杀了。她的模样我一直记得相当清楚，矮个儿，嘴上面汗毛特别重。我同她虽然除了借书还书之外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她的自杀给我的刺激相当深。我和一位大同学生程淡志对她自杀这件事写过有一两万字的许多封信进行了分析。我们从中加深了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1935年暑假我回到上海，打听到她的墓址，跑了很多路到她的坟前凭吊了一番。

我在这个图书馆还是乱七八糟地从自然哲学的角度读了一些书，有些书的内容我至今还记得。看到这些书，我改变了一个观念，不少自然科学家也具有很丰富的想象力，他们并不一定要在很有把握时才发表意见，因此许多意见后来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 五、清华大学图书馆

20岁前我学历中的第五个图书馆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在清华上过学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对这个图书馆有深刻而美好的回忆。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学生宿舍是两个人一间，一个人一张写字桌，一个书架。比今天的清华的学生宿舍好了不知多少倍。学生们在宿舍里可以安静地读书，可是同学们还是每天带着课内作业到图书馆去。图的是图书馆非常安静。在清华图书馆中如果有一个人大声说话，全阅览室的人都会向他行注目礼，再出声就会有人嘘他。同学们去图书馆主要是利

用图书馆阅览室这个好的读书环境，不是利用图书馆的藏书，但是在图书馆查阅参考书、使用工具书毕竟比宿舍里方便多了。1935年暑假前，我经常利用这个好的读书环境，对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利用得不多。作为图书馆我利用较多的反而是物理系的图书馆。这里我讲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是把物理系的图书馆也包括在内了。

在写我上清华大学图书馆时，我不得不超过20岁前的范围讲一段我在清华上最后一个学期的事情。在这个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我选了张申府教授开的一门形而上学课。申府先生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英文体)也作为参考书。图书馆管理员就把这两本书从书库里取出来放在阅览室，随时可以拿过来阅读。选张申府这门课的人本来就很少，只有十来个人，别人似乎不看这两本书，我每次去都能一下子拿到这两本书。于是就在图书馆里认真读完这两本书。读这两本书对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的关系，它们解决了在这之前我在读各种有关自然哲学书时产生的许多问题，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信服。在张申府百岁诞辰时我写了一篇《这件事还得感谢申府先生》，文中的“这件事”就是把这两本书作为参考书开出来，使我在1936年上半年能够从头到尾阅读一遍的事。这件事是在我过20岁后不久发生的事，既然写到了清华图书馆，也就顺便在这里写几句。

## 3.3 我的私人化学实验室

一个高中和大学本科一二年级的学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私人的化学实验室，这种情况在学生中间是很少的，我有许多同学，没有听说他们之中谁有这样的财富。

事情总有个来由：1931 年我在一个化学工业社当技师。我当技师也有个来由，那就是我二伯父想办一个化学工业社，但是本钱不够，动员我父亲入股。我家没有钱，就动员我父亲把地契拿出来，让他拿它出去抵押借钱。我父亲失业，我伯父请我父亲当这个工业社的技师。我父亲没有这个兴趣，技师的实际职务就由我来担任了。当了技师当然要有一个化学实验室，于是把我祖母原先住的那间楼下的东厢房给了我。我就把这个化学实验室搞起来了。

房间只有二三十平方米，但也够用了。我买了一些化学仪器，甑（曲劲甑）、皿（蒸发皿）、瓶（烧瓶）、杯（烧杯）、锅（坩锅）、架（瓷三角架）、管（试验管）、灯（酒精灯）以及各色各样的漏斗、各式各样的玻璃管……总之，应有尽有。我也没有忘记搞一个琉化氢发生器。当然总得有一个天秤，也去买了一个，虽然够不上分析天秤，但也可以测到毫米的精确度。还有许多试剂。这些东西，在棋盘街的商店里都可以买到，而且说来价钱并不贵，装备我的这个实验室只花了工业社的几百块钱。

我也就睡在这个实验室里。白天上学，常常在晚上做试验。

我的工作任务是为这个工业社开发产品和改进工艺流程。我为它开发的第一个产品是"土耳其红油"。土耳其红是一种染料，也叫毛巾红。白毛巾上印的红色字和图形用的就是这种染料。在印染方面的要求是使染料不褪色。土耳其红油是一种媒染剂。制造的方法(处方也是我在化工手册上查到的)很简单：先把浓硫酸加到蓖麻籽油里起化学反应，然后加碳酸钠，使它变成可溶于水的液体。但要试制成功，形成规范化的工艺流程，也在这个实验室里花了一定的时间。这种产品是我们这个化学工业社的主要产品。

我为这个工业社开发的第二个产品也是媒染剂。名称用的是我起的商品名——固色灵。这东西的处方倒不是现成的，是我试验出来的配方，它更加简单：把硫酸铜里的结晶水用焙烧的方法去掉，然后加一些浓硫酸拌和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产品。这种产品也投产了。

因为这两个产品都是媒染剂，就要试验它固色的效果。即在染色之后，有多少染料与织物上的纤维起化学变化，有多少染料还在溶液中。固色还可以起到节约染料的效果。这样的试验在我的实验室里进行，同时也同一家染坊建立起密切关系，去那里做试验。那些日子我的两只手常常是红的或者蓝的。

我在这个实验室里做试验准备开发的第三个产品是碳酸镁，它是制造橡胶鞋的填充剂。我们到浙江平湖联系好可以提供廉价卤水做原料，也准备就在那个地方设厂。生产流程似乎也很简单，在卤水中加碳酸钠，碳酸镁就沉淀下来，滤过后再

用水冲洗掉其中的盐分，就可以取得产品。这是非常简单的过程。为了开发这种产品，我花了许多倍于上面两种产品试验的时间，但是最后得出结论：这个产品我们生产不了。理由是采取这种湿法生产流程来制造的碳酸镁，有两个致命的缺点：第一，由于它是沉淀物，把沉淀物磨成粉之后，单位体积的重量还是很大，而作为填充剂使用看重的不是碳酸镁的重量，而是它的体积。密度越大，成本越高。而且这样的碳酸镁生产出来的胶鞋也不理想。第二个缺点是沉淀下来的碳酸镁里的盐分洗不干净。碳酸镁看来不溶于水，其实溶解度还是不太小的。洗的次数多了，盐分减少，碳酸镁也减少了，这是很不合算的。我做了许多试验得出的结论是，要生产这种产品就要采取别的生产方法，需要使用某种热风炉使得生产出来的碳酸镁密度很小。而这不是在我的这个小小的化学实验室里所能进行研究的。同时我们这个化学工业社既掌握不了技术，也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因而必须下决心停止开发这个产品的试验。

我在这个实验室做试验准备开发的第四个产品是“金耳”。我看到制造“有意想不到的效力”的“百龄机”的黄楚九（他是上海的名人，原先是在城隍庙卖药，后来成为“大世界”游乐场的经营者）大做广告，推出一种比“银耳”营养价值高许多的“金耳”。当时的银耳没有现在这种人工培养的，它作为补品的地位也比现在高。黄楚九就在金银两字上做文章。我买来黄楚九的金耳，判断它是用黑木耳漂白而成的。我就在实验室里用过氧化氢来漂白黑木耳。过氧化氢不会有任何毒性，用它做漂白剂不会影响食用。我做了一段试验之后，“制造”出来

的产品，从外表上看同黄楚九的金耳很相近。它的营养成分，我这个实验室还不具备对之进行有机物定量分析的条件，估计不会比黄楚九的差。但是考虑了经营问题，我们广告费出不起，与黄楚九竞争还会带来许多复杂的问题，也决定不去生产这种产品。应该说我们之所以决定不去投产这种产品，不是因为技术问题和生产成本问题。这些我算了一下还是很有利可图的，只是在与黄楚九的竞争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也就把试验成果搁在一边不用，而黄楚九的金耳宣传了一个时期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再宣传，它的影响远比不上“百龄机”。

三年的时间在这个实验室做的试验很多。

我的二伯父每天晚上回来很迟，他在睡前总要跑到我的实验室看看我当天工作的进展情况。我也就把自己的试验结果和我的想法告诉他。他认识的人还是很多的，就把他接触到的市场信息告诉我。我做试验缺少什么条件，他常设法帮我解决，而正式担任技师的我的父亲对我这个实验室的工作却从不过问。我有时倒请弟妹们来实验室做一些有趣的试验让他(她)们看看。

我对做化学试验、制造某个产品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在二师附小四五年级老师让我们在学校的实验室制造肥皂那个时候。我制造出来的第一块肥皂用的原料是硬脂酸和氢氟化钾，是在烧杯里起化学反应，制作出来的“肥皂”我给染上了咖啡色。这肥皂的特点是不起沫，因此不能说成功。接着做的是“雪花膏”，制造出来的产品在外表上倒无可非议，只是不知用它来抹脸，对皮肤是否有坏处。

我对做化学实验的兴趣，还同我父亲在1924年到1926年这段时间在家制造蓝黑墨水等产品有关。他还把人的头发洗净、漂白制作成条带和从照相馆买回底片，从中提炼出白银等等。在他动手时，我都在一旁帮忙。我还记得这样一个笑话：当我父亲做出一罐墨水后，要把墨水灌到瓶里去时，利用虹吸管的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其实使用虹吸管来做这件事情，办法很简单，用一根橡皮管装满了清水，用夹子把橡皮管的口夹紧，一头放在盛墨水的容器里，一头放在比容器里墨水的水平线低的地方，然后把夹子打开，流完了清水，便自然流出墨水。可是父亲竟不知道这么做，而是把橡皮管的一头放在盛墨水的容器里，让我用嘴去吸橡皮管的另一头。结果我总吸了一口墨水，嗽口后，还是蓝舌头。

父亲还做过玫瑰香水，办法是从上海一个大花园弄到100多斤鲜玫瑰。他做了一个下面可以加温的箱子，把花放在最下面，用微火加温，让花的香气(这是一种挥发性比较强的气体)在箱子里经过很长距离的一条曲曲折折的“胡同”。在这“胡同”的墙上涂薄薄的一层猪油，让猪油充分吸收玫瑰的香气，最后把这些猪油刮下来再用乙醚集中起来，得到高纯度的玫瑰香水。这一小瓶玫瑰香水的瓶塞被我的大妹打开洒掉不少，可就这样我家住的房间香味一直保持了有半个来月。

父亲当时干的这一切，我都有很大的兴趣。

而现在我有一个可以自己支配的化学实验室，我就可以对什么有兴趣就去做什么试验，包括当时开始用石碳酸和福尔摩林来制造电料这样的事情也都在我的实验室里做过。至

于更多的日用产品等等，就不值得去提了。

## 3.4 看打牌 看下棋

我想把看打牌、看下棋也作为我学习生活的一个侧面。因为从事这种活动对于锻炼我的思维能力的确是有帮助的。

不论哪一种棋、牌，我都有兴趣，但是都没有很高的水平。有一些棋和牌我还不会下、不会打。

先说打牌。我记得起来对打牌的兴趣开始于10岁左右。我住的是一个大杂院，在邻居中经常有打牌的，我常常坐在旁边看，就看出了兴趣。

不妨把我看到的打牌说一说。

我们中国人打的牌有两种，一是民族传统文化，一是从西方引进的。本民族原有的又有两个系统：一是从骰子这种六面体发展起来的。骰子上的“一二三四五六”大点，两点可以“一一”“一二”……一直到“六六”21种组合，把组合中的每一种刻在骨牌上就是“牌九”牌（当然也可以做成纸牌，但是在我10岁的时候，这种纸牌早已不那么使用了）。

本义的“牌九”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赌博工具。它一共32张，除上述的21种牌之外，还加上“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一三”、“一五”、“一六”、“四六”、“五六”各一张。玩时把牌扣起插乱后，分给东南西北门四家，每家两张。四家中一家是庄家，赌博时人们把赌注下在其他三家的位置上，然后翻开，比较原先规定的两张组合起来的二三一副

牌的大小，大于庄家者，按所下赌注由庄家一配一付出，小于庄家者，庄家就把赌注“吃”掉。对这种赌博，我毫无兴趣。我说的打牌也不把这种“牌九”包括在内。

由两副这样的牌九可以合成一种叫做“六十四”的牌。这种牌很简单，但是打起来多少有些兴趣。四人进行比赛，把牌插乱之后，分给每人 11 张，还有 20 张可以摸一张打一张，还可以吃进打出，3 张成铺，成铺的条件是：(1)3 张相同的牌；(2)3 张牌中“一二三四五六”六点齐全；(3)有“五个相同的点子”。12 张成四铺者和。由于牌少，每一局用的时间不多。这种牌，大人嫌太简单不爱打，因此很少看得到。我却因为家中正好有两副牌九牌，可以凑成一副“六十四”，同紧邻我的表弟和小朋友们打过几回。

21 种牌九牌，每样 6 张，共 126 张，3 张是白的，3 张有花，有花的中间又有 2 张小花，1 张大花。打起来也是 3 张一铺，只有 3 张同样的牌，而且其中至少要有 1 张花才能成铺。打这种牌时，经过自摸、吃、碰，谁能做到 15 张都成铺者为和，按每铺的分数之和记总分（分数多少看各铺花白的组成而定）。这种牌叫挖花。妇女爱打，男人不喜欢打，我也认为太死板，不喜欢看。

还有一种由牌九牌组成的牌：由 21 种牌，每种 5 张，共 125 张，而且全是白的。打牌的方法也是把牌洗好之后，每人发 14 张，还有 46 张牌可以摸一张打一张，还可以吃和碰，也是 3 张成铺，成铺的条件也是一二三四五六点齐全、有五个点子相同和 3 张相同的牌。这种牌的牌规很严格，谁打错了一

张，他和了就不算数，不但自己不能赢，别人输了的钱也要由这个人包赔。因此打下来的牌不扔到海里而是要依次放在自己的右下角备查。同时这种牌也比较复杂，因为即便吃进成铺、亮在桌上的也可以拆了重新组合。这种牌小时候我看过许多次，知道打这种牌的规则，可是这种牌现在没有人打，我问了许多人，包括年老的上海人都说不知道有这种牌，也许今天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种牌了。我怕这种牌失传，因此许多年前我曾向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提出过，我可以把这种牌的规则向他们传授。最近我又给体育运动委员会办的《运动与休闲》写了一篇题为《不要让它失传了——介绍一种中国传统的牌类"同其"》的文章。

在我们中国人打的牌中，还有一种是不属于牌九牌系列的，我只看过打过其中一种"麻将"。我10岁左右喜欢看麻将。那时打麻将比现在打的要规范得多，作为翻番记分有一套标准，翻番也比现在的严格，不像后来巧立名目多得不得了。我觉得现在的麻将与那时看到的有某种退步。

从外国引进的牌当然是扑克了。那时人们不打现在许多人打的100分或500分之类。桥牌我是一直到20岁时才接触到的。那时我在一个家庭内当教师。这个家庭有一个朋友就是金岳霖。我认识金岳霖教授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他打网球也打桥牌。他有一个藤书架，放的全是桥牌书。不过我不懂桥牌是一种怎样的牌，看人下了几盘也没有看明白。我说的扑克是上海人叫做"沙蟹"(读音 so ha)的那种，也就是冯诺依曼和摩根特律恩那本《竞赛论和经济行为》的书中所写的

"扑克"。"沙蟹"这个叫法明显的不是中国话。但是在外文字典中查不到,它是上海"洋泾浜"英语。据说因为打这种牌最后有可能出钱看对方手中的牌,比大小,决定输赢。"看你手中的牌"在洋泾浜英语中就变成 saw your hand(不知道为什么用 see 的过去式),而 saw your hand 又读作 so ha。对这种牌,我不想作具体的介绍,总之是经过发牌五张—换牌—谁要看我手中的牌就必须拿出的赌注的数量—双方摊牌:这样的过程赌输赢,五张扑克牌有 2598960 种可能的组合,按照牌规可以分出大小。这种牌的赌博性很强。

这种牌我们那个院子里打得不算多,但是我对它也很熟悉。

我不打牌,除玩过几次"六十四"外,一般我不自己打。我只是看,看得津津有味。不过 12 岁时离开上海去北京,环境一变,看打牌的事就不再继续下去了。

关于下棋。我父亲会下围棋。也是我八九十来岁的时候,他闲得无聊,就教我下棋。先是在 10×10 即棋盘的 1/4 的范围内下,教我懂得下围棋的规则。后来在标准棋盘上教我下,先饶我 25 子,未下之前,棋盘上我的黑子就星棋密布。我父亲执白子,就在我的黑子阵里冲杀。开头他还胜过若干盘,后来不行了,就逐渐减少饶子的数字,从 25 减为 13,再从 13 减为 7、5、4 子,这时候我要胜他就很吃力了。最后让至两个。下围棋这件事倒没有因为我从上海到北京而改变。在北京,我父亲还带我去宣武门内大街路东"海丰轩"去看了许多次别人下棋。"海丰轩"是一个卖糕点的字号,走进去就是一个专门为下

棋人服务的茶馆，有许多间房子，每个房间有好几个棋桌，并有看下棋的人的座位，有正在下棋的，也有坐在一旁看棋的。下棋的看棋的都要花茶钱，下棋的还要多付租围棋和棋桌的钱。当我从糕点门市部走到后院时，还没有进房门，就可以听见从各个房间里传出打棋的声音。我和父亲一去至少两个小时。看人下棋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星期天，我父亲听说吴清元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下棋，也带我去了。那时我大概12岁，吴清元才不过十四五岁，已在围棋界有很高的声誉。许多人一声不响围着认真地看。这一件事，在我的回忆中非常深刻。

关于象棋我不记得是怎么学会的，我印象深的倒不是看人下全局棋，而是看在北京街上摆的残局。一个人在地上摆一个残局，谁愿意同摆残局的人比赛，可以下彩注下场。这种残局双方如果都懂得怎么下，结果一定是和局。这是摆子的人早就研究好了的。因此他一定不会输。如果下场比赛的人不懂得下，就一定输。看看下这种残局是挺有意思的。在街上站着看，也不用付什么茶钱。为了看这种残局，有时我几乎误了上课的时间。

在看人打牌、看人下棋时，我常常站在某个竞赛者的立场，同他一样地思索，因此我虽然几乎不打什么牌，下不多的棋，但是我能够体验到打牌下棋者的思想感情，而且不断地用脑思考。

不久前我看到一篇介绍“三国”时期韦曜事迹的文章。这个韦曜是吴国人，当时吴国盛行下围棋，孙权的孙子孙和认为下围棋没有好处，就让他身边的几个人各写一篇纠正这种“不

良风气”的文章。韦曜写的那篇题目就是《博奕论》。他从“废德”、“废行”、“废业”、“废时”几个方面来反对下围棋。围棋“变作为务，以劫杀为名”就是“废德”。“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张”就是“废行”。“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就是“废业”。“忘寝与食，穷日竟明，继以脂油”就是“废时”。这篇不到1000 字的短文后来成了反对围棋的经典。据说韦曜本人是很喜欢围棋的，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篇奉命写作的违心之文，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恐怕现在有这“四废”偏见的人，也还不少呢。

那几年在上海和北京看打牌、看下棋，的确占用了我不少时间，但是我总认为它也是自己的一种学习。任何学习总是要付出时间的。既然我认为自己从中得到了好处，在德、行、业等方面都没有产生不良的结果，因此把它视作本人的一种学习，我认为是应该的。

## 3.5 记得起来的“玩”

小孩子不会不玩。我爱读书并不意味不玩。不过我毕竟玩得少，记得的玩也就少。在玩的方面，我的兴趣侧重于智力游戏。我小时候的生活应该承认带有这种片面性。

体育活动，不是完全不搞。在北京上最后那一个学期和上初中时，我受武侠小说影响，打袖箭、飞镖等等。袖箭靠弹簧，力量很小，勉强可以把箭打在木板上。小说里描写的可以伤人杀人的袖箭决不是当时我可以在北京街上买到的那一种。飞

镖尾部带有红绸子，保证镖尖向前，可以打上靶子——家里的大门和柱子进的深浅，要看我的气力，我练的就是这种气力。我还练飞刀。各种我认为适用的刀，我都能让它飞起来打到靶子上。对使用这种武器我还真练出过一点功夫。拳脚也练过，武当、少林、猴拳，都练过一阵子。关于太极拳，我的姨父沈维周是太级拳的专家，精通陈氏太极。我的母亲也会打太极，练太极拳我有比较好的条件。据说太极拳在打人时可以借他人之力打他人，但是我还是认为在打架时很难用，动作又慢，学过，不想练。我练武功有一个时期——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可真刻苦，为了能够把轻功练出来，在小腿肚子那里捆上重物；为了锻炼筋肉，在严寒的北京冬天只穿一条单裤（结果冻成了关节炎）。早一点不懂得"作用与反作用相抵消"的定律，还拼命抓住自己的头发往上提。少年时的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够可笑的。

在普通的体育游戏中，球类中的篮球、足球、网球可以说都没有玩过。对乒乓球还有一点兴趣，但是没有练的条件。在上海家里的客堂间把两张八仙桌一拼，中间留下一个空档代替网子，打乒乓。我打得也很起劲。体育活动要有条件，我从不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在家里也就只能做到这些。当然像踢毽子那样的活动我也做过。

对郊游我还是有点兴趣的。记得在上海和我远房表弟一起钓过几次鱼。两个人总共大概只钓上七八尾，后来干脆用自制的网捞小鱼，捞回来给弟妹们玩，可是养着不到几天就死了。

每年春节是小孩子玩得最高兴的时候。放鞭炮烟火之类的，我们小孩子们特别喜欢。春节街上小店里卖的玩的东西也特别多，手边有点压岁钱我就买回来玩。记得有一种游戏最初叫升官图的，玩法是在纸上印了一条曲折回旋的线，上面印了许多标志着升官时的许多阶梯和带关键性的事情，几个人都从起点开始，用一个特制的有四面的陀螺，这四面是“德才功赃”四个字，最后看倒下后朝上那一面的字，就按事先规定前进和后退。前进和后退时到达的那个位置不但有好有坏，而且有的可以再前进若干步到某个位置，或者倒退若干步到某个位置。后来大概觉得这种升官图过分宣传当官了，就做了一些改变，如改成在红楼梦大观园中游逛，并改用骰子决定前进的步子，不过相比之下不如升官图好玩。

除了过年就是过节。元宵端午重阳都有适合这个节日的玩法。阴历七月三十是鬼节，是供奉地藏菩萨的日子。那天晚上在地上插满了香，香点完了，就可以从地上拔下一把一把的小竹签，我和小朋友们就用竹签编成篱笆之类的东西……

总之，那时候的玩，同现在小孩子的玩，大不相同。没有多少先进的技术，能动的玩具只有上发条的那一种。那时候玩的东西现在的小孩子根本看不上。70来年前的事情真不能和当今的事情同日而语。

但是我上的那个省立二师附小，在四五年级时还让我们做了些物理和化学试验，我把在学校学得的一些物理、化学知识加以利用也作为玩的内容。在上海我用硫酸和铜、或者氢氧化钠和铝使氢气产生出来，装进气球，让这些气球飞上去，都

顶到天花板上。在北京我们还制作幻灯机，请我表哥画连环画，在家里放映，娱乐大家也娱乐自己。

我几乎不看电影。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对于看电影，有三件记得牢的事情，一件是在上海小时候，伯父不知从哪里弄来胶卷和放映机，在家里院子里放了又放，不知道放了几次。片子很短，是一部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景象的纪录片。我们把这部很短的片子叫做《火烧德国皇帝》，因为有火烧德国皇帝画像的镜头。关于演这部电影，我还记得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乡下人到我家的这个院子来，正赶上放映这个电影，他看了很奇怪，在电影完了之后，摸了摸那个布幕，说"明明是一块布，里面怎么能走出人来"。还有一件是在刚进师大附中的 1930 年下半年，那时有声电影发明不久，我看的是科普片，银幕上只有一只大公鸡叫了一阵子，然后在电影里解释有声电影的原理。那时还没有哪家影院放映过有声电影。我可能是中国最早看过有声电影的人中的一个。第三件是我在上海当家庭教师时，学生的家长带小孩到开张不久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美国的歌舞片《第 42 号街》。

当然我也看过若干部电影，我只记得那时在电影广告上都写明是多少本长的电影，一本就是一个胶片盘子。尽管使用两部放映机，有时技术掌握得不好，在换盘子中间有停顿。电影的内容我只记得有两个种类。一个是以"侠客"、"强盗"、"女郎"三种人为主角的；还有一个是卓别林和罗克的滑稽片。看得很少，连一个具体的片子都记不起来了。

实在记不起多少自己关于玩的事情。

## 3.6 我的老师

大概由于我不好好听课，20岁前我上了这么多的学校，可是记得起来的老师，却少得可以一个一个地数出来。对于他们，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大都提到了。按照进学校的先后，概括说来：(1)清心幼稚园、苏州南濠街义务小学、爱群女子小学的老师没有一个给我留下印象。(2)私塾老师姓徐，在第一部分中已经提到过。(3)二师附小学了好几年，只记住了一个老师，那就是四年级时给我们讲鸦片战争历史和"五卅"惨案，带领我们上街的那位，我只记得他是位男老师，姓名早就忘了。对他除在第一部分做了描绘外，在沈阳的《下一代》上发表了一篇感谢他的文章。(4)铭贤小学我记得那个对我进行考试并且决定录取我的女教师。(5)在第三中学我在第一部分中提到了白涤州，他的名字之所以记得，因为他是一位研究北京方言的专家，以后我还在一个刊物上看到他的名字。有两位没有提到，一位是教我"三S几何"的孙丽英。她是师大高年级学生，到三中来上课带有实习的性质。我还记得她长得相当漂亮，个子不矮，上课时穿旗袍，课教得不错。不过我之所以记得她，不是由于她的教学而是她是唯一的女教师，年纪又轻，大概20出头，我们班的学生(全是男生)对她不那么尊敬，有时还欺侮她，背后又乱说她这个那个，我颇不以为然。在第一部分中我还写了一句"三中初一教语文的老师对鲁迅的作品讲得很好"，对于这位老师，下面我想多写几句。(6)师大附中，我

记得的傅、王、汪三位老师前面都写了。(7)上海大同的三年半中，前面我提到教我几何的吴在渊，我想还应该提到教过我化学和德文的戴岂心、穆勒《逻辑》的胡敦复、光学的胡刚复、微分方程的陆慎仪、《说文解字》的朱香晚。胡敦复是上海大同的创办人之一，他知识广博，许多课都能教。他不是逻辑学家，教逻辑学没有自己什么见解，不过讲得很清楚。朱香晚的《说文解字》讲得很生动，敢于讲他自己的见解，他讲课的内容，有一些现在我还记得很牢，可以复述出来。记得我还做过一个关于陆慎仪的梦。梦中他问我，一只甲虫从 $A$ 点出发一直对准 $B$ 点向前爬，但是它的视神经有毛病，总有一个 $\alpha$ 角度的偏差，这只甲虫走的是怎样的一条曲线。在梦中我用英文回答说 cateaary(悬绳线)，醒后感到可笑，明明是一条 spirat(螺旋)，怎么在梦中胡乱回答呢?(8)在清华第一年的老师;吴有训、叶企荪、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等，对他们我就不在“20岁前”的范围里讲了。

现在我单独来讲上面提到的那个在初中一年级教我语文的老师。这位老师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给我们上了好几堂关于鲁迅作品的课。在这位老师讲课前，我没有读过鲁迅的文章，甚至没有听说过鲁迅这个名字。这位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是鲁迅作品《野草》里那篇《秋夜》，我记得很清楚是选入课本的。这位老师就讲授这篇作品。文章开头两句话:“在我家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觉得这句话很别致、很新鲜。心想要是平铺直叙地讲一句“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会多么乏味。他让我们去体会这篇

作品中鲁迅所写的那个“奇怪而高的天空”，我就说不出什么来了。在初中一年级，这位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孔乙己》——我记得那也是被选入课本的。此外，他还教我们《呐喊》里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以及《彷徨》、《药》等等。这几篇课本里没有选入，但他还是让我们自己阅读而且辅导我们学习。在他的讲授中，鲁迅的作品占到很大的比重。他讲这些作品时带有深厚的感情，而且使我明显地感到他把我们这些少年的思想引向深处。由于他引发了我对鲁迅作品的极大兴趣，我这个穷学生还特地到书摊上买到了《呐喊》、《彷徨》，把其中每一篇文章都看了。《野草》我也买回来了，那本书里的文章，有些我读不懂，只觉得诗中的“赤练蛇”、“冰糖葫芦”很有趣。我感到这位语文老师对我思想进步是很有帮助的。

只有十二三岁的我，当时居然看出这个语文老师是个革命家。这是我把他同自己上面提到的在二师附小教我语文的那位教师进行比较形成的看法。1925 年，在上海我听到关于共产党主张的宣传，当时就想那个小学老师很可能是共产党员。初中的这位老师，虽然没有把我们带上街头，但是前后两个语文教师讲课我总觉得有不少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也认为他一定是革命者，很可能是共产党员。

这位初中老师我也只有他姓张的模糊印象，他的名字和模样完全忘了。我一直为此遗憾。1994 年 7 月，三中周校长来我家。我谈起这位教师，他说根据三中校史资料，这位老师本名是张伯高，后来改名张苏，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同志。张苏同志我是很早就听说过的。建国前他在察哈尔省担任领导工作，

后来一直在北方工作。我同张苏虽然不熟，但是以后是相识的。真没想到我一直遗憾地忘记了姓名的那位语文老师原来就是他。现在又一个新的遗憾产生了，那就是他已在1990年去世，我永远失去了当面向他表示感谢的机会。

## 3.7 我的同学

在20岁前我的同学中，我记得起来的不多。

我上过这么多的学校，同学当然很多，但是上的学校多了，在每个学校的时间就比较短。这是我记得起来的同学比较少的一个原因。在这么多的同学中为什么只记得这几个总有原因，“特别要好”是原因之一。也有并不要好但有关于他的特别的事情，也就把他记住了。也有现在说不出什么原因的。

我上的第一个学校是苏州金门外的义务小学。现在我只记得一个姓潘的同学和我特别要好，但是更多的包括容貌、名字、性格等一概记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记得这样一个姓。

爱群女子小学的那些女同学我只有怕她们的印象，自然一个都记不起来了。

私塾只有我一个学生，没有同学。

在江苏省立二师附小，诸尚圭、黄玉培这两个同学的名字我一直记得很牢。黄玉培是高级民主人士、鼎鼎大名的黄炎培的儿子。我一直错把“培”字看成排行，以为他是黄炎培的弟弟。建国后我见到黄炎培，立刻想到黄玉培的面容，他同他父

亲的脸盘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我一直想见黄玉培一面，由于他同黄炎培的父子关系，找到他应该不难，可是至今还是没有联系上，因此对他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关于诸尚圭，前几年无意中得知他是我妹妹的邻居。一次我去上海，访问了他。诸尚圭的父亲是诸青来，也是上海的名人。在见到诸尚圭时他的容貌却完全陌生。小时候他长相如何，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最近我去上海想再见他时，他又搬到别处去了。新居的地点我妹妹不知道，又断了联系。

在铭贤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只记得一个姓宝名英的满族女同学。

接着是我学过三年的第三中学。在第三中学，我有两个要好的同学。一个是和我一起编手抄本《白》杂志的。他姓陈，名字我记得很牢，但是不想写下来。在编这个杂志时，我和他各写一长篇小说，当时我们是很投机的。还有一个姓孙的，在这里我也不想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他虽然没有同我一起编《白》杂志，但也很要好。这两个人特别是姓孙的那一个，常到我家里来。北京人那时把孩子的同学叫学伴。对这两个学伴我妈妈都很熟悉。1930 年初中毕业分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们，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1935 年我在一位从山东回来的朋友那里打听到孙在青岛大学，说陈在政治立场上已站在国民党方面，劝我不要和他联系。这样我同他再也没有联系。在我编《白》杂志时，孙的文艺思想比我先进，那时我还接受鸳鸯蝴蝶派的东西，而孙喜欢看郭沫若描写北伐战争的小说和辛克莱的《石炭王》。不过很不幸，他读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文艺作品却

使他在初中毕业时走错了一步。他以为当时国民党的黄埔军校还是1924、1925年时的黄埔军校，于是去报名投考这个学校，而且被录取了。毕业之后就成了一名国民党的军官，在抗战前曾到我家来过。抗战爆发后，1939年我在广西宜山城郊区见过他。那时他是汽车连长。建国后我从公安部门听到一个消息，说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已经到国民党的宪兵队成为宪兵队的一个头目，比起当国民党的汽车连长又在反动政治的泥坑中陷得更深了一层。建国后，他干脆干起特务工作来了。到北京做间谍工作，并且在香港打听我的情况。他只知道我在三中用的那个郁鍾正的名字，不知道后来用的于光远的名字。可是公安部门还是把这一点查清楚了，向我介绍孙在那时的情况。公安部门决定让他回来，后来果真回到了北京，就被我公安部门逮捕。以后经过改造，做了新人。他先是在北京陶然亭监狱里服刑，刑满之后在一家塑料制品厂工作。据说前几年去世了。三中还有一个同学叫潘学阁的，前面我专门写了他的一段故事。三中的同学我还能叫得出好几个人的名字来，其中包括后来同我一起考进师大附中、毕业于北大、前几年还在北大担任生物系主任的陈阅增。

我在师大附中读高中，没有学满一个学期，可是同学的名字记得的却不少。其中有几位社会上的知名人物。如林家翘、刘曾复、段学复、陈阅增等。还有一些同学常常想起，但别后一直不知道下落。我特别想说的是王良恭，他是师大教授王鹤清的儿子，是附中同班同学，后来他也去了清华，“一·二九”后也是民先队员。他的父亲王鹤清是师大化学教授，来附中我们

这个班教化学。大学教授教中学毕竟不同。他讲的这门化学很深，我很喜欢。1936年他去广州勷勤大学当校长。王良恭随他父亲去了广州。那时我在广州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准备作为民先队广州地方队部，不过还没有打出这个旗号就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了。那次似乎没有影响到王良恭。就是从那时(1937年2月)和他分别后一直没有消息，我常怀念他。附中还有一个同学名字还记得，他叫欧阳昌明，个子高高的，是个运动健将。

下面该说到“大同”。从时间次序讲，我最早的一个同学叫沈熙篯。那时我上高二，他比我低两班，是个“国学世家”的子弟。他本人对国学也有很大的兴趣。由于我回家经过他家门口，常常到他家里坐坐。他家线装书很多，还有许多碑帖字画。我同他成为朋友是建立在他向我讲国学引起我兴趣这件事情上面的。他有许多知识是我所没有的。他教我练毛笔字，并且说不能练帖，许多字被刻帖的人刻来刻去，都刻坏了，而应该照碑来练字。而且他主张把碑放在纸下，不要吝啬写坏碑文，以便学好整体结构。他送了许多拓出来的碑文给我。和他的交往引起了我对国学短时间的兴趣，不过我没认真练字，以致书法很差。近年来有人要我题字，遂令我常常想起沈熙篯来。他没有进普通大学而是进了无锡国专，以后就音讯全无了。

20岁前我还过了三年大学生活，最亲密的朋友当然是程淡志一个人。讲我20岁前乃至20岁后的经历我经常会提到他，我们一起活动，一起革命，而且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是我进大同大学本科这一年去大同的。他考进大同大学时，只是育才

中学的初中毕业生。他是用假文凭赴考的，越过整个高中阶段。我们特别谈得来，从自然科学到社会问题，再从社会问题谈到本人的行动。我和他家住得很近，他住在药局弄55号，是一个两层楼的独门独院，父亲信佛，我去了对我很和气。后来我去了清华，一直同程淡志保持通信关系。我们两人之间的信常常写得很长，有时候一个信封装不下，就分装在两个信封里寄出。以后我与他之间的故事还不少，这儿只是提一下。

在上海大同，我还记得的同学有校长曹冠群的儿子曹友诚、曹友信、曹友和，他们后来长期在美国，有一位在回国时见到过。还有胡敦复的儿子胡新南。在大同附中的同学中还有杨镇邦以及柳亚子的小女儿柳无垢（他们后来又是我清华的同学，其中杨镇邦还是我们物理系的同班同学）。杨和柳“九·一八”后去南京请愿，他们回来之后我埋怨他们走前没有叫我一下。

在20岁前，我还在清华读书一年。在清华认识许多同学是在“一二·九”后的事，在1934年到1935年上半年，我接触到的只是本系本班同学和我住同一宿舍的同学。同班同学有钱三强、陈亚伦、杨龙生（这三位去世了）、谢毓章、杨镇邦、王大珩、何泽慧、戴中扆（改名黄葳）、许孝慰。时间过得很快，到明年我们该纪念大学毕业60周年了。同宿舍的同学有黄冠群，还有一些上共同的课程或者共在系图书室查阅文献的本系比我高一年级和低一年级的同学。

我真想再好好回忆一下，把所有记得起来的同学尽可能回忆出来。

## 3.8 我的表堂兄弟姐妹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每一个都生了好几个子女。不计算夭折的，大舅家8个，二舅家12个，三舅家5个，大姨家8个，我家5个，三姨家6个，加在一起一共44个。我母亲的兄弟姐妹之间手足之情很深，来往得也比较密切。因此我们表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也比较亲近。这里写"总的说来"，那就是说有些因为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的时间长一点，就更密切些，反之就不那么密切。同时44人之间年龄的差异有40年左右，这也使彼此间的关系不一样。

我在自己家里是长子，因此在这许多表兄妹之间我就属于年龄偏大的。44人中我名列第6。比我大10岁的蒋伯琴（我大舅的第一个儿子）和比我大的两个姐姐（也是大舅家的）同我玩不在一起，在这一群孩子中，除了比我大7岁的蒋仲侯（他是我大舅的第二个儿子）和比我大1岁的沈昌汉（我大姨的大儿子）外，我就是最大的了。

1927年我进第三中学，同几个同学出了一个孤本的文艺杂志《白》。那时候蒋仲侯也在北京，没有找到工作，在家闲着。他喜欢图画，就找他画杂志的封面和文中的插图。大家都说他画的那个封面很好。这个孤本的《白》杂志出了二三期之后就停了，而且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

蒋仲侯会画图，凡是在这方面有什么需要就找他。在北京，我们在住的地方放映幻灯——观众就是年龄比较小的表

兄弟姐妹们还有几家的母亲，就请蒋仲侯画了一套连环画，放映出来大家看了很高兴。

他还会刻印章，现在我保存的一枚印章就是他刻的。他的书法、诗词歌赋都可以。那时他 20 岁左右。我这个表兄在三反五反时，受委屈想不开，自杀了。

沈昌汉不喜欢读书，但是喜欢技术，手很巧。我这个人既能同蒋仲侯很合得来，因为我也喜欢文学艺术，也同沈昌汉很合得来，因为我也喜欢自然科学和技术。由于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如他们，就向他们学。大家都是年轻人在一起玩得很起劲。沈昌汉十几岁时就非常聪明，装了许多无线电收音机，卖给想要这种产品的人。他家里经济不困难，但有了这些收益，他就可以买更多的器材做更多的产品。家里的人嫌他不读书，考不上学校，但他还是按照他的性格发展。他是一个发明家的坯子。抗战后他去了美国，据说搞了许多项发明。他在一次车祸中死去，有人说就是别人害他的，不知道他同什么人产生了矛盾。

下面就是比我年轻的表兄弟姐妹了。有几个表妹，加上我自己的妹妹，年纪比我小不了几岁。女孩子们有女孩子那一套，不容易玩在一起。但是我们搞的那些玩意儿她们也还是看，不过我们的忠实观众还是比我们三个大表哥年龄小得多的孩子们。我们在他们中间获得比较大的声誉。聚在一起话当年时，她(他)们都可以讲出我们几个大哥哥是如何哄着她们玩的。

这 44 个人中已经去世了好几个。活着的都已经退下来

了，现在我在年龄上排第一，三舅家的小妹蒋家远，她是最小的（我和一大一小之间相差 22 岁）也已经 58 岁，在本单位退下来了。

上面讲的是我母党方面的。父党方面不叫“表”，叫“堂”。我祖父祖母生了三个男孩，没有女儿。我大伯父家有两个姐姐（我过继给大伯父，不好称堂姐）。我上爱群女子小学就是我二姐带我去的。不过不能同上面说的那些表兄弟姐妹相比。二伯父家有一个堂哥和好几个堂弟妹，但我不论同哪一个哥哥还是年轻的堂弟妹都没有共同的语言，也从不在一起玩。

倒是有一个远房的表弟周国铨是我小时候很好的朋友。多年来他家的房间，同我家的住房只有一墙之隔。他比我小一岁多，我们一起玩，也一起学习。他特别听我的话，我有什么提议他都同意。记得有一次我同他一起去郊区春游，两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走在一条小道上。小道右侧是稻田，左边紧靠着黄埔江的支流龙华江。他骑在前面，我骑在后面。走到一处小道前面有一条小沟，沟上架着一条约半米宽、两米长的石板桥。本来他打算骑车从桥上过去——也完全可以过得去，我也打算跟着他过去。可是他骑到石板跟前，一慌，车就栽进沟里。我在后面想下来，但路太窄，向左边一倒，连车带人摔进龙华江去了。结果他一身泥很狼狈，我穿着棉袍整个跌进水里，而水还相当深，更加狼狈。我和他到郊区不止这一次，这次最惊险也最可笑。

周国铨表弟是我的追随者。我学物理，他也就下决心学物理。我考进清华，第二年他也考进清华，在 20 岁后我参加了民

先，他也参加了民先。北平沦陷那天，我在西直门遇见他，我正出城，他想进城，我要他跟着我，他就跟着我走。走到北平郊区的田村，他和我（还有三个别人）一起被日军拘留。日军把我们释放后，我们一起穿过两军对峙的火线，到琉璃河火车站一起上了火车。快到保定，我告诉他，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我要在保定下车，在保定工作，希望他也下车和我一起工作。这次他没有跟我。结果我下了车，他继续前进，在“八·一三”前夕到上海。1938 年上半年他到武汉，我介绍他入了党。后来他去了西南联大，毕业后又出国深造，成了一位电子工程专家。建国后一直在这种性质的岗位上工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然后离休，三年前因病逝世。

## 3.9　我和弟妹之间

写了同学，写了表、堂兄弟姐妹，似乎也应该把自己和弟妹之间的事情说一说。

20 岁前，我只有两个学期住在清华大学宿舍。在其他所有的学校都是做走读生。这住校的两个学期加上零零碎碎的不在家里住的日子，同弟妹们不在一起住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半。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在 20 岁前是特别亲密的。

我们兄弟姐妹之间非常和睦，不但现在，在儿时就是这样。我是长子，大哥。不过开头我并没有这种“长子意识”。这种意识大概是我 16 岁左右才开始有的。那时我慢慢地大起来了，很懂事了，同时开始半工半读，承担一部分家用。妈妈也有

意抬高我在家里的地位，要我对这个家庭尽更多的责任。我也就逐渐以长子自居，觉得自己的责任同弟妹不那么一样。

因此我和弟妹之间的关系可以分做两段。第一段，还没有这种“长子意识”的我和弟妹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小孩子和小孩子之间的关系，同他(她)们一起生活、一起玩耍。不同的是我后面的两个妹妹，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容易玩在一起，而我的弟弟比我小十四五岁也不容易玩在一起。第二段，我就有意识地去做帮助弟妹关心弟妹的事情。这时候我就有应该陪陪他(她)们玩、让他(她)们过得高兴的思想和行为。

由于弟妹们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在玩的方面采取的方法也不同。对最小的弟弟就要采取哄的办法。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我想出了这样一个诡计来骗我弟弟：把一张方凳子翻过来，四脚朝上，让最小的弟弟站在翻过来的凳子里，然后把他的眼睛用布蒙起来，说这张凳子会升高，接着我和妹妹两个人各拿两条凳子腿，摇摇晃晃地慢慢上升，说凳子自己升起来了。一边不断地摇晃一边不断地说升得多高多高，最后用一块木板放在他的头顶上轻轻碰他的头顶，说凳子已经升上了天花板。然后又摇摇晃晃，说凳子下降，最后落地，把手巾打开，弟弟小，信以为真。最后“揭穿西洋镜”，大家很开心。

我这个兄长关心弟妹们的成长，对品德教育更是关心。上海顾家弄55号的环境很复杂，各色各样的腐化现象，弟妹们也是会看到听到一些的。我就经常有意在他们面前对各种现象进行批判。他们的发展证明没有受到环境不良的影响，不知道我的这种关心是否起了作用。

我倒没有摆出兄长的架势去管教他们。我们家里从来没有谁管教谁这一说。我父亲对家里的人是不闻不问的，母亲有时对一些看不惯的也只是说几句，从不训斥孩子。我当然更是如此。一次我发现妹妹从外面借来的一本书（因没有藏好被我看见了），我认为她不应该看这样的书，我采取的办法是把这本书偷了。我发现她找书，找得满头大汗。我想她会感到很难办，但只在一边装着不知道，让她受到某种教育。我偷书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她，以后也没有告诉她，也许她至今还不知道这样一件事哩。就连看这本书这件事，我估计她也早已忘得精光了。

我给他们讲的话很少，连故事也没有讲几次，没有谈过什么心，大家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心”要谈。许多年我和弟妹们就这么一起生活过来了。

1937 年 2、3 月，我从上海去北平，一直到 1949 年 12 月，这期间没有同弟妹们见面。重见时都长大了，各有一番经历。在这之后，我和弟妹之间的事就不是这本书里写的内容了。

# 4 “心理学资料”

## 4.1 最早的记忆

我写20岁前主要是靠回忆,但也不能完全靠回忆。比如谁也不会回忆出自己初生时的事情。初生儿不可能有什么自我意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托夫》,一开始描写他的主角,"初生的婴儿在摇篮里扭动。……孩子醒过来,哭了。惊慌的眼睛在那儿乱转。多可怕啊,无边的黑暗,剧烈的灯光,浑沌初凿的头脑里的幻觉,包围着他的那个闷人的、蠕动的黑夜,还有那深不可测的阴影中,好似耀眼的光线一般迸出来的光线的刺激,痛苦和幽灵——使他莫名其妙的那些巨大的脸正对着他,眼睛正对着他,直透到他心里的……他没有气力叫喊,吓得不能动弹,睁着眼睛,张着嘴,只有喉咙里喘气。……"这完全是文学家虚拟的描写,初生儿是不会有那样的心理活动的。就是婴儿以后渐渐长大了,心理活动发展起来了,自己也不能意识

到。就是儿童，更长大了些，到了有比较明晰意识的程度，他还不能在一个人的头脑中长期留下印象，不能成为记忆。儿时的心理活动，虽然因为会对一个人的智力、性格、气质发生作用而在人的脑子留下痕迹，但大都不在本人的记忆之中。儿时的许多情况大都是父母或者别人事后告知的。

不过写《20岁前》我还是想多根据些自己的记忆。

我的最早的记忆是什么？那时我多大？这个问题许许多多年之前，我学心理学时就向自己提出来了，而且曾经认真地回忆了一阵子。那时我作这种回忆，倒并不是为了写回忆文章，而是出于研究儿童心理学的兴趣。我先考虑了一个儿童的回忆能够达到多远（一天前、一周前、一月前、一年前）。这个时间肯定是他年龄的函数：年龄越大能够回忆越远的事情。接着就考虑一个成年人他的回忆最早能到什么时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还向不少人做过调查，许多人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准备，直到现在我还只是自己去回忆。

回忆的结果是我满3岁前自己有两个最早的记忆。

第一个记忆的对象不是人、不是物、不是景、不是情节，而是模模糊糊的一种气氛、一种环境。这种气氛或环境，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开阔的空间、新鲜的空气、绿色、明亮而宁静的世界……这是第一个直接的记忆。后来有一回母亲说起，我诞生四个月后，她就从上海把我带来北京，住在霞公府（现在叫霞光街，北京饭店的后边），家里雇了个老妈子。李妈常带我到从南河沿口到南池子口那一段皇城下的树林里玩耍。妈妈那么一说，我就马上认定我记忆中的那个环境就是那里，我记忆

中的那种气氛就是在那儿玩耍时感受到的。那时我大概已经满两岁，即 1917 年的某个月(这是推算出来的)。现在那段皇城还在。皇城下也还有树。不过现在的东西长安街车水马龙，决不会给我留下上面说的那种记忆了。不过我走到那里，常常引起那种回想。

第二个记忆是在 1918 年，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满 3 岁，全家从北京回上海。回到上海的家，还没有上楼(楼上是我家的住房)，先到了楼下客厅。这个客厅的一个角落，上面是两扇窗户，下面有一截墙壁。在 1937 年初我最后离开这个家不再到过这个客厅之前，那两扇窗户，那截墙壁一直原封不动地在那里。客堂里的这一个角落在我印象中留下来了。在这个记忆中似乎有了物，但肯定没有人。总的说来仍然是一种环境、一种气氛。这是一种黑暗狭窄的感觉。这大概与我上面说的那个回忆成了一个对比。后来还是妈妈告诉我，那天我一进上海家门，到了客厅，就用北京话(当时我只会说北京话)大声叫喊“我不要这黑屋子!”。我听了，也马上同我那个记忆联系起来，相信我回忆中的那种黑暗狭窄的印象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

这两件事相隔不到一年。

这最早的回忆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想过，也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把这最早的记忆问题的研究留给儿童心理学家来研究吧。依我所知，现在儿童心理学中对婴儿心理学的研究是很少的。研究婴儿心理的方法恐怕同研究动物心理学类似，更多地从婴儿的行为中来捉摸其心理活动或者通过实验来观察婴儿的心理反应。婴儿心理的研究完全不能靠本人

长大后的回忆。也许研究年龄稍大一些儿童时，可以通过要他去回忆的办法来搜集一些研究心理的资料。

说一句感想性质的话：20 岁前我在北京、上海两个地方生活，接触的是这两个地方的文化。我对两个地方的感受也许从我最早的记忆中就开始了。

## 4.2 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我也思考过本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问题。初生儿当然不可能有自我意识。当小孩子嘴里能说出“我”这个声音而且理解它的意义的时候，应该肯定他已经有了自我意识。我想和心理学家及婴儿的家长取得联系，建议他们观察和记录第一个“我”字，儿童是几岁几个月在什么情况下说出口的。我想儿童的自我意识会比说出“我”这个时候还早一些，嘴里说出“我”这个字应该认为是自我意识发展到了更高一点的一个阶段。在这之后如何观察自我意识的觉醒，应该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现在我完全说不上来。对我本人的儿童时期来说，当时我的父母没有对我进行过观察。当时我也是个小孩，根本不可能自己对自己进行观察和研究。因此想要得到答案就只能寄希望于当前的心理学家和当前的父母对现在的儿童去做这种研究了。坦率地说，我甚至认为不是先有了自我意识才能学会说“我”，而是在说“我”的过程中逐渐产生自我意识。看来自我意识有一个萌芽、发展，明晰度和强度逐渐提高的问题。在研究一个人自我意识问题时要把这个量的方面的因素也考虑在

内。

一个儿童开始有了自我意识，和他长大了之后能够回忆出自己何时何地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不是一回事。我能回忆出我 4 岁时在清心幼稚园惹的祸，那次肯定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

那一天我因为“好玩”钻到餐桌下面，然后站起来，把同在幼稚园里吃饭的小朋友们的饭菜掀到地上，感到闯了祸，于是在楼梯底下的储藏室里躲藏起来。我听出许多人因为找不到我而着急。这时候我的确有一种“我”是很重要的、大家缺不了我的意识。不过，应该说我是因为闯祸害怕受责罚而躲起来的。我想那时有了“我”的意识。“我”的觉醒肯定比那天要早得多。这只是我回忆得出的一件已经有了“自我意识”的事情罢了。

再就是做一个“英雄”的意识在我身上也发展得比较早。这是不断受到鼓励产生的。端午喝黄连汤，母亲给我“做工作”：有出息的小孩子是不怕吃苦的，我就以能吃这苦水为骄傲。吃了一大口就觉得它也只有那么一点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咕嘟咕嘟地把一大碗喝了下去，妈妈和周围的人表扬我，我就很得意。这时候也一定有明晰的自我意识，否则我怎么对这件事记得这么牢呢？这种英雄意识当然是高级得多的“自我意识”了。

我能再回忆出一些关于自己个人奋斗目标的自我意识的事情。我父亲不知道多少次对我讲长大要成为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他并没有按照“立志做大事，不是做大官”的思想来要求

我，而是启发我将来做大官、做“大总统”。当然他也并没有真的希望我做大总统，我也没有想过当什么大总统，那时候我也不知大总统是怎么样一种人。再长大一点我才在一本书里看到不知道哪一个大总统的照片：戴着很高的帽子，帽子上有穗子，衣服上披着那时不知道叫什么（现在知道叫做“绶带”）的带子。大总统的样子一点也不好看。我更不想去做那样的人，穿戴那样的衣服和帽子。不过这个“长大了要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肯定促使我的自我意识有了发展。我父亲这样启发我，大概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还属于儿童心理的范围。

以后我真的有了想当一个像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的意识，那是大了一些之后，看了一些介绍科学家的传记的书和文章之后明确起来的。那时我已经知道这些大科学家是怎样的人，觉得不难做到。这种自我意识的发展也促使我自我奋斗意识的发展。有这种意识时，我的年龄已经到十四五岁了。在这之前，我喜欢小说，但没有想成为小说家，我喜欢谈哲学，但没有想成为哲学家。我倒是曾经想成为“武侠”。这是我曾在小学毕业前后，受到武侠小说的影响产生的念头。

在自我意识的发展中，也包括“本人”为“别个”（他人）服务的自我意识。我从小受到父亲、特别是母亲的影响，也许还带有人的天性，所以这种意识在儿童时代就有了。至于出现这种自我意识同政治相联系的时间，那就更迟了，已不再属于儿童心理的范围。

## 4.3 个性的形成

回忆我20岁前的经历，也是对自己个性形成的一番思考。

思考的结果，我的个性中有许多特征应该说是20岁前就形成了的。个性是个人稳定的心理特征。但这种稳定不是绝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我已经快80岁了。从20岁到80岁，60年的时间不短，个性的变化不会少。这一点我在接着回忆自己20岁后的经历时还要继续去想。现在初步思索的结果是：最早的20岁中形成的个性是今天自己个性现状的基础。在20岁以后的60年中，在我身上，个性的变化不算特别大。没有人说过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自己觉得也是如此。

普通心理学的书里讲，个性包括气质、性格、兴趣、能力等等。现在我想分别从这四个方面来写。

首先说说气质。我一直不属于"内向型"的人。我好动，喜欢社交，关心外在世界，关心人，我对人对事都热心，属于热情奔放和外露的那种人。只是我也喜欢思考，包括对自己的反思。我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不是不关心的，这些气质从20岁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变。

其次说说性格。我是刚强的、敢作敢为的，而不是懦弱、优柔寡断、畏首畏尾。我不怕困难，有种迎着困难上的坚毅的精神。我有一股韧劲，意志力比较强，想达到的目标不轻易放弃，不愿半途而废。我不怕吃苦，不论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都这

样。我的行动性比较强，不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我积极行动，而且勤快——脑勤、手勤、口勤、笔勤，不是个懒汉。我有比较强的独立精神，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愿依赖别人。这样一些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20 岁时基本形成，以后也只在数量上程度上有发展，并没有向相反方向演变。

至于兴趣，变化比较大，但并不是过去发生过兴趣的现在就索然无味，只是兴趣比以前更广泛了，兴趣的集中点也有了变化。比如 20 岁前，包括 20 岁后的一两年中，我很想当一个物理学家、数学家。后来我不得不放弃这样的奋斗目标，但是应该说我对这两门学问的兴趣还是很高的。当然兴趣同自己的能力有关，比如音乐、绘画、体育方面我实在太低能了，兴趣也就提不高。我的能力主要在思考和研究问题方面，我的兴趣也就主要在这个方面，而且一直保持到现在。

能力的变化当然最大。在能力方面，属于个性的有在动脑方面见长，动手方面明显不行。逻辑思维能力强，“形象思维”明显不行。小时我父亲说我“大脑发达，小脑差劲”，后来有了比较多的生理知识之后，觉得也应该承认两半球的左半球发达，右半球差劲。操作方面的弱点现在甚至不如 20 岁的时候。我常讲四句自嘲的话：“唱歌沙沙的（嗓音太差），打羽毛球夸夸的（老打在拍子边上），游泳哗啦啦的（只出声音不前进），跳舞阿呀阿呀的（对方女同志的脚被我踩了）。”我还想把打网球的话续下去，可是因为这四句写的都是声音，而我打网球时球拍根本就没有碰到球。我打的是有来无去的“无声网球”。体育、艺术方面怎么学也学不出“能力”来。

20岁时在人格方面的这些心理特征同我这个时期的经历和受到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举不怕吃苦这一点为例。我是在贫困的家庭中长大的，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这就使我在生活上不怕吃苦。在教育方面，我从小就接受了以能吃苦为荣的教育。举一个小事作例子。我们上海老户，有一个说法，在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如果喝了黄连汤，一夏天可以不生疖子。家里大人要我们小孩喝黄连汤时，就对我们说，黄连这种药很苦，告诉我"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成语。然后讲，你们谁不怕苦，谁就勇敢。于是我就咕嘟咕嘟一口气将一大碗黄连汤喝下去，而且连眉头也不皱一皱(如果大人说这黄连并不苦，我也许就不喝了)。喝黄连水的事不止一次。在没有喝以前，我就听说很苦，喝了一碗之后，我反而有了一种认识，说苦也就只是这么一回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如此而已。以后遇到吃苦的事情常常有这种体会。

再举坚毅、不怕困难为例。我7岁开始自学，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有了不怕困难的体会。以后我半工半读，终于学完大学，也使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的家常常穷得揭不开锅，母亲为此愁得不得了，不论是我个人或者我的家，都克服了不少困难。闯过一道又一道的关，自己的信心也就一次一次地提高。

不妨再举一个独立精神为例。我学习不依赖学校，高中以后上学，生活上不依赖家庭。这也受到我父亲不愿求人的影响。我很不喜欢去求有权有势有钱的人，看人家的脸色。我从

来相信，经过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把想办的事情办成。

我不幻想，敢面对现实。我们家有个习惯——别的家也都这样，春节大年初一，早晨起来煮一锅红枣年糕汤，吃的时候妈妈说“今年吉星高(糕)照(枣)”，我就偏偏把这话颠倒过来说“今年一定还糟(枣)糕”，急得母亲用手纸擦我的嘴，说你说的不是话，而是放屁，是不作数的。我开这种玩笑很高兴。我知道家境是不会一下子好起来的，于是我就在精神上做好这种准备。

我对自己的这些性格怎么样形成的还要作进一步思考和分析。

对了，又想起一点，我最痛苦的是屈服，这也是我性格中重要的一条。我自己不愿屈服，看到一切善良的人屈服或者我们的民族受到屈辱，就会难以忍受。我有一个毛病，在生气的时候不能很好地听从理智的支配，有时就会爆发，冲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去行动。这与我受到的教育、读的书、看的小说有关。对弱者我很同情，我希望一切弱者起来斗争。看到反映真实情况写弱者不得不屈服的小说，常常看到一半就把书合上了。而武侠小说使我发生兴趣的原因有一条，那就是侠士们依靠自己的武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那个鸟气。

# 5 环 境

## 5.1 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的父亲叫郁礽培，号隽操，1890 年(光绪十六年)3 月生。他儿童和少年时的情况，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他年轻时进的什么学校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准是读《论语》、《孟子》之类教材的私塾。但他毕竟是满清末年的人，秀才举人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在他稍微大一些的时候，我的祖母要他学生意，他坚决不愿意，要进洋学堂。我家世代经商，不知道有怎样的具体原因和具体过程使他坚决有这种主意，估计是受到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至于怎么会受到这种影响，我就不得而知。他的愿望在家中得不到支持，只有他的瑞贞姑母同情他，替他说了好话，他才进成学堂。因此我父亲对她非常感恩，每到我姑母生日和忌日，都不会忘记把她的喜像取出来上供，恭恭敬敬磕头，也要我们小孩子磕头，而且给我们多次

讲到他姑母支持他上学的事情。

他进的学堂是上海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后改为上海兵工专门学校)。他毕业的时间是 1909 年(清宣统元年),那时他 19 岁。他在上海兵工专门学校,我估计大约学了四五年。这是从他所学的课程推算出来的。他学过的书我想我大都看过。他保存的数学书有: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学弹道总应该学点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知识,但是他保存的书里没有这两门数学的书。他在进兵工专门学校前一定不会英文,是在这兵工专门学校里从 A、B、C 学起的。毕业时他的英语水平也还可以。此外还学了物理学,那时叫"格致",还学了化学和博物学。他学过关于枪炮的制造、弹道原理、制图等。这方面的书他的藏书中也有,但我只翻了一下,没有去看。这些东西实在引不起我的兴趣。他学过的那些课程今天看来都是很简单的,并且教材编得都很笨拙。各种教材,包括数学教材都是竖着印的。我见到的他在学校学的数学书都没有用拉丁字母,即不用大写或小写的 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有的数学书连阿拉伯数码也没用。看来这个学校的程度恐怕连今天的中专也比不上,不过在那个时候是很有点水平了。在藏书中看不出文史方面他是怎么学的。《四书》是有的,《五经》就不全了,只有一部《诗经》、一部《春秋(左传)》,没有《易经》、《书经》、《礼记》。诸子百家除几部儒家的经典外,其他各家的书一种也没有。历史方面,二十四史一种也没有,只有一本《纲鉴易知录》。文学著作中没有《离骚》,连《文选》也没有,只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绝妙好词》。他的"国学"看来没有什么底子。

当然文言文还是写得很通顺的。在他的书柜中没有一本学写“八股”文的书。看来他那时不再学写“八股”文了。除了这些课本外，当然就是他的“课外读物”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这样的小说，《西厢》这本元曲，《再生缘》、《珍珠塔》这样的唱本弹词之类的书也是有的，而且不少。但是他从来不写什么诗、词、歌、赋之类的东西。他完全是一个学技术的人。从他看过的书来看，在社会科学方面看过进化论，书柜里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其中政治性较强的书，柜子里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有醒狮派（国家主义派）的一些出版物，也有何海鸣写的无政府主义的书。在思想上他倒一直是主张共和反对君主的。我对他书柜里的书特别熟悉，他的藏书成为我了解他读书生活的主要途径。

他上的这个学校存在的时间似乎并不长，因为从没有听他说过比他早些毕业的同学，比他低年级的同学可能有，不过也没有听他说起任何一个这样的人，也许也没有。即便有，赶上辛亥革命了，不会再有毕业生。我看过他的毕业证书，上面写着授予少校（制械协军校）军衔，是满清政府的陆军部授予的。他的年级分两班，他考进这个学堂时入的是化学班，后改机器班，学的是枪炮制造。化学班学的是火药制造。同年级化学班同学中倒是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那就是参加创办天厨味精厂和天原化工厂的吴蕴初。他是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家。不过父亲和吴蕴初从不来往。父亲给我讲过吴蕴初发家的历史，使我对这件事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他讲的故事一直是我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知识中的一个部分。我还听父亲讲，

有名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家严独鹤也是他的同年级同学，不过对这我记不很准确了。同他有来往的同学只有一个“刘先生”，他同我父亲一样，是个没有什么地位的“知识分子”，我多次见过这位刘先生。

在我父亲毕业后，清朝政府本来是准备把他们这班毕业生培养成军火制造专家的，打算很快就派往英国去深造。宣统元年，我父亲暂时留在学校担任图书馆资料员，等候出国。1911 年的辛亥革命使他的这个前程不能实现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对辛亥革命有什么不满的言论，他是一直积极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

1913 年他 23 岁时和我母亲结婚，媒人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堂兄蒋文梅。婚礼是新式的，在上海文庙明伦堂举行，还拍了结婚照片。

我母亲叫蒋文英，也有一个号华若。她比我父亲小一岁多，1892 年(光绪十八年)2 月生，是常州戚墅堰人。童年时有较多时间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庄横林——她的外婆家。我外祖父是个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上世纪末在天津呆过一段时间。1900 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全家从天津逃回常州，以后再没有去北方。1900 年船泊大沽口时的那一天，正遇上联军炮轰大沽口炮台，我母亲和她的哥哥姐姐随外祖父就在这个炮台下面海边的一条船上。大沽口炮战的声音在船上听得清清楚楚。全家在船上害怕流弹打来。不过那时我妈妈才 8 岁，记得不那么清楚，而比她大 10 岁的哥哥在他 90 岁生日那天绘声绘色地对我讲他们那时在船上的情景。

我母亲没有正式上过私塾，后来戚墅堰横林有了洋学堂，她就进了洋学堂，虽然只读了一年书，却一直保存了一张成绩单，有语文、算术、自然常识，还有英文等六七门课，各门成绩都是优。不过没有再学下去。她能读些书，唐诗三百首读得蛮熟，看书报写信也可以，她的思想也是比较开通的。嫁到上海和一个上过洋学堂的人结婚，我母亲是很高兴的。婚后我母亲就住在上海属于我父亲自己产业的房子里。我们郁家是上海的望族，有明显的大家庭残余。但是到我生下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大家庭已经瓦解了。我的两个伯父早就分家过着小家庭的生活。我父亲结婚以后和我母亲也就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我的祖父早已去世，我没有见过。我只见到过我的祖母。关于我的祖母，我打算专门对她写一段。她由我父亲兄弟三个来赡养，三个媳妇去伺候她。

我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第三年，1915 年 7 月，我在上海诞生，家里就有了我。那时我父亲在北京任职。我满月时只有妈妈、祖母、二伯父抱着我拍的照片，而没有父亲抱我的照片。1915 年 9 月我妈妈带我去北京时，父亲才第一次见到我。1917 年 2 月有了我的第一个妹妹郁鍾馥(后来她是一个京剧爱好者和研究者，在上海一个出版社工作)。她是在北京诞生的。她诞生时我父亲去了河南，也没有在北京家里。1919 年生了我的第二个妹妹，过了两年夭折了。1921 年生了我第三个妹妹，又夭折了。1923 年生了我第四个妹妹郁鍾媛。后来她去新四军工作时改名黎汶，建国后一直在部队系统工作。1927

年生了我第一个弟弟，也只活了二三年。我的第二个弟弟郁鍾德是1929年在北京诞生的。以后长期在上海的高桥化工厂工作。又过了三年有了我第五个妹妹郁鍾娥。她在上海诞生。在上海一家工厂里长期工作。五年后生了我第三个弟弟，也没有长大。我父亲和母亲共生了九个孩子，长大的有五个。时间过得真快，我20岁前时，他(她)们也还都是青少年，可是现在已经全部离休退休了。

我父母亲的家庭是很和睦的。家庭中发生过的大事有两件。一件是我的两个妹妹、两个弟弟的夭折，这给全家、也给我带来了多次很大的悲痛。我的第二个妹妹在两岁时患了一次急惊风。我祖母硬做主，请了一个江湖医生去给她“挑针”(即用一根针扎到身体里去乱挑)，结果挑断了脖子里的一条筋，高烧是退下去了，可是她的脖子再也直不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死了。这是我父母第一次失去自己的孩子。为此他们都十分悲痛。我父亲不知从哪里找出一种专治小儿惊风的中药方子，按照这个处方制成了丸药，定做了一批丸药盒子，印出丸药的说明书，把我的这个脖子直不起来的、死去的妹妹的遗照作为商标，想送人或者出卖。后来连送都送不出去，更不要说卖了。谁愿意去要用死孩子的照片作商标的药品？我的这个妹妹死后，我母亲则下决心去学习“小儿推拿”。后来她倒治好了不少别人家的孩子。可是后来我另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病了，自己的孩子她不敢治，死去了。其实他(她)们生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小儿疾病，白喉、肺炎、猩红热之类，却都治不好。这样的事一连好多次，给家庭的打击当然是很严重的。我的第

二个妹妹死时我才五六岁，她的模样我记不得了，可是我第三个妹妹和第一个弟弟的形象至今记得很清楚。前些日子还在一起玩，没有多久忽然不在了，这使我很长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还有一件“大事”是经济上的困难。我家有一点祖产，那就是顾家弄那座宅子，有一亩多地。但是有好几房有份，分到我父亲名下的只有1/6。有这点房地产可以典押出去，但要在万不得已时才能这样做(到后来果真这么做了)。有了自己的房子，居住当然可以不用花房租，而且还可以收一点房租。但归我父母这一房所收的房租每月大约只有十多元。我们家的生活要靠我父亲的薪金来维持。一个家庭每月总要几十元的支出。后来小孩子多起来了，物价上涨，开支就更多了。还有家里小孩子一个一个生病，一个一个夭折，也花了不少钱。如果我父亲有薪金收入还能勉强维持，可是我父亲一生的一个特点便是一次一次地失业和长期失业。因此我家里的经济，几十年来一直处在困难的境地。

关于我父亲的职业，最初几年的情况上面已经讲过：毕业后暂时在本校的图书馆呆了两年，袁世凯当政后在北洋政府的陆军部谋到了一个“差遣员”的挂名差使。1914年结婚后不到一个月就去北京任职。去时把我祖母也带到北京逛了一趟。因为这差使是挂名的，没有实事给他做，也没有正式的薪俸。在北京呆了几个月之后，就回上海呆了一年多。休息了半年之后，在一个小学做了半年校长。1915年又去北京，谋到一个全国兵工厂事务处建设股股员的实职。这些差使都是通过袁世凯下面的唐在礼的路子谋到的。唐在礼是郁家的亲戚，他是后

来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十三太保之一。我父亲在北京工作到1916年，就被派到河南巩县兵工厂工作，在那个厂做会计科长。1914年起的这一段，是我父亲连续有职业最长的一段时间，有四五年之久。也是我家经济生活最稳定的四五年。1918年我父亲在巩县骑马从马上摔下来受惊了，精神失常，不能再在工厂工作，也不能回北京陆军部。在北京家里休息了短时期后，他去南京协和书局工作，也还是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呆下去，要回上海休养。1918年全家回上海。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失业，或者叫“赋闲”。他的精神病并不很重，就是老是心情很紧张，老说自己是会计科长，离职时没有把帐本向后任交代清楚，自己有错。又说自己是个官，就这么回了老家，是个“逃官”，怕有人来追究。尽管大家向他解释不存在这个问题，可是他老是犯嘀咕。

从1918年到1926年八年时间里，我父亲只在几个很短的时间内有职业。先是在上海招商公学河南开封军政部兵工署驻汴材料管理处，后来在上海浦东一个姓盛的家里做家庭教师等。由于时间都很短，这一段工作的情况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另外1924—1925年在马玉山办的制糖厂当职员。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和冠生园的糖果饼干公司的产品是当时的名牌。马玉山公司决定办一个制糖厂。有人说，这个糖厂是中国第一个糖厂，这个说法是否成立我不知道。但是我父亲到那里工作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还到蕴草浜那个工厂参观过。那个厂制造的是精白糖，所用的原料不是甘蔗，也不是糖萝卜，而是收购来的粗糖，然后用骨炭把溶解了的粗糖水过滤，再蒸

发、结晶，就得成品。对这一生产过程，现在我还说得出一些来。这大概与在小学学了点化学知识有关。我大舅先去那个厂工作，我父亲的工作，是我大舅舅的关系介绍去的。我三舅也在那个厂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厂未能长期办下去。没有多久我父亲又失业回家了。从 1918 年到 1926 年这 8 年中，父亲绝大部分时间没有职业，于是老想在家制造些什么产品出卖。家中不可能制造机械，他学得的一些机械知识不顶用，只能利用自己一点化学知识来生产商品。他制造的第一个产品是蓝黑墨水。当时上海有一种“民生牌”蓝黑墨水，很畅销。我父亲认为他制造的会比这种墨水好。他进行了两个月的试制工作，用各种不同的染料和配料去做，靛青、五倍子是主要原料。我看他做的墨水质量的确不错，写下来的时候是蓝色的，过了一段时间就变成黑色了。他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墨水的牌子定为“民富”，有意同“民生”竞争。但是包装太差，那时还没有电木或塑料的盖子，他就用软木塞，再找木工车了许多圆木片，用胶水把这木片和软木塞胶在一起当瓶盖。这种瓶盖稍一拧，木片就掉了。我记不清“民生”牌墨水用的是什么盖子，但是肯定比“民富”牌墨水好得多，没有这种问题。再加上他不会经商，这种“民富牌”的墨水经营失败了。在这之后，他还搞这搞那，比如收集照相馆的底版来提炼白银，比如把人的头发加以处理制造装饰用的条带等等。这些事都还没有达到有产品可以生产出来的程度就放弃了。这个时期他还有种想做事的劲头，虽然一件一件事都失败了。

我慢慢地大起来了。到了 10 岁，对家庭的事逐渐懂得关

心了。我毕竟是家中的长子。我观察到父亲常常处在“沉思”的状态。他有一个手指甲有毛病，他老是望着这只手指甲，一声不响，可以半小时、一小时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它。妈妈认为这是他精神病犯了的一个表现。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把父亲的那只手打开，父亲也就常常一笑，中断了这种“沉思”。这样的事经常发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发生了怀疑，是不是他在想心事。我观察到我父亲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他没有工作，不能为家庭一家大小出点力，心里存在内疚。但是他采取逃避的办法，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妈妈有时同他商量家里的事，他从来不发表意见。那时妈妈看我年纪小，也不同我商量什么，于是她也只有自己在想心事。我看出父亲母亲都在想心事。不过母亲同父亲性格不一样，她办事很有能力，也善于同各式各样的人交往，受到周围的人尊重。人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家庭是她支撑着的。

1926 年我父亲失业或基本失业 8 年之后，总算又谋到了职业。我的姨夫沈家桢(号“维周”)，原先是我父亲在北京陆军部工作时的同事，1918 年父亲回上海，我们家同他们家就没有来往。1925 年得到他的消息：他和我父亲分手以后去沈阳，投奔了奉军，几年之后当上了少将军官。1925 年后张作霖势力到了关内，他也到了关内。有一回他到了徐州，我母亲知道消息之后要去找他，为父亲找个差使。我父亲不乐意，不愿意去求人。我母亲好说歹说把他动员了去，并且说不要他说任何一句话。大概父亲想想家里经济实在困难，也就同意了。于是全家都到了徐州。在徐州，沈维周答应一定帮忙。第二年，也

就是1926年，沈维周当了京绥铁路局长，给我父亲安排了一个文书科科员。我父亲一个人去北京上任了。他上任是很勉强的。一是因为他觉得靠群带关系找的工作很不光彩。同时他和沈家桢在民国初年一起工作时职位差不多，现在沈家桢是局长，而他只是一个文书科科员，父亲觉得别扭，不过这个科员的工作还是做下来了。过了几个月，要我妈妈去北京安家。妈妈去了，我也跟着去了。我们在西四兵马司租了一个小院安了家。我家搬到北京的时间是1927年初。

1927年暑期后，北京还是张作霖的势力。到了1928年，政局有了变动：张作霖的势力撤回关外，国民党的势力到了北平。沈维周是奉军中的“少帅派”，是郭松龄的部下。郭那时受到杨宇霆的打击，而且被处死了。这就是东北军中的保守派战胜了少壮派。沈维周失去了靠山，自己也遇到了困难，京绥铁路局长做不下去了，也回不了沈阳，就留在北平。他介绍到京绥路局去的人，倒是没有因为他的去职被解职。我的三舅也是他介绍进铁路局的，分配到包头做工程师，一直干了几十年。可是我父亲在北京路局里听了几句闲话，一生气，二话没说就辞职回家了。我记得很清楚这样的一个场面：有一天到了上班的时间，父亲在家里呆着没有要去上班的样子，只是一声不响，坐着不动。开头妈妈不敢问，后来实在忍不住了，问了一句：“你今天什么时候上班？”他就一拍桌子，说：“这个工作不是人干的，我辞职了。”类似这样的场面，我记得见到过不止这一次。

不过这一次他失业的时间不算太长，赋闲了不到一年。沈

维周做上了北平电话局局长，给他安排了一个办事员职务。办事员比科员又低了一级，薪水也少了二三十元。后来电话局的工作又做不下去了，原因现在我说不清楚，大概是沈维周不能当局长，他就跟着下来了。

在他第二次待业的时间里，我母亲在唐在礼家里听说唐在礼的堂弟做了南京市土地局长，就托人去为父亲谋差事。到1930年4月，我父亲就去南京做了土地局征收股股长。地位提高了些，薪水也增加了些。我父亲一个人去了南京，母亲和弟妹们也就先回到上海，做搬到南京去的准备。后来家里似乎不打算搬去南京了，让父亲一个人在南京。1931年有一天，我父亲突然辞去了南京市土地局的职务，回到上海。原来这个亲戚之所以去当土地局局长，为的是担任这个职务可以捞到大钱。修筑马路就要征收土地，在征收土地中有的人会因此受到很大损失，比方说土地被征收了，房子被拆掉了。有的人却可以得到很大的效益，本来不临街的房子，变成临街的房子。所以都愿意到土地局行贿，希望在修马路的路线上能够有利于他自己。而在这方面，土地局征收股股长是可以做手脚的。这个局长之所以用我父亲做征收股股长，是因为我父亲毕竟和他有一点亲戚关系，同时我父亲为人老实这一点在亲戚中是出名的。他以为可以同我父亲默契配合。最初我父亲不知道这种底细，后来慢慢地懂了，觉得这样的事他干不了，也不愿意干，想走。局长看到我父亲这种情况，也就不想留他。于是父亲就写了辞职申请，把乌纱帽一掷回到家里。

这次我父亲辞职回家，我们全家都同情他，认为他的辞职

是对的。我母亲一句埋怨我父亲的话都没有说，反而安慰他说，职业总是可以找到的。可是事实上一直也找不到职业。

1931年我父亲不到42岁，应该说还是很年轻的人，可是找职业的路子基本都没有了。这同第一次长期失业情况不一样，他已经丧失了信心，他的心情更不好了。这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困难。能够拿出去典当的东西都在当铺里。借了钱也还不了，这样就再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们。父亲看到这种困难又没有办法，就更怕妈妈诉苦。妈妈虽然忍着，但是有时免不了说几句牢骚话。父亲怕看到家里困难的情况和听妈妈的牢骚，采取的办法便是躲开。一清早出去，吃饭时才回来。下午有时也出去。父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在外面也只是花几个铜板，在茶馆里一坐听听说书。从南京回上海后，心情不好，既没有工作，也不想学习。妈妈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希望爸爸努力上进，学点本事，靠本事吃饭。我的几个舅舅全没有在大学读过书，都是靠自己学习了工程技术，都当了工程师，职业比较稳定。母亲希望我父亲也走这条路。她认为我父亲上过洋学堂，人也很聪明，还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可是父亲几次失业之后很灰心，认为自己即便掌握一门技术，找事还要求人，还要受气。他不与妈妈争论，但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的意思，还是成天到外面喝茶，听说书，逃避现实。有一次他在家吃饭，妈妈实在弄不到钱，家里揭不开锅，便唠叨了几句，父亲发急了，“好！好！你们要我贪污，那我就去贪污！”我母亲说：“不是，我们不要你贪污，要你学点本事。”他不愿意去学什么本事，认为学到本事也找不到职业。

赋闲了许多年，又不学习，他也的确变成没有什么本事的人了。1932年最后一个学期，私立上海中学有一个高三物理学教师不知道什么原因临时不能去上课了，他们找到我父亲做代课教员。我父亲看了看学校的教材，他知道教不了，可是家里又舍不得丢掉这个挣钱的机会，他就先答应了下来，然后称病，请我这个自己还在高中读书的儿子去作他的代课教员，高三学生教高三学生。我把教这几个月的课担当下来了。这件事既使他高兴，认为我有本事，但也因为自己不行而使他泄气。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伯父受到他亲家的启发，动了一个办化学工业社的念头。他缺乏资金，就想把我们家的房地产和他的房地产一起拿出去抵押。因此就和我父亲商量合资去办工厂，赢利两家分红。这个工业社的名称叫重心化学工业社，是我父亲起的名称。我伯父答应除了分红以外，还给我父亲一个技师的名义，一个月60块钱。其实这是自己赚自己的钱。这种做化学试验的工作，如果在20年代，我父亲还是有兴趣的，可是现在这个重心化学工业社技师的工作则完全由我去做，他问也不问，看也不看，只担任了一个名义。对这个工作他再也没有什么兴趣。重心化学工业社办起来之后，他还是成天闲着。有时候他胡思乱想，比如说，他想地球上这个世界太糟糕了，要到月球上开辟新世界，就动一个在地球上大量制造空气的想法，他想把月球放到空气圈里头来，然后人就可以坐飞机、飞船到月亮上去了。为此，他做了许多计算。他把这种事情作为他精神上的寄托。我告诉他这是做不到的。可是当时在上海的英国人办的一张英文报叫《大陆报》，却把他的文章

的英文翻译稿(不知道他求什么人翻译的)登出来了。他很起劲地给我说:"你说不行,可是外国人办的报纸都给登出来了!"这是一件他很得意的事情。我不想再打击他,我知道这是他在寻求安慰,只觉得他太可怜了。这一段时间我家里经济非常困难,我在私立大同附中上学,半年要交 60 块钱学费,也是家里一大负担,我就去找职业,半工半读,贴补家用。这样家里的困难的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是 40 岁多一点的人一直呆在家里,的确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事。

在我 1932 年进大学之后,我每月贴补一部分给家里用。我的收入成了家庭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妈妈也不再指望父亲学技术了。但我母亲也还在为父亲找职业。我父亲其实自己也在努力,有一段时间他找到了在河南开封一个军火仓库的工作,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候他的军衔是中尉。别人在晋升,可他在 20 多年里从上校"升"成了中尉。他的收入也很低,一个月只有 60 元的薪水,除去个人吃用,就寄不了什么钱到上海。从 1933 年起,我成了全家的希望所在。我父亲除了小时候因我写大字写得不好用拳头捶了我一次手臂外,从来没有打过我。他对我一直是很民主的。在我担任起贴补家用的责任后,他更加看得起我。对我客气得别人看了都觉得过分。其实对他来说却是很自然的。

在 1934 年我去清华之前,我和我父亲可以说是一直在一起的,虽有时分开,但时间都不长。1934 年我进清华后同他见面的时间就少了。

总的说来在我 20 岁前,我父亲对我的思想、性格还是产

生了一些影响的。我父亲从来不管我，似乎从来不关心对我的教育、或者他认为我发展得很好，用不着管。就是他给我读《三国演义》也纯粹是为了他自己消遣。不过尽管他一生潦倒，但是他的正直、他的俭朴，我一向认为是很好的，我一直对他很同情。他对我从不斥责。我同他在平等相处的意义下可以说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我的有些脾气同我父亲也很相似。到20岁后，应该说还要早一点，他对我就发生不了影响了。我写的父亲其实只是我20岁前的父亲。我现在也是在回忆我20岁前时对他的印象。

不过既然在回忆他，我也把在我20岁以后他的情况写一写。

记不清楚是抗战前1937年的哪一月，他去湖南衡阳，在湘黔铁路局做事，也是一个小员工。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对铁路线进行轰炸，路局要我父亲去抢修被炸的铁路。我父亲说，不能为几十块钱卖命，决定辞职不干了。以后他就在大后方到处流浪。先是从湖南到了广西宜山，再从宜山到了贵阳，再从贵阳到昆明。在昆明到一个亲戚家里做家庭教师，由于同学生关系搞得不好，又去了云南巧家。抗战胜利后，他从巧家到了重庆。整个抗战时期，他的情况非常狼狈，穷得不得了，也脏得不得了，最后弄得满身长疥疮，而且在疥疮的溃疡处又钻进了许多虱子。结果还是一个亲戚找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帮了点忙，1946年4月把他送回到上海。从抗战爆发到日本投降，他在“大后方”流浪了将近10年。

我父亲在河南巩县得病回到上海后，老是说自己是个“逃

官”。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逃官”的事不讲了。他有点精神病,但当时他的病并不是那么严重的。可是抗战后回到上海,因为同别人一起发起办学校,合作者甩开了他,一气之下,他真的成了疯人。1949年我回到上海见到的就是一个完全的神经病患者。后来组织上照顾,让我们把他送进了闵行精神病院,住了十好几年,中间我曾看望过他一次。“文革”后把他送回家,不久他就去世了。去世的时间是1969年11月。那时正是“文革”初期,我正在北京挨批受斗,不过我还是在11月12日得知他去世的噩耗后,对他写了这样一段评语,说他:“在旧社会不属于统治和剥削阶级,而是个受欺侮受歧视的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好人。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同时有许多封建思想,看来还有迷信思想。他偶尔也讲几句无政府主义的语言。他为人不作假,对人完全没有坏心眼。在旧社会‘上流’社会中像他这样没有心机的人是不多的。解放后,如果不是完全疯了的话,会接受些新思想,可是解放对他来说已经晚了。”现在我还想说这样几句:他是一个正直而“不合时宜”的人,做事情一本正经,最不善于交际,更不能适应官场,可是一直没有得到适合于他的职业,生活一直在困难之中,后来他就悲观失望、灰心、自暴自弃,变成一个没有什么作为的人。他生活非常节俭,几乎不花什么钱。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属于上流社会,但是非常“平民化”,经常坐在食品摊上和下层社会的人一起吃东西。在家庭里从来不管教子女,也从来不打骂孩子。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终生潦倒,过着悲惨的生活。

我母亲同我父亲不一样。我的父亲有一点是我看不起的，他讲清高，不愿求人。连要我姨父帮忙找工作这样的事也决不愿意张口。他也不愿意向人借钱。到当铺当东西这样的事他也是决不肯干的。可是不求人就找不到工作。不借钱没有钱，当天就揭不开锅。因此求人的事都是我妈妈去干。他明明知道妈妈干的正是他决不肯做的那种“不清高”的事，可是他不能不吃不穿，妈妈求人借来的钱，他实际上花了其中一部分。小时候我认为他在这一点上言行不一，对他很有意见。不过到了后来，我可怜他，也就不再去要求他什么了。我妈妈有困难，看到我年纪小，不能对我讲；对父亲讲，一句话他就会跳起来，因此有一段时间她常常偷偷一个人掉眼泪。其实那时我已经懂事了，见她这样，我也很伤心。不过我再大一些，她就常对我讲讲自己的心事，也就得到一些安慰。我妈妈是一个好胜的人，在外人面前总是装得一切都有办法的样子。她也真有办法，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把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拉扯大了。

我的母亲一直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社会职业，但是我们这个家的财政一直是靠她支撑的。这不是说她有什么收入，而是靠她去筹划。在我父亲失业而我和锺馥还没有去做事之前，我家的经常性收入只有每月 10 元略多一点的房租，这些钱只够家用的 1/10 多一点。为了增加一些收入，我母亲也挂过“小儿推拿大夫”的牌子行了一个时期的医，治好了不少小孩子。不过收入也不多。后来在又夭折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她不想再干这个行业了。这样就只有常常靠向亲戚们求援举债过日子。这些全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去做。我妈妈很会持家。我家的生

活过得很清苦，她有花同样多的钱使全家生活得好一些的本事。

我母亲大半生就是在生活艰难的环境下把这一大群孩子拉扯大这件事上度过的。这大概也是中国许许多多母亲的命运。有时她也觉得实在苦不堪言，有过自杀的念头，可是又放不下这一群心爱的孩子和毫无自理能力的丈夫，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年一年地活下来了。她思想上的这个情况，是她在事后亲自告诉我的。

不过我母亲的性格是开朗的、乐观的。她喜欢热闹、喜欢交际，办事也很有能力，讲话总占理，而且很有分寸，别人不得不服她，有人叫她“华若先生”。因为有她；别人不怎么敢欺侮我们。她会在困苦中找乐趣，并且喜爱文娱活动、看小说。除诗词外，许多小说她都看过，特别是《红楼梦》，她对《红楼梦》里的人物都很熟悉，尤其是其中的那些诗词歌赋都背得出来。她也学唱昆曲，主演过《长生殿》，扮演的是唐明皇。由于她学昆曲，《长生殿》中的《小宴》、《惊变》两出戏里的词调至今我还记得几句。在京戏方面，她扮演过《狸猫换太子》里的吕妃，不过这是后来听说的，我没有听到和看到过。妈妈能讲故事，给我讲了许多故事，至今我还记得许许多多她讲的故事和笑话，现在我会讲的许多笑话中不少就是她讲过多次，我把它们记住的。我小时候常要她给我讲故事，我从她那里得到许多杂七杂八的知识。在妈妈讲给我听的故事中，太平天国打到常州一带发生的事不少。我算了算她的年龄，太平天国时她并没有赶上，一定是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说给她听的。可是她会把故事

讲得像亲身经历的事情那样生动具体。故事的情节大都是关于外祖父随着全家逃难时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是“长毛”里有不少好人，可是清朝的官兵很坏。因为听了这样的故事，先入为主，后来听到人们谴责“发匪”的话，我就从来没有相信过。我相信家里的人总不会拿不真实的故事来骗我。还有一个关于妈妈讲故事的笑话。一次妈妈讲在太平天国时全家逃难，外祖父的脚上磨出了血泡，讲到这里，她打瞌睡，讲不下去了，可是我却一股劲儿地问她“脚上的泡后来怎样”，她就胡说起来了，说那些泡（上海话“泡”、“炮”同音）就“嘭”“嘭”地响起来了。我很奇怪，硬把她弄醒了，大笑了一场。

在自己个性的形成中，我受到我妈妈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我是我妈妈生的第一个孩子。生我时候，她还不那么会带孩子。我睡觉时爱朝一侧睡，她不知道把我纠正过来，结果我的头睡扁了。她对我管得从来不严。至今我吃饭时，桌上米粒会洒得很多，那就是没有把我管严的结果。不过要管，我也不是听话的孩子。我不喜欢别人——包括妈妈——管我，她也就任着我。我的“独立精神”回想起来真有点过份。妈妈是很喜欢我的，很照顾我，在生活上老提醒我该做或者不该做什么事，把我当作孩子看待，我常常表现出不耐烦，她也不生我的气。也是因为我是长子，她有事总要和我商量，听听我的意见，而且很重视我的意见。我是家中的重要人物，不到20岁，我就担负起家中不小的费用，但是我后来干革命了，挣不到养家钱了，她却从来没有埋怨过、阻碍过我，一句消极的话都没有说过。

我母亲活的岁数不小，1982 年 1 月去世时快满 90 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但不同她生活在一起，而且都断了联系。在这一段时间中对她的情况就知道得很少了。如果从只讲我 20 岁前生活和成长的环境来说，写到这里也已经够了，不过上面我把我 20 岁以后父亲的情况写了一段，我也就在这里把我 20 岁后我母亲的情况也写上一段。

从抗战前的 1937 年二三月间我去北平，一直到 1949 年建国前夕，有 12 年多没有见过我母亲。在这 12 年中，我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太原、武汉、广州，后来在延安，妈妈在沦陷区的上海。抗战胜利后，我一直在解放区，而上海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因此我和她一直没有可能见面，只是偶尔听到一些零碎的消息。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革命我只能把家里的事抛开不顾。但是我知道妈妈的生活会因为我的这个“不顾”更为困难。我心里一直有牵挂。本来 1936 年我大学毕了业，有了一个薪水相当多的固定的职业，几十年来妈妈为了全家生计发愁的状况可以成为过去，她可以比较安心地过日子了。没有想到抗战爆发后，我根本不能顾家，情况比抗战前还要困难。后来我听说她的身体还健康，弟妹们大都长大，参加了革命，我放心了一点。但是我真想象不出妈妈这一个时期的生活是怎么过的。1949 年上海也获得解放，我也到了北京，有了回上海看看母亲的可能，于是我就急迫地请假到上海走了一趟。到了上海，我才了解到抗战开始后妈妈生活的一个大概。原来抗战爆发后，我妈妈同以前有来往的亲戚断了联系。在老的社会关系不再来往之后，她却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青年同志建立

起新的社会关系。抗战前我的大妹妹郁鍾馥在上海市土地局当练习生时，有一个同事沈涵（建国后他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副主席）以及沈涵的那些革命同志们从抗战开始后不久一直对我妈妈热心照顾。妈妈也关心沈涵和他的同志们，并且积极为这些革命青年服务。这些做地下工作的青年们开会，她在门外观察动静。她成了一个革命的老妈妈。这些青年革命者成立了一个“益友社”，给我妈妈封了一个“社长”的名义。我妈妈虽然过着贫困的日子，但不是孤立无援的，而且精神上很愉快。

在这 12 年中，我的第四个妹妹黎汶（郁鍾媛）参加了新四军。先是在江南活动，后来去了苏北。我弟弟先参加了上海市内的革命活动，后来去了崇明。他们也先后都离开了家，只有最大的和最小的两个妹妹一直在上海，对妈妈有些照应，而益友社的青年们却一直在上海同妈妈在一起。

1943 年秋天，黎汶在苏北生了重病。妈妈不放心，决定去看望她。她，一个一直在城市生活的“老太太”，带上一个包袱朝苏北革命根据地走去。她独自一人过了长江，通过好几道日寇设置的关卡，来到人地生疏的苏北农村。最后到达靠近目的地高邮的汉留镇。在那里，有一位好心的农民陪她走了十几里路找到黎汶的驻地。到这个军分区驻地后，妈妈就住了下来，与黎汶一起睡门板，吃大锅饭，对黎汶的病很好地护理。一直等到黎汶的病情好转，最后得到痊愈之后，她又独自一人回到上海。在苏北新四军驻地，她亲眼看到军民官兵亲密无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懂得为什么不少青年愿意离乡背井吃尽辛苦在所不惜。妈妈感慨地说：“我如果没有两个小孩拖累，真愿意留

在这里。”这件事是我妈妈一生中很得意、特别愿意对人讲的事情。

建国后，妈妈在上海积极做里弄工作，在群众中做宣传工作。抗美援朝开始后，她更在军属中做了大量工作。家里有一个陈毅市长给她的奖状，就是这个时候发给她的。她一直挂在自己的卧室里。建国后我妈妈还在上海静安区、长宁区当过几任政协委员。

后来妈妈也多次到北京，同我生活在一起。

我妈妈一生中最后倒还有几年过了比较愉快的日子。

## 5.2 我的祖母

我诞生时，祖父已经谢世了 20 多年，祖母还在。我还见到过我满月时她抱着我拍摄的照片。那时计算起来，她是 65 岁，看来还不算太老。1918 年妈妈把我从北京带回上海，那时她已经是 70 岁的老太太了。她对我不错，没有训斥过我。过春节我向她磕头拜年时还给我压岁钱。但是我对她一点感情也没有。我回到上海时她已经抽上了鸦片烟。我没有留下她坐着、站着或者走动的印象，而只有她躺在床上的印象。不是躺着抽鸦片就是生病。她摆着婆婆的架子，还要儿媳伺候，而且在生活上很挑剔。我妈妈妯娌三个，她最喜欢我妈妈。这个“喜欢”就意味着要我妈妈更多地伺候她。夜间她经常要妈妈替她打烟泡、装烟枪、敲背捶腰，做夜点。没有事做，也要我妈妈陪着她。这样的“喜欢”，真不如不喜欢。结果弄得妈妈每天

都非常劳累，回到自己房间免不了诉苦。我对祖母也就不满意。她从不笑——至少我的记忆中没有她的笑容。祖母也没有给我讲过任何故事。因此她去世时，我一点悲伤都没有。

关于她的死，我倒记得几件事。

第一是她的棺材。在她虚岁33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就把棺材准备好了。后来病情好转，多活了44年。在这44年中，每年她都要人把瓷碗敲碎并进一步碾成粒状，和在漆里，把棺材漆一遍。我9岁那年她开始每天水泻。第二年夏天起更每天水泻不止。据说抽鸦片的人是不会泻的，得了这个病，连抽鸦片之后都没有效果，她自己觉得活不长久了，就要人把棺材从原来存放的乡下运到了客厅。我用棍子去敲，真的像敲在瓷器上那样当当地响。她对这棺材非常满意，我却对她这种观念和做法，很不以为然。

第二件事是记录她断气的时间。后来她昏迷了，那时没有什么输氧的设备，也没有观察心脏跳动的仪器，只是等她的断气，可是她几天中还一直在微弱地呼吸。于是家里的人夜间轮流守在她身边记录她断气的钟点。那时我对死人一点也没有害怕的心理，上面说过她即将去世也没有什么悲伤——而且我看到大人们也并不悲伤，因此在该轮流到我妈妈守夜的那一天，我要求陪着妈妈在祖母身边。我也有个想法，一夜不睡就可以看日出。这一夜祖母没有断气，天还没有亮，我就上了二楼屋顶的阳台去看日出。其实就是在高山上也不同于在海边，而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并且不是在什么摩天大厦而只是在二层楼的屋顶，怎么能看到日出？那天看日出的结果是，太

阳早就出来了，天色很亮了，日出的景色根本没有看见。这是小孩子缺乏必要的知识的结果。

第三件事是丧礼。祖母死了之后，又是吊丧，又是接眚，又是从头七做到断七，和尚念经、道士做道场，家里非常热闹，增加了许多旧习俗的知识。比如接眚中的这个"眚"字也是那一次认识的。还知道眚的形象中的脚是鸡爪子。我还记得道士在给阴间开的死者的介绍中说我祖母在阳间的地址是"江苏省、苏常道、松江府、上海县、高昌司(司相当于县下的区)、22保、××甲"。多少甲记不住了。道士不知道清末的上海已经不属于苏常道，因为新设立了"苏松太"道，而民国以后"道"也已撤销。在整个丧礼中我成了中心人物，因为我过继给长房，而长房的我的"父亲"早已去世，我便是"承重孙"，于是我成为丧礼中代表死者家属的人。这是封建家庭中的一个规矩。

## 5.3 顾家弄55号院子

20岁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我就住在顾家弄55号院子里。

顾家弄的位置在上海老城里的东南部。上海旧城，有八个城门，东南西北各两个。顾家弄东西向，它的东口在阜民路。阜民路的南头就是大南门。顾家弄的西口在凝和路。顾家弄的东口对着俞家弄。因此现在顾家弄改名为俞家弄，同原来的俞家弄算成一条街了。这条顾家弄很狭窄，一辆轿车就把它的路面占了，街面铺的是石子，这种路面上海人叫"蛋圪路"。80年

代我去过两次，第一次去时，街和房子都完全是老样子，第二次去时，老房子拆了，重盖成新房，而路面还是老样子。这种蛋圪路今天在上海已经很少了。

我算了一下在这个院子里住的时间，前后有12年之久。这个院子里的居民情况非常复杂。它是我了解社会的一所学校。

顾家弄55号的土地和房屋，是我祖上传下来的财产。土地的面积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有一亩三四分，正式的房子是三座二层的楼房。其余就是附属的房子：在顾家弄朝南开有“墙门间”，那是放轿子和像“肃静”、“回避”那样牌子的地方，不过在我记事的年代里已经没有看到过轿子，那种牌子也只看到过很短一段时间就不见了。我家的墙门间很矮，这是受官场里的级别限制的。与墙门间并列临街有五六间同墙门间一样也是低矮的平房。在整个院子的东北角靠近后门的地方有许多间不整齐的房子。后门在乔家浜。徐光启的故居就在我家后门的附近，不过这个故居早就不存在了，现在只立了一块牌子在那里。

顾家弄55号整个院子的人口有八九十人，大都是成年人，小孩子不多。在我自己也是小孩子时，总共只有10个左右。住户除我们这一家外，一部分是我的本家、好几房的伯父伯母和他们的后代，另一部分是房客。

先来介绍几户房客的情况。

在房客中有开电料行的小业主Z。那小业主住的房子是他外祖父向我家租的。他的外祖父没有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

而是招了一个女婿。这女婿就是现在我说的这个小业主的父亲。因此这个小业主的母亲就一直住在顾家弄。她生在我们这个院子，一直到60多岁死去，没有一晚不住在这个院子里，而且据说她没有一晚不住在那张床上。那样发达的上海，竟有这样一个一生一世在一间屋子里并且在一张床上度过的人，也是有趣的事。那个小业主雇了几个工人，有的也住在顾家弄的院子里。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在电料行的工人中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这个小业主为人老老实实，他的母亲也是个非常老实的家庭妇女。可是他有一个姐姐。她的年岁比我父亲还要大一岁，但我称她为H姐。她不嫁人，靠着弟弟过日子。这个妇女却不那么老实，不干家务劳动，成天闲逛，并且对黄色的东西谈起来津津有味，同一些女的谈起这方面的事情讲得赤裸裸的。她看到我年纪小，讲话时不顾忌我在场。她没有想到她的讲话会使我瞧不起她。

还有一家也是老房客Ch。这家人同邻居很少来往。我也从来没有去过他们家，只是在院子里遇见过他。他是一个神秘人物。但是没有不通风的墙，据说他搞非法活动，在家里做过红丸(毒品)，有人看见过在风声紧时，他把做红丸的铜模子扔进井里去。还有人说他绑过别人的票，说得凶一些还说他撕过票。弄得谁也不愿同他家来往。

房客中还有一家是我的远房亲戚Zh。是上海浦东的大地主，家中有钱，抽上了鸦片。成天消耗祖产。天天同他妻子吵架。也不回浦东老家，在顾家弄我家租了一间房间长期住下来。由于他家住的地方同我家只一墙之隔。他家吵得很厉害，

对我家有很大的干扰。他家的唯一儿子，也就是我的远房表弟，比我小两岁，同我非常要好，在父母吵架时就到我家来“避难”。

房客还有两家。一家是拉黄包车的，一家是做小生意的。这两家是下层的普通劳动者。

除了房客之外就是本家了。在顾家弄住的是我祖父的祖父的后代。活着的是我的两个伯父和一个已经过世的伯父的妻子和女儿。本家中颇有一些值得描绘一下的“人物”。现在我不想写出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拉丁字母来表示：

年龄最大的要算S，我的堂伯父。他比我大40多岁，我十几岁时他已经60多岁了。他的曾祖父是我祖父的父亲的兄弟。他就住在我家的后院，几乎天天会看见他。据说他从小非常之笨，连识字都很困难。有一次私塾老师教了他一个“天”字，考他。问这个字读什么，他读不出来，老师就告诉他读tian。再问他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他也说不出来。老师就提示他，让他朝上看。他看了说“天花板”，老师说：“再上面呢？”他答道：“檩条吧。”老师很耐心，问他：“再上面呢？”他回答说：“瓦。”老师穷追不舍地问：“再上边呢？”他回答说：“没有了。”这样的笨孩子少有，可是他恰恰选择了读书、教书的职业，而且一定要考秀才。他一次一次地落第，却一次一次地考，考一次他就用刀子在考场的桌子上用刀刻“S坐此”。最后照顾了他，在很大岁数时让他中上了秀才。于是他自己就当了一名私塾老师。教得不好不必说了，还出了这么一次丑。一次他在他的学生面前表示对学生的母亲特殊的关心。学生的父亲知道

了，到私塾对他大兴问罪之师，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过他面皮老，还是继续教他的书。这个人表面上看是个冬烘，可是为人极坏。谁若得罪了他，他就找机会报复，而且选择极恶劣的手段。他是我祖父的远房侄子，与我祖父不和，于是在我祖父过生日请客那一天，他提了便壶，到吃饭的客厅把尿撒得满地。我祖母提起这事就十分愤慨。听说他还完全同样地对付同他共一个祖父的堂兄。他还有一个特点，欺老怕小，欺软怕硬。谁软弱就欺侮谁，谁硬就怕谁。他怕自己的儿子女儿，甚至怕他的 10 岁刚出头的小孙子。他们可以骂他，骂得很难听，他都能忍着。同他的妻子倒时常吵架。吵得厉害时就摔东西。但是他摔东西是有选择的，只摔他的“四书五经”、他的“八股”范文。那些东西是摔不坏的。他的妻子一生气要摔茶壶茶杯，他就慌了，马上软下来。他懂得那会造成自己家财产的损失。他住在楼上，那时的窗户还是旧式的，开窗就是把窗户推开。他在楼上骂人，他要骂的人在楼下院子里，他就把窗户推开骂几句。当别人骂他时，他就把窗户一关，一句话不说，等骂他的人骂得累了，或者因为他不再吭声而停止骂他时，他就又推开窗户骂几句。别人再骂他时，便又把窗户关上。别人骂他是乌龟，一会儿伸头，一会儿缩头。这个 S 真是使我一见到就讨厌的老家伙。

年纪比他小 10 多岁的是 B，是我的亲伯父。他的职业在当时的上海有个名称：“忙人”。这就是说不出他的职业是什么，可就是非常忙。买卖典押土地房屋要有中人、保人，打官司要有出主意、想办法的人，或者要找人仲裁，做买卖要有人牵

线搭桥……各式各样的事情都会找到他。这样的人要人家相信他，也要有能力，能够处理好这样的事，因此他不阔也要装阔，吃喝嫖赌，都要上得了场面。他家并没有多大家底，可是开销很大，而这开销，也就是他活动的本钱。他除妻子外还有一个小老婆，原先是妓女。除一妻一妾外，还有第二个小老婆，但住在外面，不让第一个小老婆知道。本来开销大的家，在两处过日子，是很紧、不好过的。日子越不好过就越要装阔，决不能露出穷相。只有摆得出阔，有排扬，才有人找他，才"忙"得起来，才会有收益。自己没有可以摆阔的钱，就借。他就是这样一种"负债经营者"。那时候上海商业信用很发达，而且实行阴历年结帐的办法。我们是邻居，知道每到年关的时候他都急得要自杀。可是年关一过，他又"活"了。他弄钱的办法是不择手段的。他从妓院娶回这个小老婆没有"赔本"，而是解决了他一个大问题。娶了这个妓女之后，也就成了那个妓女的"养母"的"女婿"。他因此取得了那个老鸨的信任。老鸨有点钱，怕流氓抢和敲竹杠，同他商量。他说自己可以去帮助她存起来，而且利息很高。老鸨就把钱交给他。其实他早就把这些钱作为自己的钱花了，可是按期不误地交给老鸨比较高的利钱。他所做的事大体上就是这么干的。他的交际广泛，所以常在家里打牌赌钱。而我对各种牌的知识和兴趣，主要就是在他们的牌桌旁边学得的。他有时也办实业。在别人看来，他是一个有面子有办法的人，但我们家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天天在骗人的人。

第三个也是Ch。他是上面我讲过的S的儿子。一只眼睛有毛病，不知道那只眼是怎么瞎的。他是一个别人不知道从事

什么职业的人。全年不见他出门，但是日子过得相当富裕，而且有很大的鸦片烟瘾。收入来源之谜，后来我逐渐弄清楚了。他干的主要活动之一是走私，他坐地分赃。大概在流氓团伙里他是一个有地位的老头子。他就是凭这个资格坐地分赃。有一次我到他的卧室去，他正在抽鸦片烟，有一个“客人”在他那里。他们谈话的主题我大体上听明白了：说有一个他们集团里的人干了对不起他们的事，拆了他们的台。Ch 听了大发雷霆，说：“这个‘出佬(上海骂人的话)以为我拿他没有办法。他在做梦?！我一定要把他的一双眼睛挖出来，放在这烟盘里给你们看。”后来没有听说在他的烟盘里放有活人眼珠的事，但是听说那个人的眼睛被人用石灰石弄瞎了。Ch 真是一个可怕的人。他有两个儿子，比我要小好几岁，在他们只有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可以到街上把鸦片烟买回来。这两个小孩骂起他们的祖父来很厉害。其中小的那个在抗美援朝中把假药卖给志愿军，被我们的政府枪毙了。

第四个说的是 S 的侄子、我的一个堂兄 X，他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他在一家美商洋行当买办。他的妻子原来也是妓院中人。他同她结婚，并没有花什么钱，而且娶过来就是大老婆。原因是他长得很漂亮，那个妓女看上了他，用自己的积蓄赎了身然后做他的妻子跟他过日子。因此他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较高。他们夫妻之间的称号很特别，女的叫男的 X 哥，男的叫女的“兄”。女的怕男的在外面与别的女人相好，就让男的抽上鸦片烟。结果 X 白天上班硬支撑了一天(他不能让外国老板知道他有鸦片烟瘾)，回家时精疲力竭，困倦不堪，

要靠抽鸦片烟提神。女的也同时抽上了鸦片烟。因此X回家后，一支烟枪两个人轮流着抽。有一次我在他们家看到这样的景象：X回来了，女的伺候他抽鸦片，X一边抽烟，一边就睡着了。女的就把她的X哥弄醒，可是抽了几口X又睡着了，女的再次把他叫醒。等到X抽足了有了精神，可是妻子又发困睡着了，于是X就要把他的“兄”叫醒，伺候她抽鸦片烟。如此轮流叫醒对方，轮流抽烟，一直到两人都抽足了烟，有了精神，两个人再说话，再做别的事。

我还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家学外国人，家里养了两只大狼狗，还养了几只哈叭狗。有一次，我正在他们家，两只大狼狗打架，闯进了卧室，大有窜到烟榻上来的架势。这一下把男女两人都惊醒了，一个手里拿着烟枪，一个手里端着烟盘，站在床上，以保护烟具，同时嘴里叫着那两只大狼狗的名字。看到这种昏天黑地的生活，真是让我感到既可笑又可怜。

“兄”虽然采取了使“X哥”抽鸦片烟上瘾的办法来防止“X”同别的女人相好，但是因为“兄”没有生殖能力，X还是在外面娶了个小老婆生了一个儿子，传宗接代，不过瞒得很紧，不让他的“兄”知道。

M也是S的儿子，比我也要大许多岁，独身，是个酒鬼，经常在外面喝酒。没有一次他回家不是喝得烂醉，摇摇晃晃地走进这个院子，一边走一边唱。中国音乐记谱的方法用的是“工尺上丝下”。有好几次我见到他，他一边走一边唱：“工工(公公)丝(四)尺上(长)，婆婆六尺长，生个孩子一丈长。”M倒挺和气，喜欢小孩子，见了我们常常拿出一块糖给我们吃。

我们嫌它脏，拿在手里，等他走开后就扔掉了。不很久，他死于酒精中毒。

Zh 是 S 的女婿，不算房客。他是这样一种人，在 1925 年，他是师范教员。那时他是北伐的积极拥护者。他对大家说，北伐成功，蒋介石会请他当教育部长。他还告诉我(谁知道是真是假)，蒋经国是他的学生，蒋经国还到顾家弄他住的那个房间来过。在 1925—1926 那些年，他真革命得不得了。可是“四·一二”之后不久，他就到一家日本洋行当上了买办，再也听不见他讲一句什么革命的话了。他办事倒有点能力，抗战后到了重庆，混得不错。我的父亲流落在“大后方”，不知怎么见到了他，他照顾了我父亲一段时间。我父亲回到上海他也出过一些力。说来他还有恩于我家呢。

再说几个女的。Zh 的妻子，也就是我的一个堂姐。她对北伐革命同他丈夫一样，在 1925—1926 年都积极得很。不知道她从哪里得到许多宣传北伐的传单，她就把传单装在裤腿里，用带子把裤腿口扎紧，走到热闹的街上，当众解开带子，把传单从裤腿里取出来，然后散发。1925—1926 年有一个共产党员叫林军的，常到她那里来。林军这个人我见到多次，高高的身材，长脸，对小孩子很和气。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在顾家弄 55 号这个院子里是公开的。建国后有一次我问中央交通局局长王凯，他是否知道有林军这样一个共产党员，王说那时他也在上海，知道林军这个人，当时林军是我党与国民党的跨党分子，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商人部长。这个林军常到顾家弄来。Zh 的妻子同他混得很熟。林军同她的一个妹妹，也就是我

的另一个堂姐(那时她还没有出嫁)也混得很熟。还同上面我讲到的那个开电料行的小业主家的妹妹H也很熟。当时我不懂得不属于工农基本群众而带投机性的"勇敢分子"往往比较早"参加"革命的道理，只看到林军不找顾家弄院子里那些老实人、正派人，却同这些女的混在一起，使我很不满意。由于我知道林军是共产党员，还因此损害了共产党员在我心目中的高尚光辉的形象。

再说B的小老婆J，她和B生了好几个孩子，她自己没有文化，买了一些低劣的连环画书看。她把让小孩子看这种低劣的作品也当作对小孩的教育，埋怨租看这些连环画价格太高。她还在家里参加"花会"这种赌博。这是那时上海参加人数最多的一种赌博。组织"花会"的人，每天把36个号码出售，中者一配36。不论钱多钱少都收。结果即便很穷的人也可以参加。这种办花会的人把别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骗走了。围绕"花会"他们还搞许多迷信和恶作剧的活动。J是这个"花会"活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老对孩子讲，根本不顾及教育效果。

我这是随便讲讲上面这些人，他们之中有老腐朽的流氓性质的、生活空虚堕落的、政治上投机的，还有文化层次极低的等等。在20岁前这段时间里，我和我的弟妹都在北京住过许多年。住在北京，我们接触到的那些亲戚邻居都是规规矩矩的人，因此对顾家弄55号那些现象都很看不惯。我怕弟妹们年轻受到不好的影响，就经常对这些人、这些现象进行"批判"，让弟妹们对这些人、这些事的本质认识得更清楚些。我则把这个院子作为自己观察分析上海社会的一个对象。在上大

学同程淡志交上了好朋友后，他对这个院子里的人和事很感兴趣，我和他常常坐在我住房下面的客厅里（我常在那里看书写东西），看到一个人就议论一个人（这客厅事实上是一个过道，成天成夜都有人穿过），作为我们热心的社会调查的一部分。

## 5.4 上海乔家浜郁氏家族

我本姓郁，是“乔家浜郁家”的一员。

说“乔家浜郁家”并不确切。因为只有我高祖（祖父的祖父）的哥哥这一支，才住在乔家浜（现在改名乔家路）靠近东头路北那座宅院里。我们把那个宅院叫作“老宅”。他们这一支是财主家。人们把他们叫作“大郁家”。我高祖这一支不是财主家，人们也就把它叫作“小郁家”。

说起大小郁家的起因有一段故事。我的高祖郁莲塘和他的哥哥郁馥山，本来都住在上海附近的南翔乡下（这个地方现在属于上海嘉定区的封滨镇）。听说上海一个沙船业老板要招收一个学徒，弟兄两个都来到这个老板处应试。在进行就职考试之前，老板先让弟兄俩各吃一碗馄饨，见面后就考问他们各自吃了多少只。郁馥山准确地说吃了 22 只，可是郁莲塘心中无数。结果录用了郁馥山。后来郁馥山在那字号里从学徒到朝奉，最后自己当起沙船行的老板，发了财。而郁莲塘只是在他哥哥的沙船行里“打工”。郁馥山在乔家浜东头盖了一座深宅大院，也出钱为他弟弟置了一些地皮盖了房，地点是在俞家

弄。郁莲塘有5个儿子8个孙子，人丁兴旺，俞家弄的房子住不下，就在与俞家弄相连的顾家弄（现在顾家弄也改名为俞家弄）又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分两个孩子去住。因此小郁家有两处住宅。这两处都只和乔家浜相近，但不在乔家浜（我们住的顾家弄的后门在乔家浜）。不过人们还是把这两支总称为“上海乔家浜郁家”。

大郁家的基本情况是，郁馥山1826年去世后，他的大儿子郁竹泉继承父业，继续经营沙船业，使家业更加发达，成为上海的首富。1852年郁竹泉去世，家业就由他的弟弟郁泰峰经营。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大郁家受到了小刀会的胁迫，给小刀会许多钱，资助了小刀会。后来清军打开上海城，小刀会失败了以后，清朝又对大郁家进行重罚。对这一段历史我写过一篇《小刀会前后的郁泰峰——大郁家的故事》作为这一篇的附录。读者有兴趣也不妨看一下。大郁家经过这次变故，元气大伤，在郁泰峰去世后更加衰落。但是那座深宅大院在我20岁前还在那里，只是年久失修，不那么富丽堂皇了。据说现在这座院子还被上海市政府保留下来，因为上海古建筑不多了。不过现在有许多户人家住在那里，成了一个大杂院，房屋的破坏也相当严重。大郁家和小郁家的差距到我父亲这一代已经不那么明显了。

我们小郁家的祖先郁莲塘，据说娶过9个老婆，娶一个，跟人逃一个。逃了他又娶一个。他死的时候，跟他的是一妻一妾。他没有当成财主，可是生下许多个孩子。我这支是他的第5个儿子郁望岩的后代。郁望岩是我的曾祖父。他也经商。郁

望岩有两个儿子，我的祖父郁砺卿是其中一个。郁砺卿生了三个儿子，由于他的弟弟没有后代，郁砺卿便把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过继给了自己的弟弟。他自己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郁禹门，小儿子就是我父亲。郁禹门是在我出生前两三年去世的。他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因此我生下来之后便过继到他的房下。不过我过继出去之后，还是跟自己的生父生母过，并没有去大伯父家过日子(我的二伯父过继出去之后也还是跟我祖母在一起)。我过继出去只是在名义上可以继承我大伯父的那份“家业”。我还是把大伯母叫“大姆妈”而不叫“姆妈”(上海话的妈妈)。我大伯母跟她的两个女儿过，也不寂寞。大伯母和我的两个堂妹住的房间就在隔壁，却很少来往。

我大伯母(按过继关系来说就是我的母亲)娘家姓曾。曾家祖籍是福建人，后来成为上海当地的名门世家。亲戚中有一些是上海有名的家族。曹汝霖就是我过继的母亲的亲表兄弟。前几年上海市研究上海南市的古建筑时有人定下上海有四处高水平的住宅，第二处就是乔家浜东头路北的我们郁家的老宅(老门牌乔家浜 77 号)。第四处就是上海大南门内同仁弄(离我家很近)曹汝霖的住宅。还有两家，第一家是徐光启的，第二家是在十六铺，也是经营沙船业的郭家。因为我伯母家同曹汝霖有那样的关系，我去北京后据我母亲讲，这个“五四运动”时出了名的卖国贼曹汝霖还抱过我，说过“这个小孩子将来有出息”这样的话。不过虽然曹汝霖同我舅家是近亲，但是在“五四运动”后曹汝霖太臭了，以后有一次曹去曾家，被我曾家的舅舅用门闩把他打了出去。

因为过继给我伯父的关系，我就成了我祖父的长孙，所以在 1925 年我祖母的丧礼中我就以“承重孙”的地位成为那次丧礼的主角。

我的二伯父家里人口比较多，在顾家弄住的有一妻一妾。他只有一个哑巴女儿，却有许多个儿子。大的长我 10 岁，还有好几个比我小的。因为他和我父亲合办重心化学工业社，要我事实上当这个工厂的技师，我和他的接触比较多。他家住的房间多，还在院子里盖了一个很小的楼，客人也多。他家里的事我知道得很多，是我社会知识的一个来源。

我们这个郁家对“祖先崇拜”的礼仪还是挺不少的。郁氏家族有二个祠堂，一个是老祠堂，在南翔。还有一个是郁馥山到上海发了家后在上海龙华建立的新祠堂。南翔的祠堂供奉的祖宗是从很老的开始的，我记得说我是第 23 代。在龙华供奉的就不那么古老，从哪一代起我就说不好了。我们郁家一年春秋二祭，春天在龙华，秋天在南翔。祭祖宗实行的礼仪在家族中有明文规定。

在我们小郁家的范围内没有统一的祭祖活动，而是每一房自己进行。我父亲不那么信鬼神(后来得了精神病之后相信了)，对祖先却很崇敬。我家每逢直系祖先生日和忌日都要挂起死者的喜像供奉。我父亲还是《黎阳郁氏家谱》的编撰员。对于我家家族史他给我讲了许多。这家谱修了 10 多年，到抗战前夕才印出，一共只印了 20 册。我家有一册。我知道有这么一部家谱，但是一直没有看到。在建国前夕，我从北京回上海探望我的母亲时，我见过那本家谱。不过“文革”时我妈妈怕被

红卫兵查出来作为搞“封、资、修”批斗的对象，就把它烧掉了。文革后，我弟弟从另一个本家那里弄到了 20 册中的另外一册。他复制了一份给我，因此我有我家家谱的复印本，但我一直没有去看它。不很久之前，我才看了一遍，而且还写了一篇《我读了这样一本书》，现在我也把它附在这一篇的后面作为附录，好让大家了解乔家浜郁家的家谱是怎么一回事。

从我家庭的这些状况来看，封建的东西也还真不少。我是郁氏家庭的一员，对封建的那一套还是很熟悉的。

**附一**

## 小刀会前后的郁泰峰
### ——“大郁家”的故事

我想介绍清末一个上海人——郁泰峰。这么做并非由于此人有多大重要性，或者有多大的趣味性，只是因为他是我的一个祖先，我父亲给我讲了不少有关他的事情。近年来我对他做了一些研究，觉得这样的人也还有其特点，介绍有关他的情况，可以使读者多了解一点关于那个时期上海的情况。

郁泰峰之所以能够上上海县志和在不少有关小刀会的档案资料、文稿、书籍中提到他，无非由于：一、家中富有；二、编过一部《宜稼堂丛书》；三、与小刀会历史有过一段瓜葛。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是基本的，其余两条都是由此产生的。

郁泰峰(1799—1865)(他的名字是郁松年)是上海郁家的

祖先。他之所以有钱，完全是得自他父兄的遗产。他的父亲郁馥山是上海郁家的鼻祖，直到他小时候，郁家还是嘉定县南翔镇的住户。郁馥山13岁时到上海一家沙船业字号当学徒，后独立经营，发了家[①]。在他去世前一年，1825年在城内乔家浜购地造屋，取得上海籍。

郁馥山1826年去世后，他的大儿子郁竹泉经营了30年，上海郁家就成了当地首富[②]。1852年郁竹泉去世，家产就由郁泰峰经管。他虽然说不上是一个文人，却喜欢读书，利用家里很有钱的优势，买了不少书来，并且找到一些残本、抄本，找人来校勘，加上自己写一些序文、札记之类的东西，刻印出书。在他40岁左右，即1840—1842年，就给宋朝的萧常和元朝的郝经的两部《续后汉书》做这种校勘重印的工作。其实这两部书并没有多大价值，只是反对陈寿的《三国志》，称刘备的政权为"蜀"不称汉。郁泰峰为重印这两部书写的序也都强调这个正统观点。可见郁泰峰并不是有什么高明见解的人。在这期间他刊印了戴剡源、袁清容的文集。不过在郁竹泉死后，他毕竟不能不主持父兄遗下的巨大产业，因此他的主要的身份还是一个富商。他是一个喜欢搞搞古书的商人，一个有钱去弄弄古书的商人。

从郁竹泉1852年11月去世到上海起义成功，中间有9个月。在这9个多月中，郁竹泉的棺材一直停在客堂里。因为落葬是一件大事，把墓庐准备好要花不少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内，上海郊外与上海附近的农民起义已经很活跃，落葬之事很难进行。就在郁竹泉的棺材停在郁泰峰家这段时间内，上海

的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1853 年 9 月 7 日在刘丽川的领导下，上海小刀会起义者占领了上海城，活捉了当时的苏松道道台吴健彰，杀死了上海知县袁祖德。这时候，上海城里的有钱人纷纷逃出城去避难。有一个叫毛祥麟的人写了一部《三略汇编》的手稿，现存在上海图书馆。其中有一部分是《小刀会纪略》，讲到小刀会占领上海的头一天，即 9 月 1 日，上海城门“大门洞开不禁出入”。他对家里人说，现在他吃不准小刀会会不会很快退出上海城，因此想自己暂留城内，让妇女立即出城，到离上海 30 里外的华泾镇。当天晚上，上海一夜“四野寂然，并无火光，亦无更鼓声”。9 月 2 日早晨出门打听，才知道东门和北门已经关了，只有南门还开着。他估计小刀会不想撤出上海县城，于是就决定自己也出城。出城时“便道至友人郁泰峰家，询其行止，彼以兄柩在堂，且事多未了，势难弃之而去”。这个说法同我父亲对我讲的和《家谱》里记载的一样。这个毛祥麟当时讲了一篇大道理劝郁泰峰逃出上海城。谈后，觉得郁泰峰“似有不欲去之意。余道出”。郁泰峰就留在城里了。不过郁泰峰也早就让眷属逃到城外的周浦。

占领上海之后，为了筹集军饷，小刀会就让城里有钱的人家捐钱。郁泰峰家是首富，当然不会放过。小刀会战士到郁泰峰家并没有加害于他。《家谱》里说，郁泰峰“为兄柩在家，坚守不去，至有红巾威逼款项一事，不特生命危如累卵，且扬言将焚‘竹泉公棺木’”。这时郁泰峰“生死本置度外(这句话当然不可信)，但为保兄柩不得已，出巨金而免丁此大难”。出多少钱，有一个文字材料说：“起事之初先捐八万，复捐十数万，闻现在

逼伊二百一日常捐。”[③]还有一个文字材料说，小刀会“括富绅重金，并锢令日纳若干以济饷”[④]。当时的郁泰峰一方面不得不捐很多钱给小刀会，同时清朝知道这个消息后，也派人告诉郁泰峰，官兵需要后饷的数目，因此他就不得不两头捐款[⑤]。另一个材料也说，“官军之饷；郁松年因慷慨乐输，不遗余力”[⑥]。这时候，因郁泰峰家两面出钱，受到的损失巨大。1840年鸦片战争时，郁竹泉、郁泰峰家也受到不小的损失，但与这次是不好比的。

还听我父亲讲过，小刀会有一指挥机关就设在乔家浜郁泰峰家。郁莲塘就是在小刀会占领上海满10天后去世的。而郁莲塘的一个儿子在上海俞家弄的住宅也驻有小刀会的战士。

从1853年9月7日到1855年2月17日清军入城，小刀会在上海城内守了有一年五个多月之久，在这段时间中郁泰峰家是如何生活，他家的船队商号是怎么经营的，现在不得而知，只知道清军破城之后的第三天，即“初三日，抚军八城，至郁泰峰家责其在城济匪，声色俱厉，勒令捐银20万两，饬交道县修学宫、各衙署及一切善后事宜”[⑦]。《上海近代史(新编)》中写“连吉尔抗阿本人也从富商郁泰峰家中劫夺了20万两银子”，不知所据为何。《家谱》里讲的情况是郁泰峰“慨然”与他的侄子郁竹泉的儿子郁心卿合捐善后经费20万两即用以“修葺城垣”。

父亲对我讲，郁泰峰和郁竹泉的儿子家被罚捐了20万两银子之后，感到被指责“郁家养红头”名誉不好，就一不做二不

休，又捐了 20 万银子，求得清廷的表彰，弄了一个从二品盐运使的头衔，戴上了粉红顶子，也成了一个红顶商人，成了个官。家里就有了“回避”、“肃静”这样的牌子，出门时有人扛着这样的牌子吆喝开道，一般的人士就不敢当面指指戳戳说郁家养红头这样的话了。许多文献只说捐了 20 万两银子，似乎只捐了一次 20 万两，而不是捐了两次。我认为，说郁泰峰捐了两次 20 万两银子的说法是正确的。第一笔主要用于修战火损坏的城墙。由于这个原因，后来上海拆城墙修“中华路”和“民国路”的时候，郁竹泉和郁泰峰的后代还组织了一个“保城会”，反对拆城墙，还说要拆的话，卖了砖得到的钱中应该有郁家的一份。只捐了一笔 20 万银子的说法同父亲讲的也不一样。《家谱》里在写了捐了 20 万两银子修城墙之后，也写道：“又值国家多事之秋，国库空虚”，郁泰峰呈请抚台再“输银 20 万两，举国钦仰，朝廷议加以殊恩，郁泰峰辞而不受，惟请增府县学额，以广文化而开贤路，奉旨准如所请，并特加盐运史衔，立牌坊于学宫棂星门，并立传邑志”。

究竟郁泰峰捐了一个 20 万两还是两个 20 万两，这件事说不清楚，在《家谱》外的其他文献中都只提到一个 20 万银[8]。经过研究，我认为父亲讲的和家谱中写的可能不实。因为在家谱中有一个郁泰峰在 1856 年上禀，在这个上禀中讲，1855 年清军收复上海后，抚台“议对捐”20 万，那时城里“资财典铺被掠一空，而田产还在……情愿变产尽数报效”。这 20 万两，答应“在一年内陆续呈缴”。“……自上年二月(阴历)起到本年二月止按缴银 1 万零 70 余两，现已如数缴作 20 万两”。

他在禀状中说，这件事本来“不敢仰邀甄叙”，可是抚台“奏奉谕旨”说要郁泰峰缴齐这笔钱之后请奖。皇帝有这样的“谕旨”，郁泰峰还是不敢请奖。但是皇帝既然有这样的“渥”，他就想到上海县每年中取的“文童”只有 14 名，“武童”只有 9 名，他就想请求“大学加 7 名、中学加 5 名，小学加 3 名”，希望“松江府学永加文武学额各 7 名，上海县学各 5 名”。这个上禀送上去之后，两江总督何桂清和江苏学政赵德辙上奏说，他们了解到“松江府文童原额 25 名，武童 15 名，上海县文童原额 14 名，武童 9 名，拟请永加松江府文武童定额各 10 名，上海县文童永加定额 10 名，武额 9 名”，并奏请皇上给郁泰峰盐运使衔。这是 1868 年 5 月 13 日上奏的。一个多月后就得到了“朱批”，同意所奏。关于这 20 万两银子是分期缴纳的事，吴煦档案中也多次提到。从煦奏折来看，当时上海财政很困难，对郁泰峰的钱很重视，多次催缴，并给郁泰峰说了一些“素来急公好义”等好话。看来经过一段时间，郁泰峰和官场的往来，搞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件事使得郁泰峰在居民中得到一些好感。居民把新增加的 39 名文童、武童叫做“郁家秀才”，据说这些秀才中取之后，是要到郁泰峰那里磕头谢恩的。

当小刀会上海起义在清廷与帝国主义勾结下失败之后，郁泰峰的沙船业又重新经营起来。不过那时经营有不少的困难，当时洋面也时常发生盗艇拦截，海运沙船均有损失。当时清朝对沙船进口加强征进口税，逃捐一律加倍处罚，请包括郁泰峰在内的绅商为董事，分任缉捕支等事。郁泰峰本来就不是

一个精于经营的人，又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家道与郁竹泉在世时大不相同了。但是郁泰峰家的那个郁森盛沙船号，在当时上海24家大沙船号中还是名列前茅的[9]。清军重新占领上海城的第二年，即1856年，这个字号还发行过一种银币，当时叫作银饼，仿效当时流行的西班牙本洋，但币面正背，仅标明发行商号及年份，监制人的和创作的银匠的姓名和重量。现在人们看到的一枚郁森盛的银饼实重五钱，一面铸有“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郁森盛足纹银饼”，另一面铸有“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五钱银匠王寿造”。这种银饼不久就停止使用[10]。此外郁泰峰那时还担任上海同仁辅元堂从1859到1865年度的董事[11]。郁竹泉、郁泰峰家沙船业的衰落，可以从他们的儿子没有再从事沙船业这点看出来。

父亲告诉我，郁泰峰在小刀会时期主要精力并不放在经营商业上。他有兴趣的一件事是，收藏宋元佳本，进行校勘工作，据说这些藏书主要是从荛圃的藏书中买来的。他用来买书的钱花得很多，一说有10万两银子之多[12]。据父亲所讲，在小刀会后，他为笼络上海的那些文人，继续派人到各地收集善本书籍，继续找了一批上海文人做校勘工作，每月支付他们若干两银子，让这些人皆大欢喜。他立下志向要编一部《宜稼堂丛书》。这套丛书共6种，64本129卷。这套丛书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刻出的。1925年我随父亲从天津坐海船去上海，途中遇到南开大学的数学教授，说起这部丛书中有两种古算书颇有价值。1930年我暂住南京时，曾在状元巷旧书店看到过这套丛书。80年代，有一次在火车上又遇到一位南开大学研究

古文献的教授，他告诉我，《宜稼堂丛书》列入清末书目中，是一本颇为人知的书。后来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图书馆中又翻阅了一下。我对此书没有太高的评价。

郁泰峰还从 1837 年 9 月 30 日起到 1864 年 3 月 28 日记了 20 多年日记，共 53 本，并写了 100 多首诗。看来他笔头还是挺勤快的。

下面写的两件事就都是我父亲讲的，没有什么文字材料可以印证了。我父亲说，郁泰峰在小刀会后把许多时间花在与满清官员的应酬上。李鸿章就是他主要巴结的对象。李鸿章在上海时，曾到郁泰峰家里。当时郁泰峰家还有一个戏班子。郁泰峰陪着李鸿章一边抽鸦片，一边看戏。有一回李鸿章和郁泰峰说起郁泰峰家的藏书时，郁泰峰就邀李鸿章到藏书的地方转了一下。凡是李鸿章赞扬过的书，李走后很快都给送去。

还有一件有关姓丁的老爷的事。在我父亲讲给我时，我没有弄清究竟是丁日昌，还是丁汝昌。我只知道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丁汝昌是甲午战争的名将，后来做过苏松太道道台和江苏省巡抚。听我父亲讲，这位丁老爷当时还只是一个"候补道"，不是个大官，到乔家浜去，郁泰峰也不陪他，他就迳直去那藏书楼，看到他喜欢的书，就拿了装在轿子座位底下拿出去。郁家的人见他是"老爷"，不敢拦阻[13]。

最近才知道一件有关郁泰峰藏书的事，那是台湾作家高阳写的《瀛台落日》中的一段。小说中讲，有一个叫陆心源的人，"大收古书，以上海郁氏家宜稼堂的精椠为基本，数年之间，蔚然成家"。陆心源一死，他的儿子不能世守其业，大概在

光绪三十一二年间，日本三菱的财阀男爵岩崎弥之助派人跟陆树藩谈判，以10万银元，把陆心源的藏书，包括郁泰峰藏书中的善本书买去，归入岩崎的“静嘉堂文库”。我不知道高阳这么写的根据。果真如此，现在这批书不知道在日本何处？这件事“消息传出，士林大哗，笃学好古之士为之痛哭流涕的，大有人在”。30年代初，我曾到郁泰峰的住宅去看这个藏书楼。好书都没有了，只堆放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书。

〔注释〕

①郁馥山发家是我们家族的一个趣闻。在他13岁那一年，他同比他小3岁的弟弟郁莲塘去上海一沙船字号当学徒。到老板家时，仆人接待了这两个小孩子，说主人还在休息，请稍候，并送上两碗馄饨请这两个小孩儿吃。吃完之后，老板才出来，问这两个小孩儿方才吃的馄饨有几只(老板亲自盛了22只馄饨让仆人送给“大的”，18只馄饨送给“小的”)。郁馥山准确无误地说出了22这个数字，郁莲塘根本不记得。于是老板就录用了郁馥山，以后也一直器重他的才能。在郁馥山成家时，老板送了郁馥山一只沙船，让郁馥山自己经营。他就因经营得法，不断兴旺。

②那时郁竹泉拥有大船80余号。他善于管理，“见识独高而能知人”。当时沙船出洋，猝遇飓风搁浅，常采用的办法就是把货物扔到海中，直到船浮出为止。郁竹泉的船队能做到避免这种损失。船队经常去的地方是日本、菲律宾、爪哇、安南、暹罗、马来西亚等地。常常出去一船货，到国外后再打一条船，装两船货回来。因此他的事业发展得非常快。那时候上海沙船业字号有好多家，还有不少搞内河航运的，见到郁竹泉能力高，就创立了一个商船会馆，推郁竹泉做总董。郁竹泉还在上海建

造货栈船栈，开设钱庄、典当、酱园等许多字号。当时被视为上海首富。

③"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在50年代曾藏有不著作者姓名的《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的一个抄本。在抄本最后附有一首"诗"，题为《郁泰峰》，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城中首富近推郁，多号多船又多屋。昔有昆仲两相辉，一是主持一是读。倏然折翼竟成单，初似兄灾弟为福。自从作乱起红巾，先行八万捐银速。贼本贪婪无厌求，逼追二百日常逐。大营官属得此闻，示以兵饷军需目。由自交相内外攻，鬼神为之暗地哭。……"文中引文中的句子是这诗中原作者作的注解。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编，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摘自《随园琐记》，作者袁祖志是小刀会杀害的上海知县袁祖德之弟。

⑤《家谱》记载有1892年英法军攻上海后，郁竹泉、郁泰峰家被"抢掠一空"的事。

⑥文献上还有一些说法，说小刀会"硬索富户郁泰峰及蔡姓家内搜拆壁藏银"(《申地情形》)。看来逼窖藏这样的事会有的。黄本铨《枭林小史》中说："城中富户逃出者，多窖金于地往往泄漏……"蔡吟涛家藏银30万两被劫，但从家里传下来的话中没有这一条。(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⑦毛祥麟《三略汇编》出处同上。

⑧说到郁泰峰捐20万两银子的文献很多，除上引《三略汇编》外，黄本铨的《枭林小史》也写："邑民郁松年捐银20万办善后，士民皆踊跃。"王韬的《瀛杂志》也写有郁泰峰在"恢复后，捐输20万，备筑墙"。出处同上注。

⑨沈宝禾《忍默恕退之日记》(稿本)。转抄自《清代日记汇抄》第239—240页，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⑩《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4页。

⑪《上海同仁辅元堂徵信录》(同治六年刻本)

⑫王韬:《沪濡杂录》

⑬这篇文章成稿后,1992年7月下旬郁泰峰的亲重孙郁鸿顺寄来1984年6月30日上海《新民晚报》刊载的余英写的《抢人藏书的道台》。里面写道:"时任苏松太兵备道的丁日昌""借介绍当时的上海县官应宝时到郁家看书为名,竟然自己动手从宜稼堂的书架上拿了宗元刊本50余种,叫他的仆从'担负而趋'。郁家人追到大门口阻拦,丁日昌还老着脸皮,将'其卷帙少者自置舆中,其卷帙多者仅携首帙而去',以后经应宝时做好做歹地调停,让郁家以宋刊本十种为赠,丁日昌才将那些被当作抵押品的首帙书归还郁家。丁日昌自己也有个藏书室,叫做持静斋,斋名持静,而其书的来源却是强抢。还有那个曾国藩的幕府莫友芝则采取一种长借不还的手法。等到小刀会起义,上海有了战事,他便推说兵燹散失就此侵吞干没"。"丁日昌持静斋的书籍不久就分散了,一部分归了涵芬楼,另一部分竟然到了国外。"余英此文讲得很具体,当是可信的,而且有引文,但未注明出处。我打算找到他,向他请教。我家族中口传的故事相比之下笼统含糊得多了,但总算代代口传,郁家的后人也算大体上知道有此类事情。

(1992年10月4日作注)

**附二**

## 我读了这样一本书

昨夜读了一本书《黎阳郁氏家谱》。线装,分12卷,180

页，订成三册，仿木刻的铅印本。

我本姓郁，这本书就是我所属那个家族的家谱。

我一直看不起这样的书。它在我身边有10年以上的时间，我从没有产生过想去读一读它的念头。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把它看作是一本可读的书。我只是从它的外形来看，不能不承认它也还是一本书罢了。

在“文革”中横扫的“封资修”的反动书刊中，这样的书是属于“封”字头的。“文革”中哪家家中保存有这样的东西，被红卫兵抄出，那是有挨斗危险的。因此那时我妈妈把家中仅有的一本烧掉了。家谱《自序》中写道：“校勘既竟，印20份，分贻族人，为传世之宝。”我妈妈烧掉那一本就是一下子烧毁这传世之宝的1/20。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惜。

我弟弟对这部家谱比我关心一些。当复印机在我国开始使用后，他从某本家那里借到另外那20本中的一本，复印了一套，送给了我。

虽然“文革”中红卫兵那样的做法我从来都认为不可取，但是我还是认为把这样的书算作带“封”字头的是很公正的。昨夜“读”了一下，我还是这么看。读后我有这么一个感想：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这家谱付印的时间是1934年，印出的时间不详，只知道1949年我与分离十多年的父母团聚时，家中已有一部了)，地点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上海，还会有这样一部家谱问世，说是要封建的东西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确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同时还看到，过了从30年代到90年代这60年，情况的确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今天之

上海，恐怕再也找不到写这样家谱的事了。

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

1. 对祖宗的崇拜。这家谱只记载了 11 代 200 年的历史。整个家族中并没有显赫的人物，只有一支曾经有两代人算得上是上海的富豪。论官职，即便是空头衔，全家族中最高的不过是“盐运史”。论学位，清代最高只中了举人，而且只有一个。民国，到 1934 年，大学毕业的一个也没有，大专程度的也只有一个。论文，只有一个祖宗为几本古书写了前言，出了一本诗集，还有一个祖宗写了一本《牛痘指南》。我所属的那个家族，祖先中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可是编这部家谱的目的，则是要在家谱中使“吾祖宗二百余年来诒谋传世之久经营缔造之迹悉具于斯”。

2. 重视名位。哪怕只是芝麻绿豆的官职，或者毫不足道的称号，如什么“登仕部”、“修职郎”，什么加衔的“国学生”等等都不遗漏，更不要说有过什么三品、五品、七品、九品的衔头了。我们这个家族世代以经商为主，也许因此特别重视官与学两方面的名位，以此装装门面。

3. 维系血统。《族党规约》规定：“凡无后而立兄弟之子为嗣者，以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服，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之贤及所亲爱者，毋许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系。”同时规定，不仅“为异姓子者”，而且“以异姓为子者”不得列谱。

4. 讲求名分。如“无子而纳妾生子者，妻故其夫……得以妾为继室”。（《族党规约》）

5. 重视全族财产。祠堂、飨室、墓、庐、祭田。

6. 讲究一套族规、仪式等等，连祭祖时上什么供，磕几次头，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

虽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封建制已经瓦解，规定这一套已经没有多少人重视，但族中还的确有那么一些人，对维持这套封建的东西很感兴趣。印这样一部书，虽然只出20本，总得花一笔钱。钱从哪里来，书中并未说明。那时家族已经衰落了，估计还是有人拿出些钱来。这是为什么，我说不清楚。我觉得从家族的角度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对整个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了解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虽然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也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读后我想记下这1000多字。

读这本书，对家族生活中那套封建的东西，可以得到不少具体的知识，同时也可以看到，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这样一部家谱出现的情况。我没有读到过其他家谱，也不具体知道人们常说的"续家谱"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想除了在港澳和台湾那些地方，很可能还有人热心做续家谱的事。在中国大陆，这本也许是家谱中印出得比较晚的一部了。因为它是抗战前夕才印出的。抗战后，我想"修家谱"的事就会停下来了。从这点上说，这本书还有它特殊的价值。究竟还有没有比这更迟印出的家谱，这一点可以设法了解。

昨夜促成我翻阅这本书的，是我想为《上海滩》写一篇《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前后的南市郁氏家族》。最初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只是想把我父亲给我讲的故事写下来，后来看到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写的小说，看到在他的小说中有几处涉及我的家史，

才知道对我想写的这段故事，有不少文献应该查一下。我请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伍云溥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王庆成同志帮我收集了一些材料，也希望高阳先生告诉我一些他掌握的线索，可是一直没有想到去查一下家谱。昨夜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家谱中的确有一些有用的材料。

读了这本家谱不但对于研究我的家史有用，而且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上海社会一些情况。比如家谱中记载，我的一个祖宗叫郁泰峰的，因为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期间他给了小刀会许许多多两银子，清军攻破上海城之后，就一次罚他捐20万两银子修上海城墙。这次他不敢请赏。以后一不做二不休，他又捐了20万两银子给宫廷，就风头十足。事后他给满清政府提出增加松江府和上海县的“文童”(即“文秀才”)和“武童”(即“武秀才”)的名额的要求，得到批准。我原先知道这件事，但不具体。读了家谱之后才知道，在郁泰峰提出这个请求之后，松江府每年文童、武童各增加10名，上海县永加10名文童9名武童。这样一府一县文武童总数从63名增加到102名。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郁泰峰的手腕(他因此得到了表彰，还加了个盐运史的官衔)，也可以知道当时松江府和上海县每年中文武秀才的人数。这样的材料，我不知道是否容易得到？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没有白花那两个小时。

此外还有一种收获，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回忆自己少年时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这家谱编成付印时我已经19岁了。在这家谱中有七八处提到我的名字的地方，还有有关我父母、祖母和我本来几乎一点不知道的关于我祖

父、祖母，以及我的父亲的某些情况。当然，有些事只有我本人才会注意。一个人对与自己直接有关的事情当然会有一种特别的兴趣。

1992年4月25日

**附三**

## 给高阳的一封信

高阳先生：

你好！

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我叫于光远，是一个研究社会科学、写文章写书的人。

我喜欢读你的小说。你在作品中对史料的运用自如，令我钦佩。几年来还有一件事使我一直想得到当面请教的机会。那就是：我本姓郁，是你在《胡雪岩》和《瀛台落日》中提到过的上海郁家的子孙。五年前《上海滩》创刊时向我约稿，我准备写一段我家族的历史给他们。正在这时候，阅读了上面提到的你的那两部小说，看到其中涉及我家历史的一些情况，这些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如应胡雪岩的要求运粮去杭州，藏书最后被日本人买去等。因此当时我就没有把给《上海滩》的稿子写完，而想去查阅资料并向你请教。

我想先简单地告诉你我家族的这一段历史。那是我父亲

在20年代主持修郁氏家谱时告诉我的。在清末，上海有大小郁家的说法。小郁家是高祖传下来的那一支，大郁家是我高祖的兄弟传下来的另一支。大郁家是上海首富。你小说中说到的郁老大我不知道指谁。我想不是郁泰峰就是他的兄长。他们是我曾祖这一辈的，是大郁家发家的那个老祖宗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大郁家发家的历史很短，郁泰峰的父亲青年时代还是一家沙船业字号中的学徒。后来才独自经营沙船业发了财。他的长子继承父业，也很会经营，家道继续上升。在小刀会进城前夕，他去世，棺材还停在客厅，因而其弟郁泰峰未逃离上海南市，受小刀会胁迫，每月拿出若干两银子作为战士薪饷。于是在清军攻破上海城后被追问"养红头"的罪名。经各方疏通，郁泰峰最后被罚巨款修复上海被炮火损坏的城墙，免于进一步追究。郁泰峰为了进一步保护自己，又出巨款捐了一个从二品盐运使，戴上粉红顶子，也是一个"红顶商人"。并且他进一步采取收买知识分子的措施：修缮上海文庙；捐款增加上海县每年考取秀才的名额，从30名增至45名（从第31名起到45名被称之为"郁家秀才"）；到长江中游购置善本、孤本，建藏书楼，以便把上海的许多知识分子请来编辑《宜稼堂从书》（此书后来刊出，我见到过）。我还知道李鸿章、丁汝昌等人如何拿走过藏书楼中许多好书的故事。我父亲告诉我家族历史的事情不算少，可是其中不包括上面提到的你书中写到的某些事情。看了你的小说，我想一定有书面资料可据，但我不知其出处。我这两年查到一些其他资料，但你用过的那些，仍未得到。

高阳先生，不知道你愿不愿同我通几次信，帮我得到有关我家史的更多的材料？也不知道你对清末上海郁家的情况是否有兴趣？希望得到你的回信。信寄北京东四史家胡同8号，邮政编码是100010。那条胡同之所以叫史家胡同，是因为史可法的祠堂曾在这条胡同里。这个祠堂的那间房子后来成了史家胡同小学的礼堂。它就在这两年修史家胡同小学教学楼时被拆掉了。

著安

于光远

1992年2月26日

附四

## 大境阁参观之后

如果不是在上个月路过上海、见到正在筹备“老城厢史迹展览”的同志，我这个“老上海”到今天也不知道南市还保存着50米长的一截旧城墙，不知道有大境阁这座古建筑物。我长期不在上海居住，不过我想如果对本地居民做一个测验，多半也会不知道这截旧城墙和这座建筑物。

受到这件事的启发，我就想，现在上海正加快旧城改造的步伐，像大境阁和它下面的旧城墙这些处在市内闹区规模又

不大的古迹，面临着两种命运：一是没有能保护下来。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发生得不少。比如1946年党中央决定在北平办一张《解放日报》，从2月起先办了三日刊，后改二日刊，还没有能出日报，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勒令停刊了。在它存在的四个来月中，有许多值得长期纪念的事迹。去年3月，我去访问叶剑英当初在门口照过相的报社编辑部的原址时，看到因修筑商业区即将拆除。上海的情况我不熟悉，不知曾否有类似的情况。还有一种命运，那就是它们被保存了下来，但是，由于不能因为要保存古迹而妨碍旧城改造，其结果便是有些古迹保存在近代建筑物的夹缝之中。我认为后一种命运应该接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有轩昂的大门，很可能只有临街的一个很普通的门。这个月我去访问大境阁时，就找了一阵子才把它找到。在这种情况下，原先颇为“高大”的楼阁，与附近的高楼大厦一比就会显得很矮小。它虽然受到了一种“欺侮”，但能在夹缝中保存下来，也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上海比起那些古都古城，历史遗址相对来讲不是很多。但是上海的历史有其特别的重要性，鸦片战争在这里进行过。它是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近代文化也在这里比较早地传播。中国人民在这里进行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地方并曾是党中央的所在地。许许多多政治和文化名人在这里居住过、活动过。如果给以更多的重视，有可能发掘出更多的古迹。徐光启的故居就在顾家弄我故居的后门，即那并不显眼的“九间房”(现在只剩了七间房)。这是不久前我才知道的。

作为一个“老上海”，当然特别关心家乡的历史、关心家乡古迹的保存。

1995年11月28日

附五

## 几件与我家庭史有关的文物

11月23日，在大境阁我看到一些与我家庭历史有关的文物。

首先是大境阁下50米的城墙中，有许多块上面有“咸丰五年”字样的城砖。见到这几个字，我就知道它们是小刀会失败后，我的祖先受清廷之罚，出巨额银两修复战火中毁坏的城垣时制作的。

这50米旧城看来是同治年间又重修的，因为砌在城墙中的还有李秀成攻打上海失败后在同治年间制作的城砖。上面也有同治某一年的字样。不过同治年间制的砖，在这截旧城墙的数量比咸丰年间的要少得多。在城墙上，绝大多数的砖看不到字样，很可能在砌城墙时未把字露在外面，当然有更大可能是一些本来没有字的老砖。

在“上海老城厢史迹展览”室内，挂有我家家谱中记载被罚、出资修筑城垣的一页复印件。当然是经过粉饰了真相之后写的文字，未说受罚而说成是主动出资，受到朝廷的嘉奖。

展室内展出我的祖先在咸丰六年铸出的重量为一两和五钱的两种银币的照片。

还有一张民国元年十一月，兵工学校学员的照片。我的父亲在宣统二年在这个学校毕业，毕业后留校在图书馆工作。我那天去参观未能仔细辨认我的父亲是否也在众人之中。

别的许多文物就只能说与我家庭史间接有关了。

1995年11月28日

## 5.5 我生活过的两个城市

20岁前我在上海住了十二三年，北京住了六七年。在别的城市常州、苏州、南京住的时间都不长，到过一下的城市也只有徐州和天津，别的地方都没有去过。因此对我影响深的就只有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在这两个城市我都过了一段自己的幼儿时期，都上过小学、中学和大学。我对两个城市都有深刻的印象，这两个城市都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讲我20岁前的环境时，似乎不能只讲自己的家庭，也应该讲讲这两个城市。

关于上海，1991年12月在病中写了一篇《我这个老上海》，在这里不再重复了。在这里只概括地说一说上海那些年给我的印象。妈妈说我3岁从北京一到上海，一进家还没有上楼到住房，就大声用北京话喊叫“我不要这黑屋子”。我不喜欢

上海住房拥挤的思想，可以说从小一直就有。在我祖母垂危时，我陪母亲守夜，天不亮就跑到二层楼的屋顶上等着看日出，结果是天虽然晴朗，但被周围的房子挡住视线，看不到日出，这件事也使我产生上海这个城市太挤不好玩的思想。还有上海的帝国主义分子神气活现，外滩公园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是亲眼看到的，使人感到受侮辱，感到生气。还有上海有许许多多乌七八糟的事情，在顾家弄55号经常可以听到，其中有的我连听都不愿听，我知道这个城市有许多龌龊的事情。有一些迷信活动不仅烧香拜佛，还有扶乩之类我也看过，至于花会那就经常听到……但是时间长了，也就慢慢能适应了，觉得上海是一个社会大学校，想研究它了解它。有了这个研究的观点，无论什么事情就成了我观察思考研究的对象，它是好是坏，反而变得无关紧要，不那么触动我的感情了。在这里有一个前期和后期的差别，在小学时代有更多的感情色彩，在高中和大学一二年级时代则更多地用理性去对待。

我觉得上海还是有许多可爱的地方。我喜欢上海的效率。1949年我回到离开12年之久的上海，一下火车我的第一个印象便是：“上海人怎么走路也慢起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上海人走路是很快的，我自己就是能够在人丛中挤来挤去走得很快的人中的一个。上海效率高当然不只表现在走路的速度上，办起事来也如此。我特别喜欢福州路河南路，即棋盘街。在那里买新书、旧书，买化学仪器、试剂都很方便。我也喜欢上海那几个图书馆。后来我半工半读之后，我觉得在上海找职业也比较方便。我的性格喜欢热闹，在上海可以观察到许多现象，天

天可以接触到新的事情，增加新的知识。除商业外，还可以在墙上看到革命标语，如“打倒国民党、打倒新军阀蒋介石”、“苏联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到苏区去”、“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在学校阅报室里可看到反对国民党的传单。上海还有那么多的新书新杂志，有些似乎被禁的书，在这里也可以买到。

与北京相比，上海的这些优点是很突出的。作为我的生长环境，北京比起上海要单纯多了。在北京我没有像在上海那样每天走这么多的路。初中高中呆在学校里的时间比较长，初中还常去图书馆，高中就不再去了。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比较开宽比较宁静，也比较古老。从西四兵马司到祖家街第三中学的现在叫赵登泉路的那条街，那时叫沟沿，是一条明沟，下雨时排水，污水垃圾也往里面扔，人就在沟边走路，而且是在京城里的一条大街上。

北京留给我印象深的还有天坛、中山公园、太庙、颐和园、故宫那些地方。那时这些地方的游人不像现在这么多，在那里走走，坐坐的，能够得到休息。而上海简直没有这样的地方。学生时代的生活方式，至今还很怀念。在初中读书时，中午不回家吃饭，就在学校附近吃。通常的食谱是到油盐店买一大子儿（大子儿是比较大的铜板，上海用的铜板比北京用的小）生葱，两大子儿猪油，到旁边的饭铺去烙葱花饼，用半斤干面的钱，饭店就把半斤湿面烙了。饭铺不另收煤火钱、加工费。有时我去油盐店买些白糖和猪油，要饭铺烙麻酱糖饼。通常还用两个大子儿在饭铺买一碗小米粥，外加一包白糖。吃起来还觉得津津有味。当然有时还吃羊肉饺，也挺好吃。西四拐角同和居的

牛肉油茶、桂花茶汤也全是很好吃的东西。

在北京我住在西城，很少到东城去。那时西单的商业开始兴起，商业发达的是前门大街和王府井。西单西四东单东四都还不那么热闹，那时候西四一带摆地摊卖东西的还不少，也有在街上杀羊制羊皮的，摆象棋残局的，用五张扑克牌给人赌输赢的，其中一张是K、Q、J，然后在你眼前摆来摆去，再扣起来让你看得清楚那张大花摆在哪儿，然后让你猜猜，对了你下一大子的赌注，就配给一大子，而你准是十猜九错。有各色各样的玩意儿在街上可以看到。而在上海这么狭窄的街道就没有了。小学和中学时，在北京街还可以看到太监，看到旗人在路上互相用旗人的习惯行礼……

总之，北京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东西，同上海留给我的很不相同。

附

## 我这个"老上海"

我们家族在清末的上海有点名气，在关于上海小刀会的资料里还有些记载。研究我的家族的历史可以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角落。台湾名作家高阳先生的多卷本《胡雪岩》，就多处讲到我的祖先的情况。比如在《胡雪岩》中描写的胡雪岩请求帮助出船运米到杭州，救援被太平天国困在城中的清军。接着又看了他写的一本反映清代末年政治生活的《瀛

台落日》。书中讲到我家族原来拥有的一个藏书楼的一个重要的情况。在我的家族败落下来后，这个藏书楼的全部珍贵书籍被卖给一个离职的知府。知府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又把这些书卖给了日本人。这件事引起清末不少文人的愤怒，有些人激昂慷慨，甚至有的人为此痛哭流涕。我认为我身为这个家族的成员，又是一个搞社会科学的，写自己家族的历史，不充分掌握史料不行。于是托人帮助我去搜集材料。上海搞地方史的同志帮了我一些忙，寄了一点材料给我。中国社会科学院搞近代史研究的同志也到图书馆找了点材料给我。可是有些材料，包括高阳先生写小说时用的某些史实的出处还是没有找到。我也希望能有机会与高阳先生见面，就有关我家族历史的某些情况向他请教。可是有一次他来北京，走了之后我才知道，失之交臂。

我这个“老上海”“老”在哪里？我是上海人，在上海出生，但在上海住的时间并不长，算了一下，前后不过十几年。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北方度过的，现在还在北京。但是我的祖籍是上海。而我家族在上海城市里的时间很长，农村中世代住在上海境内的人是很多的，然而世代住在上海城市里的人却不很多。现在上海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来的，像我这样的土著很少。我遇见过许多上海人，还没有遇到过哪个人的祖先到上海城市里定居比我的祖先早。我想这样的人一定有，如果《上海滩》到居民中去做调查，会发现不少人。登刊物征求这种信息，也会收到不少信。我说的是我没有遇到过，因为我遇到的人终究是很有限的。但是我没有遇到过，也可以说明这样的人不会

很多。

言归正传，讲我自己。我不姓“于”，“于”是我的假姓，不过不想改回去了。而且我的孩子们也都姓了这个假姓了。我本姓“郁”。“于”本来是北方人的姓，真正的上海人没有姓“于”的。姓郁的，一看就是南方人。

我家住在上海大南门的顾家弄。一头是凝和路，一头是阜民路。阜民路南口就是大南门。这条弄堂很短，与俞家弄相连，因此现在已经改成俞家弄。门牌是顾家弄55号。可是我家还有一个更详细的“地址”，那是我10岁左右祖母去世时，请道士来举行接眚，道士念念有词时我听到的。道士要向阴府介绍死者在阳间的地址，因此就要正式行文。那个地址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江苏省、苏常道、松江府、上海县、高昌司、22保××甲”。究竟几甲，记不清了。后来我知道，在清朝末年，已经在上海设了道台衙门，可是道士们不予承认，还是讲“苏常道”。地址里的司，相当于县下的一个区。我家所属的那个区的所在地是高昌庙。我的祖母阳间所在的地区因此也就在上海县高昌司。当年上海一年一次城隍老爷出巡(注)，浩浩荡荡的队伍，就是按“司”来组织的。我住的顾家弄的那个住宅的地皮和房子是我高祖父置下的产业。我高祖父有许多儿子，大部分住在俞家弄，只分了两个儿子住在顾家弄。我曾祖父两个儿子，我祖父那一支的堂名是“敬和堂”，我祖父的哥哥的那个堂名叫“存怡堂”。我祖父生了三个儿子。我父亲行三。他有两个哥哥。我祖父的哥哥有两个儿子。我们这一代堂兄姐很多，许多人都住在这个住宅里。为了有点收入，房子还租出一部分，

招了许多房客。因此只有一亩多一点的地皮上盖的平房和二层楼的房子里住了七八十个人。我们本家人也住得很挤。我父母和我弟妹们五六口人只住了二三十平方米的一间客堂楼。我家的这个地方，在“文革”后还在。我住的那一间还有人住在那里，楼下的客堂和厢房成了副食品店，前几年把那片房子拆了，改建成几层楼的公房，就面目全非了。正门前的那条顾家弄除了改了名称外，其狭窄仍旧一样，刚容得下一辆小轿车勉强通过。我最后一次去那里，车子进了弄堂后，马上引起居民的注视。车子一停，不仅小孩子，大人也围了上来，使你难以相信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中心地带。

讲过“地理”，再讲“历史”。

在本世纪20年代，我们家族修过一次家谱，家父是“修谱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家谱原先一直由我母亲保存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怕抄家被抄出来，视作保存封资修的东西而挨斗，偷偷地烧掉了。可是本家还有人保存着。在有了复印机之后，我弟弟从某个本家那里弄了一本来，复印成一套给我。现在我家里还有。那个家谱很简单，学术意义很小，但终究是有关家族史的一个重要文献。这个家谱是从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开始记起的。如果把他算做鼻祖，我就是“9世孙”。我的这位鼻祖一直住在南翔。在我小时候，我家族成员一年要祭两次祖。我家有两个祠堂。一个在南翔，在那里祭祖的时间在秋季。一个是在龙华，在那里祭祖的时间是春季。去龙华祭祖的人比较少，去南翔祭祖的人多，除上海去的人之外，还有当地的族人。在南翔祭祖时，我被称为23世孙，那就

不是从家谱中有记载的那个祖宗算起的，即另有鼻祖。但是在家谱上记的那个鼻祖以上的祖宗姓名职业等都考证不出来了，只有一个我是23世孙的说法。南翔的郁家祠堂我去过不止一次，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在南翔下了火车之后，走不远就到了那个祠堂，它是在离开京沪铁路不远的一个村子里。祭祖时男子先按照辈份跪在草垫上，然后妇女也按照辈份跪在后面。有人司仪，叫“拜”、“兴”、“拜”、“兴”、三跪九叩首，然后叫“礼成”。末了全族的人在祠堂里吃一顿，把祭祖时供奉的那一口猪吃掉。小孩子参加这个活动感到挺有趣的。而因为“小房出长辈”，我家是小房，跪在我后面的有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的，我还觉得当长辈挺得意的。

大概在80年代初，有一次我到上海，去过南翔，想了解一下这个郁家祠堂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这个郁家祠堂，说实在话，当初就没有什么气魄，也不大，不过容得下一二百人跪下，而且还不显得拥挤，似乎也不算太小。1937年“八·一三”后，我在山西太原。有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军从上海西上，占领了南翔的“郁家祠堂”。当时我奇怪这么一个小地方竟会发了电讯，登了报。

在我祖父的祖父这一辈，有一位老祖宗从南翔搬到上海城内定居。我家成为上海城里人就是从那个时候算起的，到我是第5代。我的祖先就从我们祖父的祖父的哥哥手上开始在上海发迹。在他的大儿子手上又进一步发财，成为上海的首富。他们家的发迹靠的是经营沙船业，也就是搞海外贸易。把中国的货物运到日本、爪哇、安南、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地

方。再从那里办货，回到国内出卖。常常一艘船出去，在外国又打了一条船两条船回来。最发达的时候，据说拥有一二百条沙船，还开了许多商号、钱庄等等，被称做“郁半城”，后来在太平天国期间，我们郁家有时帮助清廷，有时帮助小刀会。后来被清廷问罪。靠钱能通神，出了几十万两银子才免于问罪，又出了几十万两在上海修文庙，并为上海考秀才的人争取了每年多取15名“郁家秀才”和捐了个二品官。我祖父的一个叔父也就同胡雪岩那样成了一名“红顶商人”。以后同官府来往，巴结上李鸿章等等。作为上海当时首富的郁家就是这一家，在我们族人中间叫做“大郁家”。而我们这一支后来成为大财主的弟弟的后代，便叫做“小郁家”。“大郁家”在上海有钱有势，“小郁家”就是大郁家的附庸，靠“大郁家”过日子。高阳笔下写的“郁老大”就是“大郁家”的人。

下面单讲讲我的直系祖先，小郁家的祖宗。上面已经说过，那位发迹的老祖宗的弟弟就是我祖父的祖父。他是家谱中的5世孙，我是9世孙。他拥有的地皮、住的房子就是他的哥哥帮助和后来他的侄子孝敬他的。不过到我的祖父时，“大郁家”已经衰落，靠不上了。我家高祖，家谱里也说是经商的，但不是当老板，而是当他哥哥和侄子字号里的伙计。我的祖父干什么职业，我就说不清楚了。我家根本不是什么书香门第，而是铜臭门第，向来是重商轻文。我父亲因为偶然的原因进了洋学堂，在宣统元年，在上海兵工专门学校毕业。刚毕业，就赶上辛亥革命，就革掉了他准备被派往英国深造的前途。他的同班同学中倒是出了几个名人——严独鹤和吴蕴初。一个在文坛

上，一个在实业界，应该说是当时上海滩的名人。而我的父亲宣统二年以少校衔毕业，到抗战爆发前，在河南开封一个兵工单位成了中尉衔的一个小官员。他一生潦倒。

我出生四个月后到了北京。那时家父在北洋政府兵工署当小官员。3岁多我又回到上海，上到小学五年级上学期又随家去北京。在北京学到高中第一学期又到上海，在大同大学附中和本科学到大学二年级，又转到北平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所以前后算起来，在上海只生活了12年。但是因为我是上海土著，在思想感情上、社会关系上同上海的关系还是很深的。我家又是上海的一个望族，在上海的亲戚非常之多。我父母告诉我，只要是老上海，可以说一定是我们家的亲戚。当然可能是转好几个弯的亲戚，但毕竟是亲戚。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可以说出许多亲戚关系来，我就说不清楚了。比方说北洋政府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十三太保之一的唐在礼就是我家的亲戚。怎样的亲戚那就说不清楚了。但是既然是亲戚，有时就会有些往来。我同唐在礼就见过不少次。还有一个人，此人说起来大大有名，那就是"五·四"运动被公认为卖国贼的曹汝霖。此人如果按照我过继给我大伯父之一支的关系来说，他就是我的亲表舅，也就是我过继的母亲的亲表弟。他也是上海人。据说我很小的时候在北京时——当然是"五·四"运动之前，一次他见到我，还指着我说："这个小孩将来有出息。"不过"五·四"运动的力量真大。在"五·四"运动之后，他的表兄弟都不理他。一次他登门找我舅父(还是按照过继的关系来说)，被我的舅父用门闩打了出去。这是我对上海当时社会有比较

多的知识的第一个原因。

我住在属于我祖先传下来的房产的那一片住房里。那里住的人，不但人数不少，而且各阶层干各种事的人都有。我的父亲，他是个“书呆子”，在那个环境中是非常特别的人。在我的邻居中有好多种类型的流氓；有干各色各样的勾当（可能参加绑票，做红丸等活动）的犯罪分子；有政治投机分子；有搞实业的；也有属于工人阶级的等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们党的党员，又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商人部长林军就常到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来，我见过他多次，因为他来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接近的是我很不喜欢的那些人，因此我连这个林军也不喜欢。后来我知道这个林军在“四·一二”后就消极脱党了。有人告诉我，蒋经国还到过顾家弄那所住宅，这是住在那里的我的一个堂姨夫告诉我的。不知道他是否吹牛。我经常可以接触的那许多人组成的那个圈子，的确是我的社会大学，它给了我许许多多社会知识——上海社会的知识。由于经常接触各种人，对许多人的特性就摸得很透，许许多多人都是写小说的最好人物原型。真可惜我没有写小说的才能，否则把我观察到的那个小环境中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作为材料，一定能写出有关上海社会的内容很丰富的小说来。这是我对上海当时社会有比较多的知识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从回到上海家中读书起，我家已经没有力量供我上学了。这时候我开始在上海“打工”。我 15 岁从北平到上海时，有一个亲戚正为一个化学工业社生产牙膏，他很会做生意，产品行销天津、东北等地，可是做出的牙膏不久就干

了，挤不出来。他要我想办法，我就跑东方图书馆查化工手册，在处方中加上了些甘油，这牙膏就不干了。于是我在他身边的小圈子里就出了名。又有一个人想办化学工业社，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生产一种媒染剂——“土耳其红油”。于是我就在那厂里当了一名技师。他给我钱，我建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为他开发了一个又一个产品。有的成功，有的没有成功。在上海上高中和大学的三年中，我做过的社会职业有翻译化工资料、当家庭教师、在高中和初中当教员等等。这样，我接触的社会面相当广。

第四个原因是，我对观察社会很早就发生了兴趣。我在上海随时随地都在有意识地观察社会，对听到的社会情况都用心去记。人家不知道我为什么经常注意这些事，其实我是在有意识地研究社会。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同我的好朋友议论、分析。他们听了也津津有味。记得有一次，我同一位朋友，上午带了干粮去八仙桥的大世界，在那里一直呆到很晚，目的就是一个：观察所见的一切现象。一天下来，看到有趣的事情真不少。此外，我有一段时期还颇有点侠义心肠，对社会上不平的事情特别敏感，有时就介入社会生活的斗争中去，同流氓、同警察、同外国人都发生过一些冲突。有的事还登在当时上海的报纸上，而且登在头版头条，并且在林语堂编的《论语》中有过评论。

还有一个原因，我在上海还多少参加一些革命活动，搞了点与党没有什么关系的自发性的活动，也同党的外围组织有过一点关系。

不过我毕竟在上海住的时间不是很长，自从 1934 年我转学去北平清华大学后，我没有在上海连续住过两个月以上的，1935 年和 1936 年的暑假，1937 年的 2、3 月间，我都只在上海小住。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我都没有到过上海，这一段时间里上海的情况，对我来说就很陌生了。建国后，我也还没有在上海较长时期地居住过。因此我比起常住上海的人和在上海长期工作的人来说，就称不上什么“老上海”了。我只是特定含义下的“老上海”。

1991 年 12 月 31 日 23 时于北京医院

〔**注释**〕

关于城隍老爷出巡的情景，我想就我的印象作一番描绘。城隍是阴间的县长，它的出巡对于本县居民当然就是一件“大事”。上海的那些想趁机弄点钱的人就来组织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吸引了许许多多人上街观看。走在最前面的队伍是扛着“肃静”、“回避”牌子和鸣锣开道的先行队伍。接着就是分司组织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分司组织的队伍又有自己鸣锣开道的人。他们敲的锣是用将铁丝穿在肉里的办法挂在手臂上的。他们一边流着血，一边敲锣，嘴里还吆喝着，连眉头也不皱一皱。真有点触目惊心。现在想，这里可能有弄虚作假的成分，那时可没有这么想。各个司的队伍里还有好几个刽子手。个个是胖子，光着上身，露着大肚皮，手里拿着刀。各个司也有不少皂隶，这是在司里工作的内勤。队伍里还有外勤：出去催魂的黑无常、白无常和索命吊死鬼（当然是女的）。还有很多“犯人”，穿着红衣服。这是京戏中犯人的打扮。这些“犯人”据说都是在城隍庙许下愿的。犯人中还有一些小孩子，也穿着京戏的服装。女孩子怎么打扮，印象不深了，男孩子是黑衣黑帽，帽上还挂一个白绒球。队伍的最后才是由判官仆人和丫环拥着从城隍庙抬出来的城隍

老爷和他的夫人。他们一出门，游行就到了尾声。整个队伍走过要个把钟头。主要的队伍就是各司的。我还特别注意我家所在的高昌司的队伍。城隍出巡的地段，也只限于“华界”，租界他已经去不了了。在阴间他管辖的范围那时也包括不了被帝国主义者夺去的那些地方了。

# 后　记

收在这个小本本里的第一篇《20岁前》，是1992年8月我在“302医院”治疗肝炎时的产品。对肝炎这种疾病的治疗，强调卧床的必要性，可是那时我的体力和精力和常人没有多大区别，加上我是个没有法子“休息”的人，多年来养成一个“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习惯，躺在病床上脑子还能动，嘴还能说，我夫人又在病房里陪住，我就提出用我口授、她笔录和整理的办法做一些文章。她同意了。对于这种做法，医生也是允许的。接着要决定的就是弄点什么呢？我先是弄点杂感之类的东西，1993年出版的《古稀手记》里收入的那几篇《病中记趣》还有一些就是用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但是还远远填不满空闲下来的时间，于是想到来系统地回忆一下本人20岁以前的经历。做这样的事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是明摆着的，我当然明白。但又一想，

这反正是一种带有“废时利用”性质的事情，而且做起来最容易，用不着查看任何资料（在病房里查资料是最不方便的），便这么做起来了。

一个人的回忆，有一个规律：小时候的事情，只要是记住了的，很不容易忘掉，回忆起来也很容易。没有用多长时间，就口授完，我夫人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整理出来的文字就是现在书里收进去的样子。数了一下字数，约有 2.67 万。

做完了这件事之后，我还在卧床治疗。那次我在医院住了快两个月，如果不是为了列席党的九中全会和十四大向医院请求，我还出不了院。我还想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工作”。在口授完这部书稿后，我觉得这段时间内的有几件事，在这个梗概里讲得太简单了，有一些具体生动的情节没有记下来，于是又口授了几个故事，作为补充。这几篇东西现在也收在这个小本本里了。一些事在那个梗概中都是讲到了的，未免有些重复，但是增加了不少具体内容。

这几篇东西也弄出来了。想把我的父亲和母亲、20 岁前我住了有 12 年之久的顾家弄 55 号院子里的邻居们和我所属的上海乔家浜郁姓家族也记一记。在 20 岁前对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们的事我也想系统地回忆一下。我的邻居，我的家族对 20 岁前的我也是发生过一些影响的，我也回忆了写成文字。这些也收进这个本本里了。

这些东西，本来我并不想发表。从 1992 年 8 月到现在一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再去看它。我只是想请人把它们打出来，写一个总的题目叫《给女儿们讲的故事》，让她们保存着，作为

长远的纪念。两个月前有一天，丁磐石到我家来，说起我有这样几万字的东西，他认为这样的东西给现在20岁左右的人看看，让他们了解一下我这样一个年近80岁的人在20岁前是怎么过的，也许会有点兴趣，有点“参考”价值。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后来有几个青年人看了也觉得有点意思，认为拿出来为好。

于是我就在1993年9月把1992年8月里的稿子拿出来看了一遍，抽空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订，又加写了几篇从各个侧面说明自己20岁前生活的特点和为儿童心理学提供小资料性质的东西。做完这件事情，最后编了一个目录。请朱颖同志把这几万字打了出来，为交给出版社做准备。

1994年1月20日

这个稿子在我家里又放了好几个月。在这期间，我请一位同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问他有没有出版价值。看后他说还是有点意思，主张我去联系出版社。

不过在定稿之前，我想请弟妹们也帮我回忆一下。5月间我去上海时，五妹、七弟把他们所写的材料交给了我。主要是对妈妈的回忆。锺德还把他保存的妈妈回忆我父亲的简历时他作的记录抄了一份给我，于是在6月初，我又改了一遍。

在改过一遍之后，我又觉得还有一些事要做，比如说最好找出几张20岁前的照片。这些照片也要到弟妹那里去找。

1994年6月5日

写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又快一年了。

这个书稿又在我家搁了一年了。两三个月前我才最后决

定交给河南教育出版社。社长周常林同志看了说这个书稿还是挺有意思的，决定接受它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样我就又把本来想补充的部分考虑了一下，加写了若干篇，这就是：(1)在第二部分加写了三个故事，一是关于小学三年级时一位我应该对他表示感谢的老师，还有两个一是关于我父亲，一是关于我母亲和我之间的小故事。(2)在第三部分中我加了两篇《我的私人化学实验室》、《看打牌、看下棋》。我想学校、图书馆、化学实验室和看人打牌下棋都是我取得知识的地方，当然前面两个是主要的。但后面二点也值得说一说。除这四个东西外，整个社会都是我的学校。我还把原来的《小时候的朋友》改写成《我的同学》、《我的表堂兄妹》两篇。在第五部分的第四篇加了一篇《给高阳的一封信》，还加写了一篇《生活过的两个城市》，并且把在1991年为上海滩写的《我这个“老上海”》作为这一篇的附录。这样一共多了7篇正文，两篇附录。同时把第四、第五两部分从头到尾看改了一遍。全文大概又加了一万多字。

有一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把“20岁前”改成“21岁前”。21岁大学毕业，我结束了学生生活。20岁半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而20岁时我只是自发地去“革命”，20岁后过了半年我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1936年1月我参加了民先队。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认认真真看了《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书，而在20岁时我只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几个概念。在这半年中我从头到尾读了这两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对于我成为马克思主义

者是有很大作用的，因此把20岁延长到21岁是有道理的。不过接着一想，写到20岁前也没有不对的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我的第二阶段的起点也完全合适。而且书稿已经写成这样，延长一年就要大改，弄得不好就成画蛇添足，于是就这样拿出去给河南教育出版社了。

当然我还想写一篇《序》。

1995年5月7日

今天我交出了书稿。这本书的写成和出版，除了河南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外，孟苏、胡冀燕和朱颖同志出了很大的力，这里，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
092229
092229